

# 金玉华年

## ——陕西韩城出土周代芮国文物珍品展在上博展出 Golden Age of the Rui State: Zhou Dynasty Treasures from Hancheng, Shaanxi Province

撰文 / 秦潼、摄影 / 薛皓冰

梁带村是陕西韩城市东北约7公里处一个普通的小村子，坐落在黄河西岸的台塬上，漫长的岁月里，村中人听惯的是黄河波涛拍岸的声响。但2005年春天过后，虽然涛声依旧，但梁带村不再默默无闻了，因为村北发现一处大型的古代文化遗址——两周时期芮国墓葬遗址。

芮是中国古代两周时期众多诸侯国之一，

公元前7世纪，因秦国的一场征伐，芮国由此湮灭于岁月长河之中。直到200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开始在陕西省韩城市梁带村进行一系列考古勘探与发掘工作，并确认了梁带村一带为周代芮国墓葬遗址。从此，这页尘封已久的历史又被翻开。

梁带村目前已发现西周以及春秋时期的墓



陕西省韩城市梁带村芮国墓葬遗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提供）

葬共 1300 余座、车马坑 64 座，共发掘墓葬 70 座，其中 7 座墓葬可能属于芮国国君及其夫人。根据出土文物的时代特征分析，墓葬排列呈现出北早南晚的格局，从西周晚期延续到春秋早、中期之际。出土青铜器铭文表明，梁带村墓葬遗址是一处芮国墓地。另据考古调查发现，梁带村墓地附近存有范围较大的周代遗址，这可能就是古代文献中没有记载确切位置的芮国后期都邑“北芮城”。

梁带村墓地至少埋葬了五代芮国国君和三位国君夫人，形成了第一等级墓葬；发现的中型墓，初步可分为三个级别，墓主为各级贵族；小型墓属于平民阶层。小型墓没有叠压打破关系，有规律的排列在大中型墓附近，这些表明，芮国实行的是“族墓地”制，即王公贵族和普通平民共同使用墓地。

芮国墓地的各种遗迹、遗物保存完整，出土有大量青铜器、金器、玉器、象牙器、漆木器等随葬品。其中青铜器有成套的礼乐器、奇巧的弄器以及一些新出现的器形器类，这些都具

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所出玉器种类丰富，制作精美，出土位置明确，组合关系清晰，特别是包含了许多早期遗物，且时间跨度较大，这些都为周代用玉制度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考古资料。金器是芮国墓地的又一特色，其数量为周代考古发现之最，不仅制作工艺精良，以成组的金器为服饰挂佩也是迄今仅见，对重新认识中国早期黄金工艺和金器的使用制度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梁带村芮国墓地的发现，对研究芮国历史地理及周代封国制度、器用制度、丧葬制度等都具有重大价值。于 2005 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于 2006 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芮国墓地发现以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为了向广大观众朋友介绍芮国墓地考古工作的丰硕成果，“金玉华年——陕西韩城出土周代芮国文物珍品展”于 2012 年 5 月 9 日至 8 月 12 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此次展览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韩城市人民政府、上海博物馆共同举办，也是庆



金玉华年——陕西韩城出土周代芮国文物珍品展

贺上海博物馆建馆六十周年系列展览之一。

2012年5月8日，“金玉华年——陕西韩城出土周代芮国文物珍品展”在上海博物馆隆重开幕，上海市文物局副局长褚晓波、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刘云辉、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党委书记陈显琪、陕西省韩城市人民政府市长张建中、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等出席仪式并为展览剪彩。

“金玉华年展”为梁带村墓地发现以来集中向社会最大规模的一次展示，其中有一些珍品是首次公开展出。展览主要以时代为线索，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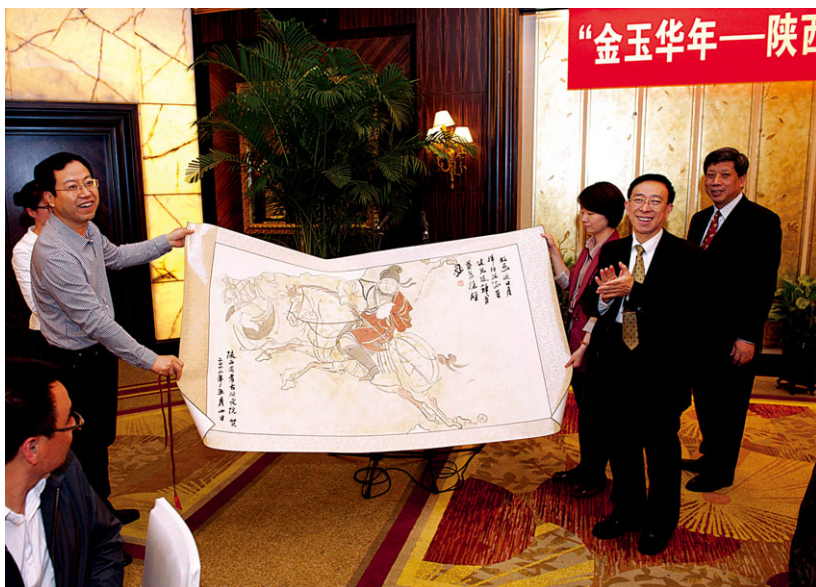
墓葬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560号墓、300号墓、502号墓、586号墓、33号墓、西区18号墓。

560号墓、300号墓、502号墓、586号墓、33号墓均为西周晚期墓葬，西区18号墓为春秋早期墓葬。其中502号墓、33号墓、560号墓为单墓道甲字形竖穴土坑墓，可能分别为一代芮君或夫人之墓。余者为没有墓道的中型竖穴墓，应为芮国较高级别的贵族墓。西区18号墓墓主则具有武职身份。



金玉华年——陕西韩城出土周代芮国文物珍品展新闻发布会（摄影/陆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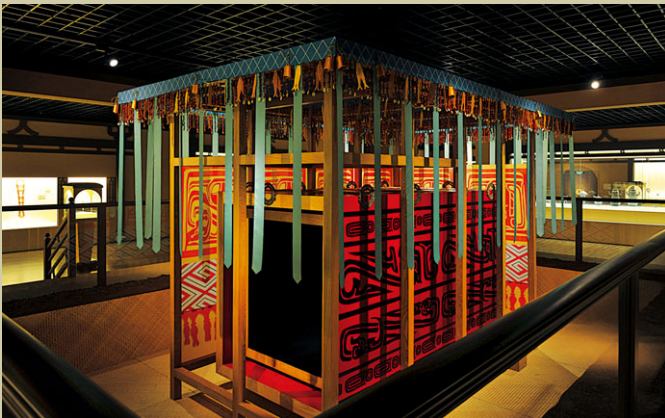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向上海博物馆赠送纪念品（摄影/陆铖）

此六座墓葬的葬具皆为一椁两棺，另有置棺的棺架，并有荒帷等棺饰。随葬品包括铜、陶、玉、漆、蚌、象牙、骨器等。502号墓等还出土有殉车、殉葬的木俑。出土的青铜器中有晋、毕、虢、蓼等诸侯国之器，反映了芮国与这些国族的交往。出土玉器的时代比较复杂，502号墓的玉璋改形于龙山文化器物、立鸟玉佩为商代晚期遗物、飞鸟玉佩的时代为西周早中期、300号墓的玉项饰则由西周穆王时期的器物改制而成。

第二部分：27号墓。

27号墓为带有南北两条墓道的中字形竖穴土坑墓，时代为春秋早期。葬具为一椁两棺，并有荒帷等棺饰。出土随葬品的种类丰富、数量众多。青铜礼器有七鼎六簋和成套的编钟、编磬。簋上的“芮公”铭文，显示了墓主为一代国君的身份，一般认为27号墓是芮桓公之墓。

出土青铜器的时代既有西周早中期，又有春秋早期，



内容丰富、设计精致的“金玉华年展”



金鞮与同出玉饰件的展现

其中兽面纹盖尊、三角形有銎戈等皆为首次发现的器物新种类，罇于为目前发现时代最早者，对研究这类乐器的起源和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出土金器共有48件，皆佩戴于墓主体躯，这是非常罕见的现象，为研究周代金器的使用和制作工艺提供了重要资料。出土玉器249件，其中玉戈、玉璧为商代晚期遗物，七联璜玉组佩则由7件商代晚期和西周的玉璜穿缀组合。

第三部分：26号墓、19号墓。

26号墓、19号墓为单墓道甲字形竖穴土坑墓，时代为春秋早期。葬具都是一椁二棺，并有荒帷等棺饰。两座墓与27号墓并排埋葬，一般认为是27号墓墓主芮桓公的两位夫人。

26号墓出土五鼎四簋等青铜礼器，铜器铭文中“仲姜”，考古工作者结合文献记载推测，可能是芮桓公的正夫人芮姜。墓中还出土了一组6件器型小巧，铸造精美的青铜弄器，生动

地展示了周代贵族的生活情趣。

两座墓葬出土玉器的来源广泛，有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商代小臣奚玉戚等，是为早期玉器的代表；梯形牌玉组佩等则有明显的春秋早期风格，为玉器断代提供了标准；出土的成套玉项饰、玉腕饰、玉握饰、玉踝饰等是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成套玉饰；26号墓的玉握为目前发现的最为复杂和奢华的周代玉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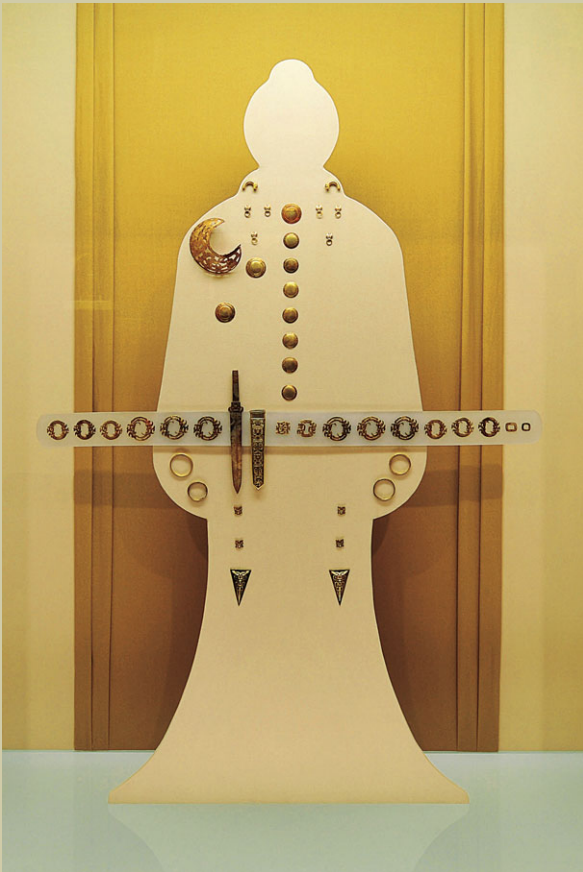
此次展览在展品的陈列展示方面，以考古、学术与观众乐见的接受形式作为交汇点，推出了一些新的形式，如以出土状况为参考，精心设计了国君金器、夫人玉器复原示意，展示了当时贵族的生活片断，特别是荒帷等饰棺示意复原展示，直观地将考古发现迹象呈现在观众眼前，这些都属于创造性的陈展理念。从而让珍贵文物的精彩、展示思想的先进、学术成果的新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在展览开幕的同时，主办方又编辑出版了《金玉华年——陕西韩城出土周代芮国文物珍品》大型图录，收录了全部展品，主要以器物照片为主，辅以拓片和线图，集结文物的方式清晰完整，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梁带村芮国墓地考古发掘负责人张天恩、孙秉君先生为图录撰写了长篇文章，全面阐述了对该基地的基本认识；刘云辉先生所撰写的论文，主要是对芮国墓地出土金玉器的特点、价值及意义加以评述。两篇论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2012年8月13日至8月15日展览结束之际，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上海博物馆共同举办的《陕西韩城出土芮国文物暨周代封国考古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在上海博物馆召开。会议主要就陕西韩城梁带村周代芮国墓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周代封国研究等展开讨论。届时将会有国内外许多著名学者参加，群贤毕至，共同探讨。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陈列设计部、展览部同人协力布展（摄影/孔品屏）



出土金器的形象展现



出土玉器的形象展现



出土石磬、青铜钟与钟钩的展现

# Contents

## Major Events

### Golden Age of the Rui State: Zhou Dynasty Treasures from Hancheng, Shaanxi Province

(Written by Qin Tong and Photography by Xue Haobing)

In 2005, a large excavation site of Zhou-dynasty cemetery was found in Liangdai Village, 7 kilometers away from the northeast of the city of Hancheng, Shaanxi Province. This excavation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study of the Rui State in various aspects including its geology, Zhou-dynasty kingdom system, important vessels system, funeral services, and so forth. This excavation was included into the Ten Archaeological Finds in China of the Year 2005, and the site was ranked as the Important Cultural Heritage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2006. The Rui-State cemetery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s from many walks of the society and to introduce its excavation fruits, the exhibition "Golden Age of the Rui State" is held in the Shanghai Museum from 9<sup>th</sup> May to 12<sup>th</sup> August of 2012. It is not only an exhibition cooperated by the Shaanxi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Hancheng Municipality and Shanghai Museum, but also enlisted as one of a series exhibitions of Shanghai Museum to celebrate its 60<sup>th</sup> Anniversary.

## Articles on Special Themes

### Literati Spirit: Art of Chinese Bamboo Carving (Written by Xia Beibei and Photography by Lu Cheng)

The symposium on Chinese bamboo carvings was held on 28th and 29th of June, 2012 at the end of the exhibition "Literati Spirit: Art of Chinese Bamboo Carving". As the first symposium on this special subject, there are 56 participants in this field from both home and abroad, with forty participants presenting theses and 21 giving speeches on the themes of the history of bamboo carving, Chinese and foreign collections, and bamboo carving culture as well as its exchanges. The heated discussion and various views on the study of bamboo carving has exerted an far-reach impact on this category of Chinese handmade art.

## Essay on Cultural Relics

### Museums as a cultural strength in the system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By Chen Xiejun)

In the course of cultural reform, growth and boom, we have got building "three systems" on our agenda. The "three systems" refer to the system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the system of cultural industry and the system of cultural market. The writer of this article has examined the role of museums in the system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and pointed out their significances in helping cultural growth and boom.

## Vision on Cultural Relics

### An Epitaph for Zhang Shenxue (By Wang Zaijing, Huang Yongjiu and Zhang Tongxin)

### A study on the Annals of Xi'an that is dated 44<sup>th</sup> year of Qianlong Reign and its value (By Dang Bin)

###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Buddhist nimbi found in the early Mogao Grottoes and Yungang Grottoes

(By Wang Shujing)

### A second addition to lost articles by Wang Mingsheng (By Wang Guangqian)

## Masterpiece Appreciation

### Excavations from the Wangs' cemetery (By You Baoming)

# 上海博物馆成功举办 “竹刻国际学术研讨会”

## Literati Spirit: Art of Chinese Bamboo Carving

撰文 / 夏蓓蓓、摄影 / 陆铖

2012年6月28日至29日，“竹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博物馆举行。作为竹刻研究史上第一次专题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吸引了海内外56名专家参加，其中有40位提交论文，21位在会上作了围绕竹刻历史研究、中外竹刻收藏与鉴赏、竹刻文化与交流等三个主题的发言。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克伦等主持了研讨会。

首先，对“竹刻历史研究”的主题所涉及

的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

### 1. 对竹刻历史的专题研究

北京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刘岳做题为《竹刻工艺史二题试解》的发言，从《竹人录》等材料出发，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如何理解金坚斋赞誉周颢刻竹“合南北宗而为一体”一语的含义；第二，《竹人录》记载张宏裕“以三寸竹为人镂照”“别开生面”这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抑或反映了更深刻的发展演化。刘岳以为，这



两个问题共同指向嘉定竹刻发展的一个趋势，即自三维立体向平面化面貌的蜕变、由工艺探索到文人化审美趣味构建的过程。

台北故宫博物院登录保存处嵇若昕的《清前期内廷的嘉定竹人》，在阐述清前期内务府造办处的沿革后，主要以造办处《活计档》为基础，对康熙乾隆三朝造办处的嘉定竹人，即封锡禄与封锡璋、封岐与封镐、施天章的宫廷行迹予以了梳理，并对“雕竹晚嵇笔筒”、“雕竹罗汉”、“鸡血石赤壁图未刻印”等作品进行展示介绍。发言的最后部分指出，根据现有材料，随着清高宗个人欣赏口味的变化，造办处广东匠人的地位逐渐提高，到乾隆四十年（1775），内廷中应该已经没有嘉定竹人。

## 2. 对竹刻地域与流派的研究

东华大学包铭新的《晚清民国嘉兴的竹刻艺术》，通过对《墨林今话》、《竹刻录》等文献材料的梳理，以孙三锡、沈皋、达受、陈春熙等十人的作品为个案分析样本，提出在晚清民国期间活跃于嘉兴一带的竹刻艺术家群体之间存在着可以落实的传承关系和相互影响，并在作品风格上的表现，从竹刻史及美术史的角度将其看作为一个整体，乃至一个流派。

浙江省博物馆陈姝洁的发言题目为《浙江翻黄竹刻艺术》，着重介绍了浙江省博物馆所藏的一批翻黄艺术精品，如奉化翻黄三格提篮、黄岩翻黄掌扇（茅庆霖“富贵寿考图”掌扇、陈岳“铁锁沉江”掌扇）等。

湖南省博物馆聂菲做了题为《宝庆竹簧与竹文化》的发言，分五个时期介绍了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期间宝庆竹簧的发展与成就，并将其艺术特点概括为题材广泛、技法精湛、意境深远，认为宝庆竹簧的出现是宝庆竹文化从“以竹为器”到“以竹为艺”的历史转折时期，在中国竹刻艺术中具有一定的意义。

## 3. 对竹刻艺人的研究

上海博物馆施远的发言题目为《张希黄研究》，他主张张希黄应为清代前期湖北鄂城地方人士，其论证主要分三个部分进行——张希黄的籍贯、张希黄的活动时间和张希黄作品的真伪。对于籍贯，传世张希黄作品上明确留有地望信息的“前赤壁赋笔筒”



和“楼阁山水臂搁”分别款识为“鄂城张希黄”和“观山张希黄”，施远提出：“鄂城”乃地名古称，今鄂城、黄石、大冶地理范围内的人士，都可以自称“鄂城”人，而大冶境内又有“观山”地名，综合考量之下，鄂城之说更为可信。对于张希黄的活动时间，施远比较了褚德彝、嵇若昕、关善明等人的研究成果与论据，再对《前尘梦影录》中的相关记载详加推敲，以为“张希黄并非活动于晚清应无疑义”。对于张希黄作品的真伪，他以李葆恂《旧学庵笔记》中的相关记录为依据，对目前国内外收藏的15件典型张希黄留青山水样式的竹刻作品予以一一对照，指出“不能将晚清时期仿制的那类‘典型张希黄竹刻’作为判断张希黄活动时间的依据”，这种模仿在细节处理上不免琐细，整体气息亦有板滞，其作为时代局限，“恰是我们今天勾玄抉微，辨伪求真的借力之处”。

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董建的发言题为《由新见许西岑竹杖刻字拓本谈潘西凤生卒年及籍贯问题》，他以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藏“许西岑竹杖刻字拓本”手卷中的材料为依据，研究认为目前所见的一些工具书往往把潘西凤的生卒年定为乾隆元年（1736）至乾隆六十年（1795），是将更早期的一些工具书中潘西凤的创作活动



年份误以为是生卒年而形成的错误，还更进一步指出，事实上潘西凤的创作活动也并不限于乾隆年间，而应早至雍正时期。在对该拓本的许承尧题跋和潘西凤本人跋文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上海博物馆、苏州博物馆等所藏多款潘西凤印章的边款，得出结论“潘西凤非生于是年（乾隆元年）昭然若揭”。最后，董建还对潘西凤的籍贯问题进行了分析，他以郑板桥看似自相矛盾的记载为切入点，结合古人署款籍里的习惯以及地理等多方面因素加以考辨，得出结论为“潘西凤是新昌人”。

苏州碑刻博物馆陆雪梅的论文《从张楫如竹刻谱拓本谈其镌刻艺术》通过对该拓本中收录的部分张楫如摹刻扇骨的展示，着重分析张楫如竹刻作品的艺术特征，并介绍了其与当时沪上诸多艺术家的深厚友情，最后则结合作品刻款对张楫如生卒年予以了部分修订。

上海博物馆刘刚的发言题目为《王勋竹刻研究》，他认为，王勋的声望和技法在竹刻史上虽都不具显要地位，但其作品体现了竹黄镶嵌和陷地浅刻两种成就及其结合，成为中国古代竹刻最后的亮点。为此，刘刚还对后者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代表性竹人及其作品进行介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出王勋作品的艺术趣味，即：传统工艺的守成、附丽书画的反衬、工匠价值的体现。刘刚还以王勋为例，剖析了清代晚期竹刻创作存在的一些问题，指出许多工艺技术由于过分强调与诗书画的结合而怠慢了技艺，这降低了竹刻创作的技术门槛，遗失了难得的“匠心”，最终加速了雕刻工艺的衰落，而“这是中国古代非理性文化特征的具体表现之一”。并由此得出结论：“王勋的作品代表了清代晚期竹刻创作的一种模式和一种趣味。在表现文人气息的同时，不失技法，犹保艺匠风范。……他的作品是时代的产物，也是中国古代竹刻最后的光华。”刘刚的观点为如何真实评价古代工艺品的成就，提出了务实的做法。

第二个主题是对“中外竹刻收藏与鉴赏”

的讨论

霍吉淑(Jessica Harrison-Hall)作了题为《大英博物馆收藏的竹刻》的发言。据其介绍,大英博物馆收藏的竹文物有多种形式,从18世纪的佛经盒到20世纪的茶道用品,而此次专题讨论的则为笔筒、根雕、香薰和臂搁四大类。她在介绍各款藏品的同时,也对此类物品在传统中国的作用及文化意蕴进行了解读。

日本永青文库三宅秀和的发言题目为《永青文库所藏竹制工艺品》。他简要叙述了永青文库创立者细川护立的家族渊源,随后对永青文库所藏的两类竹工艺品——竹制的茶道具和笔筒、臂搁等中国的文房用具一一做了介绍。

山东省博物馆吕键的发言题目为《山东省博物馆竹雕作品赏析》。山东省博物馆收藏的竹雕作品主要以笔筒、臂搁为主,此外还有一些竹雕人物、竹雕花薰、竹雕杯子、翻黄如意等,吕键选择了人物笔筒、诗文笔筒、“麻姑献寿”、“和合二仙”等几件馆藏竹雕作品向与会者作了图片展示与介绍。

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江宝仪的发言为《竹刻中的世界——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竹刻藏品介绍》。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收藏有竹刻制品近三百件(套),其中以嘉兴竹刻最多,主要为明清时期的制品。江宝仪介绍了多款馆藏竹刻精品,并由功能用途及款识等方面,展现了明清时期丰富多彩的竹刻世界。

最后的讨论议题为“竹刻文化”,这是一个延伸而广泛的议题。

上海博物馆孙慰祖的发言题目为《清代竹印三题》。在明清篆刻作品中,竹根印长期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地位,不被纳入类型特性的探讨,也没有得到竹刻研究相关文献的充分关注。孙慰祖提出讨论的即是此类作品,其思考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1. 竹根作为印材在明清时期被纳入篆刻印材体系是出于适用性能和审美价值的双重选择;2. 如果将竹刻与篆刻视作不同的艺术部类,那么在竹印创作这一交汇点上却聚合了两种不同身份定位的作者群,通过对一组潘西凤竹印作品和一组邓石如竹印作品的多方位比对,可以看出作为已独立的篆刻艺术,其表现语言也形成了独立的体系,有着特定的学养



结构、性格与技能内涵，由此造成在今天看来延伸创作与本位创作的不同品格；3. 中国印章印体装饰风格在明清时期形成了新的格局，竹印的引进，也带来了装饰理念和审美品格的变革，清代竹印上有着两种不同的装饰趣味，一是以竹根为造型材料，以圆雕、透雕手法赋以新的造型，二是以竹根形态为基本造型，在不加雕饰或略施修整中凸现其朴拙、自然、清雅的旨趣，竹印取材与装饰的理念反映了明清时代不同工艺门类的相互交融，文人社会对“竹”所持有的审美情感，被导引到原本其貌不扬的“余屑”上，为长期由绮丽精巧风格主导的这一空间引入了山林气象，无疑代表了印章艺术鉴赏风气的升华。

浙江桐乡市文联叶瑜荪作题为《略论笔管与竹刻》的发言，从毛笔发展历程和笔管镌刻史实考察等方面，对笔管与竹刻的关系作了简要的论述，认为笔管雕刻起源极早，且对中国工艺竹刻向艺术竹刻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

南京博物院杨海涛的发言题目为《试论明清竹刻艺术的风格成因和演变规律》，在对从明代中晚期嘉定派（以朱鹤为代表）和金陵派（以濮仲谦为代表）勃兴到清中期名家辈出（吴之、周颢、封锡禄等）再到清晚期竹刻艺术日渐式微的发展演变历程进行扼要阐述的同时，亦将之置入整个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予以考察，指出“竹刻艺术的演变规律和我们历史发展的社会、文化因素紧密相关”。



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美术馆原田一敏的发言题目为《日本竹工艺历史》，全面叙述了日本竹工艺从绳文时代竹胎漆器经奈良时代竹编花篮直至江户时代以后各种竹制编织器的发展历程，并对正仓院、东京国立博物馆等机构所藏的竹工艺品做了展示介绍。

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张林杰的发言题目为《论文人情趣对竹刻艺术的影响》，通过对文献资料和流传实物的研究，由文人雅士对竹刻艺术的特殊情感入手，主要从器物造型和纹饰构图两方面来探讨文人情趣对竹刻艺术的渗透，尤其强调文人画对竹刻纹饰构图的影响，认为“没有文人的参与和支持，竹刻根本无法企及艺术的高度”。

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黄海妍的发言题目为《明清竹刻中的文字、图像和社会风尚》，主要以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所藏竹刻制品为中心，讨论以下三方面的内容：1. 明清竹刻家、竹雕技法以及题材内容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其流变；2. 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馆藏竹刻上的图像、题字的分类和解读；3. 竹刻图像所展现的文人世界。

上海嘉定博物馆陶继明的发言题目为《嘉定竹刻中的文人气息》，他认为明代中后期文人雅士的介入提升了嘉定竹刻的文化品位，对嘉定竹刻的美学价值和发展走向，以及竹人文化品格的形成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文人雅士是嘉定竹刻的触媒，文人与竹人间多有沟通和互动，文人学者对嘉定竹刻史料贡献突出。

南京博物院民俗研究所陆建芳作题为《江南竹刻今后发展之我见》的发言，提出三点意见：1. 呼吁考古界重视和关心古代用竹现象，尤其应关心楚文化地区的古墓葬材料，将来一定会发现大量古代用竹的实物材料；2. 在中国古代，竹、玉历来得到文人士大夫的珍爱和崇敬，因此，研究竹刻必须以士大夫文化为基础；3. 必须重视当代竹人竹刻的研究，如当代常州留青竹刻。

一天半的集中交流结束后，原中国艺术研究院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孙建军先生进行了总结发言，提出在本次会议所讨论的三大主题之外，还有许多问题值得学界进一步深入探讨，包括：中国竹刻艺术史的撰写和研究；如何扩大思考与研究视野，例如从文化多样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理解与认识中国的竹刻艺术；关于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的竹刻艺术的传承和保护问题、保护和发展问题以及保护工作与文化产业的关系问题等。

孙先生特别强调，学界当前的研究，对竹刻艺术的思想及其负载的历史文化信息，认识得还不是很透彻。中国传统手工技艺具有五个基本特征：历史的原发性、文化的地域性、技艺的传承性、创造的集体性和制作的手工性。虽然随着时代的前进，过去的创造可能已经不适应今天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但其创造的本质以及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依然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中国竹刻艺术中因材施艺、因地制宜的创作法度，巧而得体、精而合宜的人文讲究，独运匠心、宛若天成的艺术创意，是民间手工技艺无法被现代生产方式与技术形式所取代的卓越文化价值，必须得到慎重的对待。

此次研讨会除上述 21 人交流发言外，还有 19 位研究者向大会提交了学术论文，如徐征伟《辨名、释义、形制及其他——读〈竹人录·札记〉》，徐秉言《徐氏竹刻的创作理念和实践》，张尉、谷娴子《竹品玉魂——兼论明清竹刻、琢玉工艺的相互交融》，华慈祥《中国古代竹笔述略》，以及论文提要，如包燕丽《试论清代前期竹刻对雕漆的影响》（提要）等，为在会后论文集的结集做好了准备。

6月29日下午，全体与会代表前往嘉定博物馆，先后参观“嘉定古代历史文物陈列”、“2012当代竹刻艺术展”、“中国近代著名外交家顾维钧生平陈列”等，实地感受了嘉定这一高手云集、名家辈出的竹刻之乡的独特气息，为此次竹刻国际学术研讨会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 Contents

## Major Events

### Golden Age of the Rui State: Zhou Dynasty Treasures from Hancheng, Shaanxi Province

(Written by Qin Tong and Photography by Xue Haobing)

In 2005, a large excavation site of Zhou-dynasty cemetery was found in Liangdai Village, 7 kilometers away from the northeast of the city of Hancheng, Shaanxi Province. This excavation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study of the Rui State in various aspects including its geology, Zhou-dynasty kingdom system, important vessels system, funeral services, and so forth. This excavation was included into the Ten Archaeological Finds in China of the Year 2005, and the site was ranked as the Important Cultural Heritage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2006. The Rui-State cemetery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s from many walks of the society and to introduce its excavation fruits, the exhibition "Golden Age of the Rui State" is held in the Shanghai Museum from 9<sup>th</sup> May to 12<sup>th</sup> August of 2012. It is not only an exhibition cooperated by the Shaanxi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Hancheng Municipality and Shanghai Museum, but also enlisted as one of a series exhibitions of Shanghai Museum to celebrate its 60<sup>th</sup> Anniversary.

## Articles on Special Themes

### Literati Spirit: Art of Chinese Bamboo Carving (Written by Xia Beibei and Photography by Lu Cheng)

The symposium on Chinese bamboo carvings was held on 28th and 29th of June, 2012 at the end of the exhibition "Literati Spirit: Art of Chinese Bamboo Carving". As the first symposium on this special subject, there are 56 participants in this field from both home and abroad, with forty participants presenting theses and 21 giving speeches on the themes of the history of bamboo carving, Chinese and foreign collections, and bamboo carving culture as well as its exchanges. The heated discussion and various views on the study of bamboo carving has exerted an far-reach impact on this category of Chinese handmade art.

## Essay on Cultural Relics

### Museums as a cultural strength in the system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By Chen Xiejun)

In the course of cultural reform, growth and boom, we have got building "three systems" on our agenda. The "three systems" refer to the system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the system of cultural industry and the system of cultural market. The writer of this article has examined the role of museums in the system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and pointed out their significances in helping cultural growth and boom.

## Vision on Cultural Relics

### An Epitaph for Zhang Shenxue (By Wang Zaijing, Huang Yongjiu and Zhang Tongxin)

### A study on the Annals of Xi'an that is dated 44<sup>th</sup> year of Qianlong Reign and its value (By Dang Bin)

###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Buddhist nimbi found in the early Mogao Grottoes and Yungang Grottoes

(By Wang Shujing)

### A second addition to lost articles by Wang Mingsheng (By Wang Guangqian)

## Masterpiece Appreciation

### Excavations from the Wangs' cemetery (By You Baoming)

#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博物馆文化的力量、情怀与智慧

## Museums as a cultural strength in the system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撰文 / 陈燮君

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过程中，“三大体系”的建设摆上议事日程。“三大体系建设”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文化产业体系的建设，文化市场体系的建设。探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博物馆文化的力量、情怀与智慧，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题中应有之义。

### 博物馆文化的力量来自于 “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很值得探讨，涉及的内容很多。如怎样来避免市民基本文化权益差距的扩大，如何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怎样把文化的影响寓于服务之中。今天我们讨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与博物馆的发展，这个“服务”应该在原来的意义上深化一步：要把文化的影响寓于“服务”当中。同时，通过我们的服务和事业的发展，促进人际的文化交流，提高市民的道德素养，促进社会文化的组织化程度的提高。

养育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博物馆文化的力量、情怀与智慧，是中国进一步发展、崛起的文化准备。时代呼唤文化，文化凝聚力量。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满足

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加强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必须坚持政府主导，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让群众广泛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各类公共场所要为群众性文化活动提供便利，实现资源整合、共建共享。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上海博物馆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的重要文化窗口和艺术殿堂，展示着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承载着炎黄子孙的历史文脉与辉煌业绩，播扬着城市文化的民族精神与人文风采，同时也融入了上海几代文博工作者的辛勤耕耘与悉心养育的“精、气、神”。上海博物馆既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人文资源，又担负着沟通南北和融会东西的文化使命。上海博物馆至今已经走过了近60年的发展历程：从陈毅市长题写馆名、南京西路原址的艰难创业，到河南南路旧馆的卧薪尝胆、锐意变革；从人

民广场新馆的顺利建成到以“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为标志的系列大展和几次国际研讨会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这每个飞跃都记载了上海博物馆视自己为城市公共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生命体，托起民族文化的辉煌，进行中华文明的传承，解读历史，净化心灵，播扬先进文化，守望精神家园。上海博物馆新馆已走过十多个春秋。十多年来，我们以真诚执著的人文情怀、创意无限的文化情怀和“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情怀，显示博物馆文化的力量与智慧，进一步为上海城市文化的多元化、国际化、创新化与和谐化作出了新的贡献，也为培养城市文化气质、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和塑造城市文化魂魄作出了积极努力。

博物馆文化以其民族凝聚力，诉说着民族

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博物馆文化以其历史穿透力，演绎着漫长历史的沧桑巨变、岁月坦诚；博物馆文化以其文化渗透力，寻觅着中华文明的悠悠源头、绵绵根脉；博物馆文化以其艺术感染力，守望着精神家园的世代传承、人文自豪；博物馆文化以其全球影响力，促进着世界文明的文化对话、智慧养育。我们记得“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在上海博物馆落下帷幕的那个夜晚。在上海博物馆的50年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展览是把闭馆时间定在子夜的，让最后一批观众在迎接晨曦时离开，气氛比开幕式还隆重热烈。在办展的三四十天间，每天凌晨，摄氏零下五度，在严寒中开始形成队伍，直至早上开馆。进馆后，在两个展厅前依然排起长队。在二楼展厅的《清明上河图》前，一排就是几个小时。《解放日报》为之刊登长篇通讯《长队



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来访

优美——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的告诉》，记者的文字是客观的，又是深刻的：“不是计划时期抢购凭票商品，不是春运高峰苦候返乡车票，不是房产旺市竞买火爆楼盘。前所未有的长队，史无前例的人潮——上海人排队看书画。……一座城市里的这样一支‘长队’，已经远远超越了业界观摩的意义。这是一座城市的朝圣。如果不是因为虔诚，华发老人怎能在零摄氏度中伫立；如果不是因为真挚，花季学子怎能在寒风中守望；如果不是因为景仰，背着双肩包的欧美教授怎能一出机场就奔进了这支队列。……看一次书画展要排5小时的长队，奢侈了吗？不值得吗？5个小时排队，何尝不是5个小时情绪酝酿；5个小时等待，何尝不是5个小时心境净化。珍绝永远是稀缺的，排队也将是必然的。一座崇尚精品

文化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这样的长队是必须的、优美的，是最动人的城市风景线。”很快，上海高中二年级语文课本（试验本）、上海七年级中学语文课本（试验本）分别选了有关这次国宝展的文章《百代法书》和《上博今日无眠》。“文化热浪”席卷了申城，新世纪的上海完成了一次颇具辐射力的“文化轰动”。这个“国宝展”，打动人的不仅仅是72件顶尖水平的国宝，还有伴随“国宝展”而呈现的民族凝聚力，它诉说着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一个展览，为何会形成一次“文化轰动”？因为这次世纪大展是国之瑰宝的集中亮相，晋唐宋元的盛大巡礼，千年遗珍的隆重检阅，书画艺苑的旷世览读。这一展览所带来的“文化轰动”为什么经久不衰？因为这是民族凝聚力的坦诚聚集，文化能量的整体释放，文化盛事的有效组织，

文化关怀的良性循环。这一展览明示：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书画、民族文化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21世纪的后辈们仍以华夏儿女的名义播扬先进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博物馆文化的第一种力量是民族凝聚力，在“国宝展”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这种力量是浓烈的、炽盛的、自觉的、令人终身难忘的。

癸未春日，上海博物馆成功地从美国把《淳化阁帖》存世最善本抢救回归，安然入藏，实现了又一个文化夙愿。《阁帖》返归，赫然成为中国帖学盛事，对于梳理帖学的悠悠源头、绵绵根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上海博物馆从美国抢救回归的《淳化阁帖》第四、七、八卷为北宋祖刻本，第六卷是泉州本的北宋祖本，是公认的国宝。国之瑰宝流失海外，上海博物馆持之以恒地关注国宝履痕，上海博物馆老前辈

徐森玉先生曾多方探寻《阁帖》去处，争取其回归。《淳化阁帖》的回归之路令人牵肠挂肚，经常萦回在上博人的心头。近十多年来，国之瑰宝为美国安思远先生所得，如不创造机遇、紧追不舍，一旦情况有所变化，国宝将永无回归祖国之希望。国之瑰宝当归则归！上博作出了千方百计抢救国之瑰宝回归祖国的重要决策，并成功抢救回归。《阁帖》回归后，上博及时举办了“扬我中华文化，壮我中华精神——《淳化阁帖》最善本大展大赛大讲坛系列活动”。一部帖学经典集结了跨越时空的书法帖学关注，牵动了一座城市的民族文化根脉，激励了老老少少调遣笔墨的情怀，引发了持续一年的帖学思考。围绕《淳化阁帖》最善本的回归，汪庆正副馆长夜以继日地为特别展览的筹备及其一系列普及教育活动开展工作，他还在繁忙的工作间隙，收集、查阅大量资料，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在学术上取



美国罗斯夫人访问上海博物馆



“竹镂文心——竹刻艺术特展”开幕

得了重要成果。在《阁帖》回归之时，汪先生说过：《淳化阁帖》的研究比较艰深，普及工作也不易。如果要问这两个问题，一是“淳”字怎么写，二是“淳化三年”翰林院侍书王著编帖之年对应公元哪一年，对于这么简单的问题也不是大多数人答得上来的。可是，“大展大赛大讲坛系列活动”举办一年之后，在上海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一天，汪先生偶尔坐出租车，因他在电视上宣传普及《淳化阁帖》次数多了，驾驶员一下子认出他来，脱口而出：“这不是‘淳化阁帖’吗？”汪先生的朋友说：“你呀，可以改名了，复姓‘淳化’，名‘阁帖’！”

#### 博物馆守望精神家园的时代情怀

上海博物馆是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建馆60年来始终以发展城市文化为己任，以真诚执着的人文情怀为几代“上博人”的共同追求。1996年，上海博物馆新馆建成以后，已日益成为上海城市文明的一个地标，成为上海城市精神风貌的一个象征，成为“上海都市胸膛上的一座艺术殿堂”。我们在实践中感悟到：正是因为博物馆的真诚执着的人文情怀，才使参观博物馆成为观众的持续的向往；正是因为博物馆观众对于博物馆的厚爱和倾情，才使博物馆的发展赢得了永久的活力。

上海博物馆老馆长马承源先生说：“博物馆的发展不是钱的问题，也不是文物的问题，最根本的是队伍的问题。”长期以来，以人为本的队伍建设的理念牢固地树立在上博几代馆长和领导班子的中心。上海博物馆以文化的自觉重视队伍建设，以人文的真诚提升队伍的学术境界。长期以来，马承源、汪庆正等老馆长和老一辈文博专家严格管理、言传身教，以自己的高风亮节感染人，以自己的学术睿智激励人，



韩国外交部长访问上海博物馆

不断地提高队伍的文物鉴定和专业研究水平，培养了传承发展的学科带头人。

上海博物馆的发展与荡漾真诚的人文环境是分不开的。新馆建成以后，上海博物馆的硬件设施有目共睹，软件管理也日趋强化，各项业务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是维持现状还是自我加压、再创辉煌，上博选择了后者。上博始终倡导在真诚执著的人文环境中“超越自我”。为此，上海博物馆的党政班子明确提出了弘扬“敬业、创新、一流、合作、务实”的“上博精神”。敬业就是忠于职守，这是“上博精神”的基础。在其背后支撑的是一种默默的奉献精神 and 强烈的事业心和使命感。创新是上博精神的灵魂，上海博物馆各项工作的不断创新是博物馆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前提和保证。一流是目标，是对事业的高标准、严要求。上海博物馆的一流精神体现为一流的收藏、一流的管理、一流的研究、一流的展示、一流的服务和一流的社会教育。合作是上海博物馆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通途。合作精神体现为党政班子的合作，上下关系的合作，部门之间的合作，还体现在馆与馆的合作，文博系统与其他系统的合作，上博与国内、国际博物馆的合作等方面。务实是工作作风，求真务实是对待工作的科学态度。脚踏实地的务实作风保证了上海博物馆各项工作的稳步发展。“敬业、创新、一流、合

作、务实”的上博精神是上海博物馆努力做到“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动力，使人文环境真诚执著，又反哺了更为浓烈的文化真诚。

上海博物馆在公益性服务上开启了走向社会的新途径。1998年举办了新馆首届“中学生夏令营”，从2000年开始，围绕“博物馆与现代都市”、“博物馆与社区建设”、“博物馆与全

球化”、“博物馆与青少年”等主题，每年举办一次“5·18国际博物馆日活动周”文博知识宣传普及活动，包括组织全市性的中学生征文与文博夏令营、建立学校型文博基地、举办社区居民的收藏展览和专家陈列室讲解、策划专题新闻报道等内容，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在未成年人爱国主义教育方面有参观导览与



“阳光照耀你我他——庆祝‘六一’百人创作百米长卷”活动

博物馆体验活动、文化实践与艺术体验、学生讲座、夏令营活动、行走上海、教师研习会活动等。2010年，共开展各类文化活动200场。其中讲座有“博物馆日”、“开放的艺术史”、“特展”、“志愿者”、“九州文化”、“布文化”、“建筑”、“书法艺术”、“岁时节日”、“陶瓷文化”、“玉文化”、“纸文化”等专题109场，听众人数2.1万余人次。2011年利用观众阅览室开展了“广场201”读书沙龙活动，有“兰亭雅集”、“如何上好历史课”、“中西医对话”、“戏剧与文学的碰撞”、“评弹艺术赏析”等。上博网站在文化部、团中央、广电总局等主办的第四届中国优秀文化网站调查评估活动中，作为文物类网站荣获优秀文化网站的奖项。

上海博物馆与捐赠者之间，有着异常亲密的友谊，相互倾诉真诚执著的人文情怀。社会上收藏家以及他们后代的无私捐赠是上海博物馆得以具有丰富馆藏的一个重要来源。近60年来，捐赠文物的有1000人次以上，捐赠的等级文物和一般藏品的总数达11万件以上，其中有很多是上博的重要馆藏。在上博的前厅“金榜”上按年度排列着这些捐赠人的名字，上博以此铭记捐赠者。50多年前捐献国之瑰宝——大克鼎、大孟鼎给上海博物馆的百岁老人潘达于老人过百岁生

日，上博举办大克鼎、大盂鼎联袂展出的特别展览，举办隆重的百岁寿庆。美籍华人许骧夫人捐赠“明代文徵明行书扇面”等古字画文物；庄贵仑先生捐赠明清家具；菲律宾庄长江先生、庄良有女士代表庄氏家族捐赠庄万里先生“两轩”书画珍品233件。为表彰庄氏家族挚爱中国、热爱中国文化和支持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的真诚精神，上海市人民政府向庄氏家族的代表庄长江先生、庄良有女士颁发了白玉兰荣誉奖。同日，在上海博物馆隆重举行了“菲律宾庄万里先生两轩珍藏书画精品展”的开幕仪式。张永珍博士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以高价拍得清代雍正年间景德镇官窑烧造的一件粉彩蝠桃纹橄榄瓶。她毅然决定把这件罕见的珍品捐赠给上海博物馆。上海市人民政府向张永珍博士颁发了白玉兰荣誉奖。上海博物馆为此特别举办了“张永珍博士捐赠清雍正粉彩蝠桃纹橄榄瓶特展”，永久收藏并展出这件流失海外多年的珍品，使之从此不再飘零。正是这种亲切关怀和务实的工作作风，使上海博物馆的朋友越来越多，捐赠活动持续进展，上海博物馆的藏品不断得到充实与丰富，上博以灼热的真情赢得社会对于上博的更为浓烈的真诚与倾情。

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以其独有的文化资源和文化方式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构成了独特的博物馆文化。博物馆文化解读历史，吸纳经典，展示文明，拒绝浮躁。博物馆文化以藏品等文博资源为基础，与当地城市的人文与自然环境相适应，努力为城市文化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博物馆文化的每一次新创意和新举措都将丰富和提升城市生活的文化含量。当今社会是一个交往普遍化和紧密化的全球化社会，是一个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的社会，是一个充满各类文化因素的多元社会。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要求博物馆文化有新的创意。这种创意标志着新的博物馆理念的酝酿和构建，意味着传统博物馆思维范式和行为模式的转换，意味着博物馆的收藏保管功

能、研究功能和社会教育功能这“三大传统功能”的现代化。以人为本、关注人的生活和命运、重视人的需求，正成为博物馆文化新的思考点。博物馆用“润物细无声”的方法，滋润着城市文化，养育着城市风骨，弘扬着民族精神，传承着人类文明。

上海博物馆积极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展览交流、学术交流、人员交流、博物馆文化礼品开发的交流合作日趋重视。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间，上博共举办或参与出境展览近100个，其中近70个是在新馆落成开放后举办的，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强，展览涉及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等22个国家98个文博单位。与此同时，我们还从海外引进展览54个，其中新馆落成开放后引进展览44个，占总数的五分之四强，与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等22个国家50个文博单位开展了合作交流。这两种形式的展览交流，为我们开阔眼界、转变思路、培养人才、提高学科研究水平、融入国际博物馆大家庭，推动上博各方面的工作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 博物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历史使命

在上海博物馆召开的国际博物馆协会亚太地区第七次大会，诞生了世人瞩目的《上海宪章》，对博物馆应负起保护无形文化遗产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任进行了庄严的承诺。与会的26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50名代表表示要坚定地肩负起大会以后传播与实践《上海宪章》的光荣任务，实现神圣的历史使命。

《上海宪章》以“博物馆、非物质遗产与全球化”为主题，确认民族、地域和社区创造性、适应性与独特性的重要意义，认为声音、价值、传统、语言、口述历史和民间生活等应在所有博物馆与遗产保护活动中得到认可与促进。《上海宪章》提议：作为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设性合作伙伴的推动者，博物馆应确认亚太地区文化的丰富多样性。创立跨学科、跨行业的方

法，使可移动与不可移动、物质与非物质、自然与文化的遗产融为一体。迎接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与威胁，制定办法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文化、技术和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制定全面开展博物馆和遗产保护实践活动的档案记录方法与标准。确定试点项目，为建立社区参与制定非物质遗产资源清单的方法做出示范。努力确保以符合地方特色的方式，真实地保护、展示、诠释遗产资源。制定符合重要遗产资源保护法、公约和法规的公众活动项目和游客管理对策，并尊重社区团体作为非物质遗产的保管者、监护者和看守者的规定和礼仪。鼓励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有益交流，以促进和平与社会和谐。评估并着手开展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统一管理所需的培训和能力培养。用恰当的语言提供全面解说，并尽可能聘用非物质遗产资源当地的保管人员。促进公共与私人部门的积极参与，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当地的专家、资源和机遇，实现资源的多元化，从而有效地保护所有遗产资源。为博物馆和其他遗产机构建立一套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相结合的标准与方法。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各种活动项目为保护与宣传非物质遗产所做出的努力，并强调在拟订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过程中专业机构参与的重要性。

作为《上海宪章》的诞生地，上海文博界如何应对庄严的承诺呢？应对思路理应是：对不同类型的博物馆应有不同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内容及其特征，对艺术、历史类博物馆和人物纪念馆应重点保护和开发物质文化遗产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大力发展行业博物馆，全面、系统、互补地形成博物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博物馆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舞台，还应依靠社会和社区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各种服务。我们还要进行博物馆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和科学方法论等跨学科的研究，积极采取现代科学技术和先进手段，进一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新的理论思考，积累新的实践经验。

长期以来，博物馆在物质文化遗存的保护和研究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而一旦把这方面的经验移植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来，必将促成两者之间在管理上的有机结合。当然，博物馆的工作者首先应该接受这样的观点，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在博物馆得到系统化的管理和保存，在人类学博物馆及与人文历史相关的博物馆中，这种应用更为广泛。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随着这种应用的深入，将推动在未来博物馆中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一体关系的建立，进而在博物馆领域开始一个新的里程。

上海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是和它对文化遗产的认知过程相一致的。主要表现在从最重要的单个有形文物或古迹的保护逐渐扩大到对历史街区、城镇和自然遗产的保护。1950年7月，刚成立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即着手调查本市的古建筑，实施了对点春堂等49个文物建筑进行保护的工程，从此开始了新



与来访的宁波博物馆同行座谈交流

上海保护物质文化遗存的历程。到目前为止，上海已拥有市级以上的文物保护单位130余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虽然有个认识过程，但确实也一直在践行，其表现主要是民间文化的抢救和保护。如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组织对民间文学艺术诸如文学、音乐、歌舞、戏曲、说唱、剪纸、皮影、刺绣、编织等等，进行抢救、挖掘和整理，采取笔记、图画、记谱、录音、

照相等方式对传统技艺进行整理，成功地抢救了许多已濒临危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特别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了首批“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被称为“百戏之祖”的中国昆曲名列其中，这更是提高了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的认知。同时，以博物馆及相关文化单位为主体的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网络开始逐步建立，这将为以后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上海拥有极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以工艺美术来说：上海的玉雕、牙雕、木雕、漆雕，上海的绒绣、手绣、机绣，以及瓷刻、竹刻、细刻、砚刻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就声名鹊起，稍有年纪的上海人都知道上海曾有过“江南灯王”何克明、“面人赵”赵阔明、剪纸名家王子淦以及绒线编结大师冯秋苹等工艺美术高手。此外，上海的民间艺术也有众多特色，如宝山区月浦镇的锣鼓、浦东新区川沙镇的故事、崇明县新河镇的民乐、金山区的农民画等等，至于其他非群体性的遗产，则更是不胜枚举。如此多姿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是我们能够而且应该搞好这方面工作的依托和动力。

近年来，上海的博物馆建设发展很快，许多博物馆在发展中也充分注意到了对非物质文



“金玉华年——陕西韩城出土周代芮国文物珍品展”开幕

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这其中有些是博物馆工作本身的需要，如上海博物馆的文物修复水平在全国享有盛誉。上海博物馆采取了“人才培养、人事制度改革”的新举措，使研究鉴定和文物修复等方面的人才正不断得到发展。同样，上海历史博物馆的上海民俗风尚研究也是成果斐然。有些博物馆本身的建立，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保护、研究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己任的。如上海乐器博物馆、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等等。随着博物馆高科技，特别是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博物馆在开展这项工作时，保护方法、保护手段也都有了明显的多样化趋势。比如采用多媒体的音视信息采集、数字化的保存技术，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得到良好的、长期的保存。当然从根本上说，由于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是人，因此博物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必然涉及到人，加强人员培养，是顺利开展保护工作的前提。同时，艺术类的博物馆应努力保护和开发物质文化遗产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千年遗珍的传迁过程中，物质文化遗产演化、积淀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揭示与研究，显然增添了物质文化遗产的确定性、历史感、传奇性和文化含量、人文精神！

# Contents

## Major Events

### Golden Age of the Rui State: Zhou Dynasty Treasures from Hancheng, Shaanxi Province

(Written by Qin Tong and Photography by Xue Haobing)

In 2005, a large excavation site of Zhou-dynasty cemetery was found in Liangdai Village, 7 kilometers away from the northeast of the city of Hancheng, Shaanxi Province. This excavation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study of the Rui State in various aspects including its geology, Zhou-dynasty kingdom system, important vessels system, funeral services, and so forth. This excavation was included into the Ten Archaeological Finds in China of the Year 2005, and the site was ranked as the Important Cultural Heritage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2006. The Rui-State cemetery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s from many walks of the society and to introduce its excavation fruits, the exhibition "Golden Age of the Rui State" is held in the Shanghai Museum from 9<sup>th</sup> May to 12<sup>th</sup> August of 2012. It is not only an exhibition cooperated by the Shaanxi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Hancheng Municipality and Shanghai Museum, but also enlisted as one of a series exhibitions of Shanghai Museum to celebrate its 60<sup>th</sup> Anniversary.

## Articles on Special Themes

### Literati Spirit: Art of Chinese Bamboo Carving (Written by Xia Beibei and Photography by Lu Cheng)

The symposium on Chinese bamboo carvings was held on 28th and 29th of June, 2012 at the end of the exhibition "Literati Spirit: Art of Chinese Bamboo Carving". As the first symposium on this special subject, there are 56 participants in this field from both home and abroad, with forty participants presenting theses and 21 giving speeches on the themes of the history of bamboo carving, Chinese and foreign collections, and bamboo carving culture as well as its exchanges. The heated discussion and various views on the study of bamboo carving has exerted an far-reach impact on this category of Chinese handmade art.

## Essay on Cultural Relics

### Museums as a cultural strength in the system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By Chen Xiejun)

In the course of cultural reform, growth and boom, we have got building "three systems" on our agenda. The "three systems" refer to the system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the system of cultural industry and the system of cultural market. The writer of this article has examined the role of museums in the system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and pointed out their significances in helping cultural growth and boom.

## Vision on Cultural Relics

### An Epitaph for Zhang Shenxue (By Wang Zaijing, Huang Yongjiu and Zhang Tongxin)

### A study on the Annals of Xi'an that is dated 44<sup>th</sup> year of Qianlong Reign and its value (By Dang Bin)

###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Buddhist nimbi found in the early Mogao Grottoes and Yungang Grottoes

(By Wang Shujing)

### A second addition to lost articles by Wang Mingsheng (By Wang Guangqian)

## Masterpiece Appreciation

### Excavations from the Wangs' cemetery (By You Baoming)

# 张慎学墓志铭

## An Epitaph for Zhang Shenxue

撰文 / 王在京 黄永久 张童心

山西省夏县治北五十华里的胡张乡如意下晁村，位居鸣条岗群岭环抱的环形盆地北部宽阔台地之间。在村北 400 米处高地中央有片张氏祖茔，旧时茔域内亭、阁、牌楼、建筑规模壮观，墓道两侧翁仲石兽排列有序，墓地碑刻耸立，村民俗称其为“石人石马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破封建迷信和农田生产运动中遗存的建筑、石构件与碑刻、石兽皆遭拆除与毁坏，甚至作为烧石灰所用，继之茔域垦为耕地，如今仅遗两大碑座之石刻仍孤零守候着。2010 年，村民冬浇小麦时，受水浸泡，渗塌出一直径 2 米，深 2 米余的不规则圆坑。次年清明节，张氏后裔上坟祭祖时，方晓知实情，经观察，发现坑底露出一制作规整的方形石块，好奇的青年人下坑挪动石块，发现为上、下两方，且表面刻有文字。为防盗窃或遗失，经族中长者商议，于 5 月中旬向县文物部门报告了此事。经派人勘查，确定为县域迄今发现最大的一合墓志铭，故于麦收后的 6 月 21 日，组织力量搬迁到司马光墓文管所收藏。

志石方形，有盖和铭两石相扣合而就。宽 81、厚 15 厘米，盖、铭两石周边皆设窄边框，刻卷草纹，四角则装饰以太极和钱币图。盖石中部两竖行篆书“清故侍御趋正张长公墓志铭”。铭文楷书，41 行，足行 38 字。铭文后无纪年落款，从铭文中所记张慎学卒于清顺治九年（1652）推测，刻铭石与殡葬时间也应为九或十年间。

铭文附录于下：

侍御张君墓志铭

特进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前太子太保，工部尚书，吏、兵二部右侍郎，充丙戌、乙丑两科殿试读卷官，通家旧治生，金之俊顿首拜撰。

赐进士出身，刑部右侍郎，仍加壹级，宗弟鼎延顿首拜书。

赐进士出身，户科左给事中，眷年弟阴润顿首拜篆。

君讳慎学，字趋正，号敬微，其先世稷山县人，远不可考。始祖讳仙，徙居县治北如意里下晁村。越数传有号九老者，家声始振。再传而有讳振者，有忍德，情笃谊伦。振生庆，为公本支祖，居大窑中，数世同居，子姓繁衍至六十余人，毫无间言，人称为“大窑居士”，于是张氏始大著。庆生秉，为沃邑椽。秉生伟，为公高祖，孝友纯笃，隐居未仕。伟生宗智，为运司椽，家殷多贮粟，岁值大，或劝之贵，应曰：吾储此以待亲友之不给者，宁贾利也。公平正直月丹称之。智生应举，为君大父，攻举子业，未竟厥志。举生其才，字用吾，为君考，生而颖异，读书辄数行下，博通五经，淹贯百家，尤究心性理、洪范、天文、地理诸书，多所发明。开五经馆教授来学，壹时四方及门者五百余人，所成就弟子多取科名。且筑堡御贼，捐资救荒全活千余人。以君贵，封文林郎元氏县知县，从祀乡贤。生丈夫子二，长即君，在娠，考征祥于梦，既生，甫释襁褓则有志，不好与

群儿戏，君考喜曰：此儿质敏，当以麟经授，异日必光大我家。果垂髫游泮，寻食饬，未几登癸酉贤书，丁丑成进士。除中牟县令，凡强恃力、富恃资、刑恃赎者，必治不贷，于是猾胥股栗，善类安全。值流寇披猖之际，缮城垣，练乡勇，戒备毕具，卒免寇警。未及期月，循声啧啧。起调繁直隶元氏县，仍以治牟者治之，然难治过于牟，岁丁奇荒，萑符咨逞，流离满目，饿殍载野，君为立粥厂煮赈，综理有方，咸饱食惠甚，而孩赤之路弃者也为觅乳媪煦哺之，活老幼饥民无算。且平日修举荒政，积谷甚多，邻邑闻之为之请于大吏借粟济荒，君慨然以余粟如所请，而全活者又不独元氏之百姓也。治状推畿辅第一，坐朴拙故，仅移枢曹郎，一时公论抱不平，而君坦如也。

新朝鼎兴，重耳目之司，采风望堪为御史者，君始得改授，爰视长芦盐政，冰孽持躬，铁面执法，诸所为厘奸剔弊惠商恤民者，法制灿然备举。迨事竣，报命，上念苏松等郡财赋重地，国家根本系焉，吏猾民困非名御史往视不可，遂以君往。君揽辔入境，微服廉访，凡积蛊巨憨，小民不敢言职官不敢问者，君悉得其实，籍名擒治不稍纵。条下六禁，风节凜然不踰时，而吏畏民怀澄清之效立着。吴民家家户户祝，方拟期年报竣之后，尚欲诣阙攀辕大竟君施，会廷议，撤还巡方，輿情怏怏，以为监察得人如此，胡为一旦议撤，使君子病焉小人幸焉，于是吴民叩阍无路，乃为君画像立祠，谋世其蒸尝以识报德之思。比有识者，谓监察如君而遽撤以去，倘天欲平治天下旋当复遣。已而圣主乘干独揽万机，果亲正人纳正言，仍分遣御史巡行各路，且监轩戒谕较昔尤毖重焉，监察之撤而旋复者实自君之有大造于吴始也。君以资望并最，奉特简按视畿南北，举夙志之未究于吴者悉措之，鞞近地纠绳贪墨，不顾

权势为小民除疾苦伸冤抑，必呕尽心血乃已。按部未踰年，卒以劳瘁成血症致不起，于顺治九年壬辰五月二十四日卒于京邸之正寝，年五十有八。朝之士大夫以及街巷之儿童妇女靡不嗟悼痛伤，虽按畿之日视吴差久而天又夺之以去，岂畿民之不幸与吴民亦相去不远耶，抑民生当憔悴之日，有功德及于民者天反不为之助耶。君同母弟次君慎修，偕其孤宿 扶柩旋里，将营窆窆，而以状来乞余铭。余维畴昔待罪枢贰，于君有寮，友谊比年，君按吴，余又部下呕吟思慕之一人，君生平之立身居官堪为世法，而不可使之湮没不传者，余颇悉其概，其何能辞不铭也。君元配解氏，处士解三召之女，封孺人。男一，宿 ，未聘，侧室王氏出。女三：一适闻喜县庠生崔俊长子拔贡崔尔瞻；一适闻喜县岁贡贾壁长子国学生贾价奇，解氏出；一尚幼，王氏出。

为之铭曰：烹鲜两地，所去见思，乘驄而去，绘像立祠，富贵浮云，于君何有，功德在民，名不可朽。

发现墓志铭后，笔者查阅了地方志和相关史料，又数赴如意下晁村走访调查，获取了张氏家族部分资料，现汇总考证如下。

### 一、张慎学其人

《夏县志·贤才》载“张慎学，其才子，崇禎癸酉（1633）举人，丁丑（1637）进士，初宰中牟，修武备以遏流寇，调元氏，广积储以备凶荒。国朝授长芦巡盐，商民均惠，继巡苏、松等郡，擒治巨憨，按视畿南北，纠核贪残，审理冤抑，钩稽案牘，昼夜劳瘁，卒于官。”“顺治十年（1653）崇祀乡贤祠”。

铭文所述张慎学生平与县志记载相符，且更为详尽。明确了在明崇禎间先后任中牟县令，起调直隶元氏县，皆以治绩卓著称于当时。然在考绩之时，因“坐朴拙故，仅移枢曹郎”，却坦然处之。“新朝鼎兴”（清顺治初），“爰视长

芦盐政”，其间“铁面执法”，“法制灿然备举”。朝廷以苏、松等郡为“财赋重地”，因虑及此处“吏猾民困”，任命其为御史而往视之，受命后，“微服廉访”、“籍名擒治”、“条下六禁”，取得“吏畏民怀”、“吴民家户户祝”之政绩。以至撤还巡方后，吴民尚为其“画像立祠”。后朝廷又“分遣御史巡行各路”，奉调按视畿南北。“呕尽心血之际”，不意“未年，卒以劳瘁成血症致不起”，顺治九年（1652）五月二十四日卒于京城，时年五十八岁。

张慎学，中崇祯十年进士，初任中牟县令，继任元氏县，宦绩颇丰。《元氏县志》六卷即由其主编完成。

据记载，1644年3月19日，大顺军攻克北京，李自成率军入城。进京后采取措施之一就是，限令明朝文武官员一概报名汇察，不愿仕者听其自便，愿仕者照前擢用。违抗不出者处死。也就在此时，张慎学任职于大顺政权。《台湾文献丛刊》辑录清李天根所著《燭火录》中，就直称其为伪官“（1644年4月26日，）……邹魁

明、赵开心、黄纪、修廷献、张慎学、刘养真授伪兵政府属。……”。在《甲申传信录》卷五中记载“李闯既入，五日，建设伪官……更官名，……3月21日，文武官仪入朝者三千余人。牛金星执缙绅点名，不用者发权将军、制将军处分，用者送吏部。既受职，止给小票，向礼政府领契，刻期赴任。……县令张慎学，山西夏县人，丁丑进士，官刑部主事。”虽墓志未记其在短暂的大顺朝期间任职，从相关史料的片言只语间亦不难看出其曾经任职于大顺政权的事实。

吴三桂举兵反大顺，李自成东征失利后，4月26日返回北京，29日仓猝举行典礼即皇帝位，30日，大顺军撤出北京。5月2日，多尔袞率清军进入京城，随即发布文告，其中有“官来归者复其官”，降清的汉族文武官员都升级任用。张慎学再次因清廷为稳定统治而采取的政治措施中出任官职。在《顺治朝实录》中就有“（1644年）乙亥，上自盛京迁都燕京，……兵部员外郎张慎学为四川道监察御史，……”，墓志中所记“爰视长芦盐政”，应为此时。另在明清档

案中有“多罗机打喇罕”于顺治二年四月十二日所上奏折“为四川道监察御史张慎学才识敏卓，两差皆有成效，今报丁艰，循例请回籍守制兼讨给勘合，念本官家在山西，久经平定，相应令其回籍，乞敕下兵部给与勘合”，也明确了张慎学任职期间的宦绩。

顺治初年，一再强调惩贪之事。巡按之派而复停，停而再派，是顺治年间一件震动朝野的大事。监察御史官阶并不高，才正七品，但一旦被皇上钦点为巡按，



就身价百倍，权大责重。一逢巡按来临，总督、巡抚固然要对其尊敬，布政使以下都得听从这位七品官吩咐，尤其是道员、知府、知县更是奉承唯谨，毕恭毕敬，因他是“代天子巡狩”。

《顺治朝实录》载“顺治五年三月甲子，补原四川道监察御史张慎学为福建道监察御史”，“顺治五年五月丁卯，福建道监察御史张慎学巡视长芦盐政”。《江苏省通志稿·大事志》记载“顺治六年十一月乙未，遣御史张慎学巡按苏、松”，“乙未，福建道监察御史张慎学，巡按苏、松”亦与墓志文相符。顺治七年四月下旬裁革巡按，墓志铭所记“撤还巡方”即指此时。在《崇祯记闻录》中就记有张慎学任苏松时之宦绩“四月初十日，新按台山西张慎学上任，甚有能声，……五月，苏松巡按张慎学，方在振作，特拿长洲县衙蠹周弘训等下狱责治，欲正重辟，因有新旨，将离任回京，遂令理刑王二府一夕毙周于狱”，《清稗类钞·胥役类》也有记载“顺治初，苏有周宗之者，为长洲县猾吏，横暴一时，为直指张慎学所访拿，杖毙之，大快人意”。顺治八年三月初，又恢复巡按之制，张慎学复受重用“奉特简按视畿南北”，《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八年三月十五日）帝谕派监察御史分巡各地，张慎学巡按顺天，……”。顺治帝极为重视巡按之事，在他们离京之前，专门召见和训示，四月初三，于太和殿召见巡按各省御史，赐茶、遣行。复出的张慎学到任后，“呕尽心血”，明清档案中存有张慎学奏折二：1.“顺治八年，巡按顺天等处兼理屯政监察御史张慎学谨题：为特纠贪秽道臣等事，畿内八府，祇设

十道监司分理，非洁己持公弗能胜任，臣凜奉严纶，毋纵容司道府庭而止参州县，继承天语参赃拏吏，敢不兢惕谘访近畿地方。廉得易州道臣张羽伟，贪横无忌秽迹漳闻，列其款迹纠参所当革职提问，与有名蠹役一并究拟，谨会同督臣张具题，伏祈敕部覆请将张羽伟革职，行臣等提问，员缺速遴廉能推补，谨题。”；2.“顺治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题为保定一带当往来首冲，供应浩繁，流府州县因真定驿递工料全复比例，恳复原额，伏祈敕部速赐议复，永为定例”。不到一年“以劳瘁成血症致不起”，于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病逝于京。

张慎学连仕三朝（明、大顺、清），虽官品轻微，但肩负新兴政权澄清吏制钦差御史之重任，且在明末清初政局动荡多变的环境下始终位居宦职，立于不败地位，且宦绩明显，也足以显示其见风使舵的政治本领以及恪尽职守的政绩。由于其官职七品，夫人解氏的封赠亦仅为“孺人”。村民传说他是开城门迎降大顺军的明代官员之一，据老者回忆，村中旧时每年招戏班演出时，严禁唱“白门楼”与“铁冠图”。<sup>（1）</sup>

而为其撰写碑文的金之俊，其政治生涯与张慎学相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金之俊，字岂凡，又字彦章，号息，江南吴江（今江苏）人，明末清初政治人物。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李自成入大顺军进北京，金之俊投降之并受到考掠，后被授为兵部侍郎。清军入关，他是最先出城投降，并以原职被任用。为清朝制定开国方略，上疏建议赦免京畿田租，以慰民望，献策“十从十不从”，累官至中和殿

（1）“白门楼”说的是吕布受到曹操联军征讨，孤军奋战多日，力竭困乏之极，坐于白门楼城头歇息时，被部将捆绑后献于曹营的历史故事；“铁冠图”说的是，明朝末年，朱氏王朝气数已尽，李自成兵围北京，崇祯召群臣商议，皆惜命自保。司礼太监杜秩亨暗中与闯王相通，只王承恩、李襄丞仍效忠朱明。崇祯命杜秩亨挂灯报警，杜酒醉将三盏红灯一并挂出，宫中大乱。崇祯无奈，狠心杀官，手刃公主并逼周妃自刎，乃出后宰门，吊死煤山。李承襄（又名李国桢）被俘后，闯王劝降，李求三件事，闯王应允后，李手刃杜秩亨等三人，自刎而死。剧情言明虽有忠臣义士亦难挽回衰亡命运，国之兴亡因果皆注定在“铁冠图”画轴中。这两折戏是为避讳张宗远、杜秩亨两人，（经查寻资料，张宗远无从考究，杜秩亨确有其人，他是献城迎降大顺军的明朝宦官之一，后又与李自成为劝降李国桢为条件而被斩首。）故与之相关的戏本不准在此演出，再者就是避讳张慎学不一而足的史实，因历史上国人对所有变节投降者都唾弃之，故当地亦有“陈家不唱白门楼，张家不唱铁冠图”之说。

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加太傅，清康熙元年（1662）告老还乡。家居期间，数有为匿名帖榜其门以谤之者，康熙九年卒。金之俊的人生行为受到江南士人唾弃，骂他为“汉奸”，乾隆时，将其划入《贰臣传》。金之俊在铭文中亦明示“余维畴昔待罪枢贰，于君有寮，友谊比年，君按吴余又部下呕吟思慕之一人”。故慎学墓志铭文由慎修携其侄宿求其所撰就情理之中了。

书丹人张鼎延：河南洛宁县德里村人，字慎之，别号玉调，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由行人考选兵科，崇祯年间曾官南京吏部郎中，不得志而回乡闲居。崇祯十三年（1640）十二月，大顺军攻陷永宁县城，鼎延匿于井中得免于难。入清后征拜吏部验封司郎中，后官至工部左侍郎，刑部、兵部右侍郎，顺治十六年（1659）卒。其著作有文集二十余卷，已失传。另有诗文散存于《河南通志》、《洛宁县志》。

书篆文人阴润：字太峰，崇祯七年三甲进士。

## 二、张氏家族史考

其先稷山人，有张仙者，举家徙居如意下晁村，实为该村张氏始祖。早期贫寒，越数世传至号九老者，家声始振。再传至讳振者，家谱中方有明确记载。振生庆，数世同居大窑中，子姓繁衍六十余人，人称“大窑居士”。庆生秉，始读书求学，为沃邑椽。秉生伟。伟生宗智，为运司椽。宗智生应时、应举。应时生其德、其策。其德生慎听。应举生其才。其才究心理学，开五经馆教授来学，门徒达五百余人。其二子慎学、慎修受熏陶脱颖而出。其才也以子慎学贵，封元氏知县，崇祯十六年祀乡贤；崇祯十六年镌刻敕牒碑树立于墓地（碑刻于上世纪60年代被村民搬至村中打破做油磨房的机械底垫石，表面文字多遭磨毁，如今仅觅到其中两断块，且一块中部留有圆径35厘米之凿孔），顺治间赠福建道监察御史。张氏家族名望始于其才，显达则始于慎学。慎学子宿，由庠生任四川南充知县，迁潮州府同知，祀乡贤。宿

生培，国学生，考铨主簿。其后裔再无从宦记录。慎修，顺治五年（1648）拔贡，八年中副车，县志载“考通判，事关利弊，慷慨敢言”。慎修生执中公。执中公生旭辰公。旭辰公生二子，次子观堂（观堂墓碑立于道光五年，后没入土中）。观堂生二子：鹤龄、朔，二人皆由廪入贡，尤善书。如今乡邻泊头村存有几通清道光间重修关帝庙碑刻，其工整的楷书碑文既由张鹤龄所书（鹤龄墓碑立于道光二十年，如今完整保存于后裔家中）。鹤龄生子绛，赐进士出身，诰授奉直大夫，湖北德安府随州知州，道光五年（1825）八年乡试同考官。绛生二子：思静、思肃，思静为国学生，思肃为监生。

其策生慎发，顺治间慎发以贡授广东按察司知事，升直隶邯郸知县，兴利除弊称循良，后补南皮令，两月卒于官，邯郸多人泣奠送柩至家，入邯郸名宦祠，康熙间入本乡乡贤祠。父其策以子贵封邯郸知县，赠文林郎直隶广平府。慎发生二子：宿炳，考州同；斌，考同判。

另有张星光者，康熙八年（1669）武举，十八年武进士，二十九年任台湾府南路营守备，三十四年升浙江黄岩镇标守备。其父赞化（家谱谓替化），以子贵，赠明威将军。旧时，村西官道旁树有一通大碑，据说就是张星光的，有“武官过此必下马”之说，惜于上世纪70年代在村办水利工程中遗失。现村中白衣堂壁间所存康熙五十三年修庙碑碣，即是由张星光撰文。

张氏还有一支张考，康熙五十三年（1714）举人，雍正元年（1723）进士，以庶常改刑部主事，历文选司郎中，视学河南，调广西学政，寻摄浙江温州府金衢副使。县志有载。其祖敦典，父四经皆封赠山东道监察御史。张考的宅院房屋多被后裔变卖，今已残垣断壁。

另有村白衣堂壁间康熙六年重修碑文后附布施花名中有“进士张吟”，县志载“张吟，顺治八或九年连捷进士，任广东肇庆府推官，补浙江台州府推官，未任而卒。”

再者，顺治十七年“窑头村创建三圣殿记”

碑文后功德主有“直隶永平府推官张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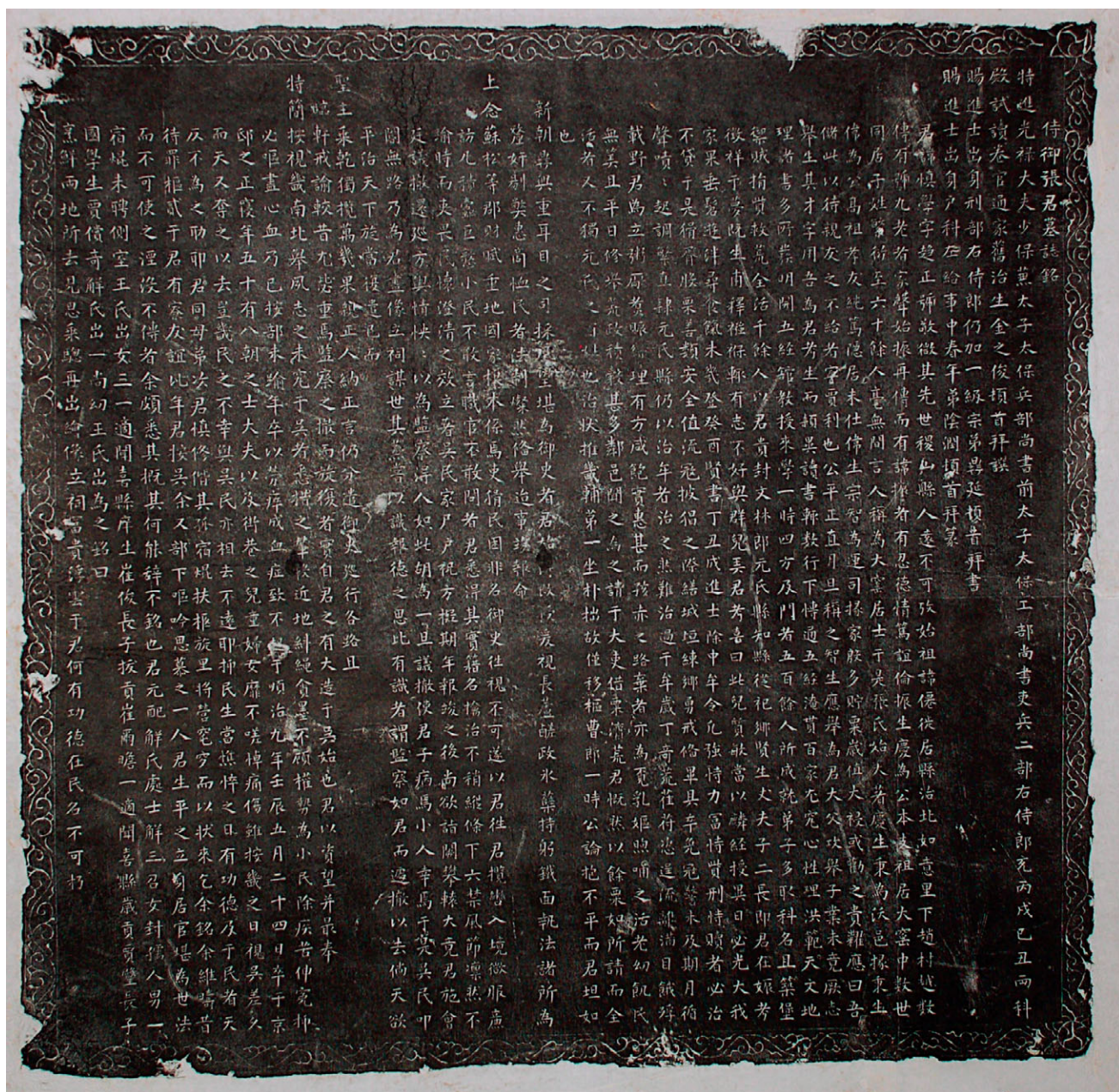
张有吉，据清道光七年碑记载，敕授文林郎吏部候选知县。

由此可见，张氏家族于明末清初仕宦频出，辉煌一时。清中叶后，虽也有步入仕途者，已是寥若晨星，而一度之辉煌与张氏族人崇尚文教大有关联，这也与张其才的授徒育人，门庭若市遥相呼应。

### 三、张氏家族的衰落

张氏家族作为如意下晁村的一门旺族，清

初又官宦频出，其故居也曾颇具规模，旧时当地俗称其为“张家胡衙”，据后裔回忆，张慎修的宅第门前旧时就有三幅皇封的旗杆石，又有花园数十亩，至今村民尚能指点“张家花园”遗址所处。传说张考亦是出生于张家胡衙。清中叶后逐渐衰落。慎修故居宅第的一部分于清中叶由其一支后裔（村民盛传系张学武之祖父）卖予陈姓人家，村民至今留传谚语道“张家的官，陈家的钱”，传说陈氏先祖早年经商于山西大宁县，至清末历时百余年，兴盛于清中期，广置田产，多达两千四百余亩，于是买下张慎修的“五



花串梅院”，又买其东院和前院，费银四百余两。如今在慎修故居庭房的梁际板上留有题记“道光五年正月十九日吉时宅主陈宗器……重修谨志”，说明至迟道光初年张氏宅第就已过继到陈姓名下。张考故居房产也在清末陆续被变卖，这些实据确证了张氏家族的兴盛与衰败史。

据考证，张慎学子宿，任潮州府同知；孙培，国学生，考铨主簿；之后，失去后代中举仕宦的文字记载，其宅第详情也混淆不明。如意下赵村张氏家族历史上除各支建有宗祠外，还拥有一总祠堂，而负责该祠堂的看护人则是长门张慎学的后裔，世代更替，未曾变更。上世纪60-70年代，总祠堂中的陈设多被以破四旧为由毁灭，最后一位护祠后裔趁乱将其中部分史料（如家谱、圣旨件、祖宗神轴画像等）包裹后吊存于院内枯井中，80年代取出存于家中阁楼上。90年代中期，被后人变卖，从此失去考证家族史的直接物证。

### 结语

据村中目睹过张氏家谱的村民回忆，家谱中记载慎修处多于慎学，因此族人间存有两种争论：一是慎学作为连仕三朝的伪官，虽在任职期间能恪尽职守，但被村民视为不齿，旧时有“张家坟中有无头官”的传说，从而历史上数次发生为寻找金头的盗墓案例。如今，村民尚保存有一块石碑楼额坊石残断，上刻书大字“监察御史张……”，刻名讳处石材断毁遗失，这是墓地建筑与石刻文物皆毁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运动的残留。二是有长门世代守护宗祠之遗风，家谱也秘不示人，为突出长门地位，宣扬慎学宦绩的多于慎修。在邻村窑头保存的清顺治十七年碑刻布施名录中有“巡按顺天八府监察御史张慎学拾两，拔贡通判张慎修二两七钱，”认为，该碑刻时间晚于慎学去世时间8年，不可能是慎学所为，应系后裔借慎学名望捐助之举。慎修官职不明，所见史料含糊其词。

为此，笔者经详尽考证，结论如下：地方

志所载与墓志铭所述相同，且墓志铭内容更为详尽，张氏一族中宦绩声望也无超越慎学者，在迄今可见的各种史料对其传记并无出入可言，只是后裔对其任监察御史一职有渲染夸大之词，这也符合传统民风。

据载慎修中顺治八年副车，经查阅资料，“副车”有三种解释：皇帝的从车、帝婿、清代乡试的副榜贡生。慎修的官职据县志载“考通判，事关利弊，慷慨敢言”，只能说明其处世风格，在其后裔的碑刻中亦无追述，但相传有“五花串门院”和张家花园的史实，据此推测慎修任职有两种可能：1.“皇帝的从车”。虽然窑头村的碑刻时间已是顺治末年，且记载慎修官职仍是“拔贡通判”，这或许是作为“皇帝的从车”官场规则不宜宣扬之缘故。再者，在其兄长慎学去世后，如作为位低职卑的慎修是很难求到一品大员金之竣亲自为其撰写墓志铭了。2.“乡试的副榜贡生”。其任通判一职，主要是“在知府下掌管粮运、家田、水利和诉讼等事项，为正六品官”，这也与县志所载相吻合。最终的认定尚需进一步史料考证之。

总之，慎学后裔无修史依据，因此时同族尚有数门兴旺，如慎修后裔大多一直到道光末年仍生活富足，传统伦理观亦不容其有此行为，加之家谱遗失，使得直接史证缺失无考。综上所述，有关张慎学之宦绩各种记载与史实相符，之所以产生误解，推测是对其“伪官”一生的贬低之词，如同金之俊的晚年境遇一般，从而才出现早年村中唱戏禁演剧本的主观意识。

从仕三朝的张慎学，既能保持官场的不败地位，又能恪尽职守，取得鲜明宦绩，与其从宦生涯中的政治手段密切相关，这一切又是历史事实所造就，在“城头变换大王旗”的风云变幻年代，能够做到这一步亦不失为明哲保身的聪明之举，在任职期间又能“纠核贪残”、“籍名擒治”、“铁面执法”、“钩稽案牍，昼夜劳瘁”。总之，墓志铭的发现，无疑对这一特殊时期的历史、政治等多学科研究提供了实物佐证，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 略述乾隆四十四年《西安府志》 及其价值

A study on the Annals of Xi'an that is dated 44<sup>th</sup> year of Qianlong Reign and its value

撰文 / 党斌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西安虽地处西北，却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充当着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它是黄河中上游最大城市，也是闻名于世的“丝路”起点。诗人杜甫在其作品《秋兴》中曾有“秦中自古帝王州”的诗句。“秦中”的核心区域，古云长安，今称西安。“帝王州”的名号于西安来说，可算是实至名归。曾叱咤风云、一统寰宇的周、秦、汉、隋、唐，以及先后执掌政权的新莽、西晋、前赵、前秦、后秦、大夏、西魏、北周等十三个王朝都曾在此建都，西安也因此享有“十三朝古都”的美誉。

自西周至今，古都西安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在不同的时期，西安（或称长安）的地位和作用不尽相同，但其作为西北重镇的身份一直未曾改变。虽然在历代方志书籍之中，内容涉及西安地区的着实不少，如：宋敏求《长安志》、程大昌《雍录》、何景明《雍大记》以及刘文恪、史文靖所修的《陕西通志》等。但是，专以西安为对象，内容翔实、贯通古今的，则只有清乾隆四十四年《西安府志》一部。

乾隆四十四年（1749），陕西巡抚毕沅、西安知府舒其绅等承旨主持编修《西安府志》，具体的纂修工作则由时任内阁侍读的严长明和当时一些知名学者共同负责，历时四载而成书。全书共八十卷，内容涉及古代西安的自然地理、建置沿革、名山大川、人口户籍、供赋物产、风俗民情、艺文金石、名胜古迹，历代大事、职官、人物、选举等十五大门，五十一类，号称“上可佐朝廷四库之储藏，下可备西安一郡之文献”。

作为记载西安数千年来历史的资料汇编，清乾隆四十四年《西安府志》在具备传统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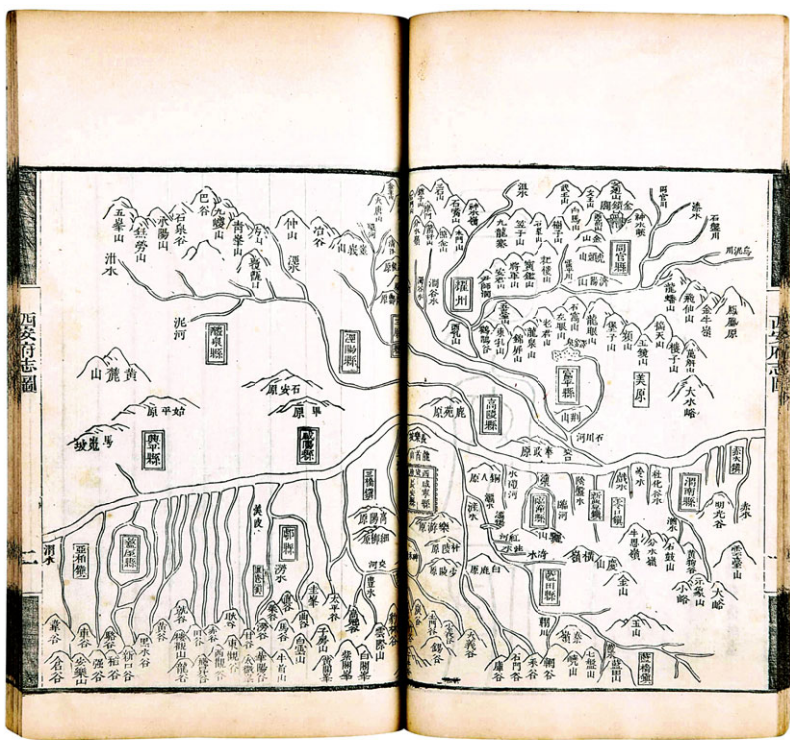
志资料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尚有其独特之处。

清代是我国地方志编纂的繁荣时期，而乾隆一朝又是清代方志编修的鼎盛阶段。除南方的少部分私人纂修志书之外，绝大多数方志都以任职官员领衔，由知名学者执笔完成。这种官方总领修志的行为保证了清代方志的权威性。这一时期的方志的纂修，无论是修志的理论、编纂机构的设置还是参与修志的人员，都具有很高的水平。在修志理论方面有章学诚曾对前代编修地方志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创立了方志编纂的理论体系《方志略例》；在编纂机构上，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立了方志局，从中央到行省再到府县都在修志。据《中国地方志综录》记载，现存清代方志总数多达 6510 多种；由于有众多学者参与到修志之中，方志编纂从体例的完善到史料的鉴别得到了保障。《西安府志》作为这一时期方志的典型作品，其领衔官员是当时朝野闻名的经史学家毕沅，他曾编纂《关中金石记》，在任期间曾主持整修了西安碑林、华岳庙，翻修司马迁祠，重建灞桥等事务，对西安府的情况可谓了如指掌。全权负责纂修事务的严长明曾为毕沅幕府，参与编修《通鉴辑览》、《一

统志》、《热河志》、《平定准噶尔方略》等，在方志编纂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此外，参与编修校对的庄炘、汪应楛、严观等人都是精通文史的学者。这样的人员配备，再加上官府对于《西安府志》的高度重视使得八十卷的《西安府志》更具权威性。

关于《西安府志》的纂修过程，舒其绅在其序言中曾有所提及，其中“无旧志可因”一句颇为引人注意。我国方志起源很早，秦汉时期的《越绝书》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华阳国志》都是典型的代表作。隋唐时期，全国性区域志相继出现，以《元和郡县图志》最具代表性。但这一时期的方志以总志为主。直到宋元以后，地方志的编纂日趋发达，总志、通志、府志、州志、县志等方志种类也日趋完备。明清两代更是我国方志发展的繁荣时期，流传至今的方志数量可观。在历代方志中，内容涉及陕西的宋元方志有 21 种，其中以长安为记载对象并存留至今的仅有 4 部，其中北宋宋敏求纂的十卷《长安志》和南宋南宋程大昌纂的十卷《雍录》。元代有至正年间李好文纂修的《长安图志》三卷和元贞年间骆天骧纂修的《类编长安志》十卷。

《长安志》是在以唐代韦述《两京新记》的基础上完成的，分街坊记载了长安地理沿革、城廓、官府、宫阙、衙署、山川、道里、津梁、邮驿，以及风俗、物产等，对坊市曲折及唐时士大夫宅第，都列出所在坊里。清代学者王鸣盛曾称赞此书说：“宋氏此编，纲条明析，赡而不秽。”《雍录》分专题讲述考辨，注重与政治制度、军事活动有关的地理位置，与《长安志》略有不同。《长安图志》的内容则主要是有关唐代长安宫城坊市的绘图，包括：长安宫城坊市总图、唐禁苑图、唐宫城图、唐皇城图、唐大明宫图、唐京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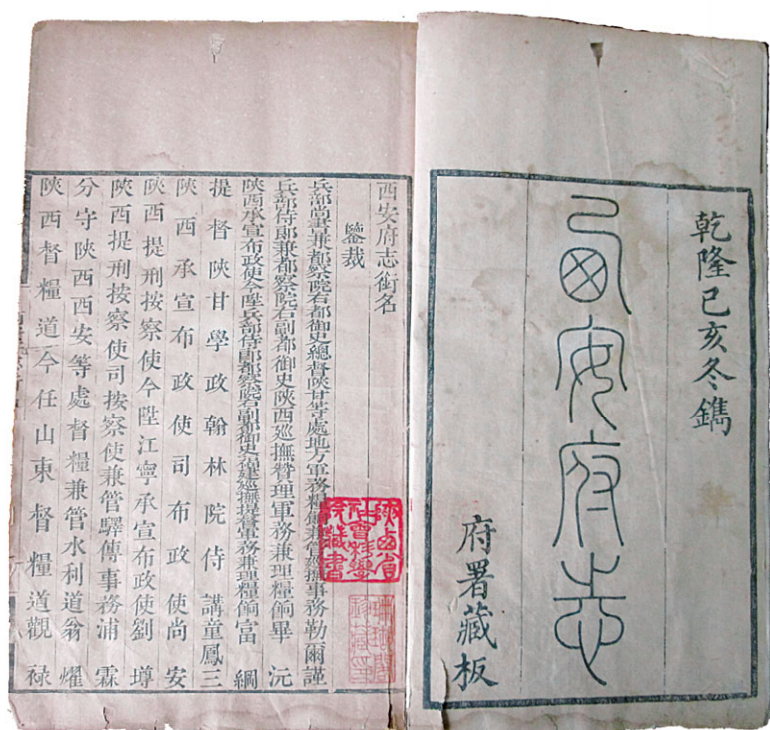


坊市图、唐城市制度图、唐骊山宫图、唐昭陵图、唐建陵图、唐乾陵图、唐陵图说、泾渠总图、泾渠图说等。该书除图绘外其它各篇，也多有涉及到长安风景环境、水利灌溉、历史变迁。《中国善本书提要》说：“读敏求之志者，必合是编并观。”至于《类编长安志》，其实是骆天骧任京兆教授时以宋敏求《长安志》为基础所纂，两书实属一脉。以上四种方志在内容上多偏重于唐长安城，涉及区域相对较小。

由此可知，编修《西安府志》虽然可以利用上述方志的资料，却不可能遵循它们的体例。至于明清两代的方志，虽然数量不少，但涉及西安辖区的大都以县志为主，如：康熙七年和清嘉庆十三年年的《长安县志》、康熙七年的《咸宁县志》、乾隆四十二年的《户县新志》等。它们都无法作为编修《西安府志》范例，这大概就是舒其绅感叹“无旧志可因”的原因。

乾隆四十四年《西安府志》的时间跨度较大，上自西周，下迄清乾隆年间；空间范围更广，涉及到了清代西安府辖区长安、咸宁、咸阳、兴平、临潼、高陵、县、蓝田、泾阳、三原、盩厔、渭南、富平、醴泉、同官、耀州等地区，内容也更为全面，是前代志书无法比拟的。

编修方志 搜集资料是至关重要的环节。《西安府志》引用资料中，除《大清会典》《大一统志》等 14 种御制书目和御定书目外，包括经部书籍 88 种，正史及编年史书 38 种，地理类书籍 153 种，别史等其它史部书籍 150 种，子部 319 种，集部 174 种，总数近千种，经、史、子、集都有涉及。在搜集资料方面，严长明等人真正做到了凡与修志相关的典籍文献“莫敢或遗”。当然，对于搜集到的大量资料，严长明等人并未不加甄别地径用，而是进行了严格的考证和



筛选，其标准在于“莫敢或滥”、不可尽信。这与严长明所属的修志派别有很大的关系。清代地方志纂修大致可分为纂辑和撰著两派。纂辑派主张“无语不出于人”、“贵因而不贵创”、“信籍而不信传闻”、重视地理沿革的考订等，撰著派则与之相反。由于人数较多，且得到政府的支持，纂辑派在当时占有一定的优势，严长明便属此派。从《西安府志》各卷正文所选用的资料可以看出，严长明等人繁征博引、缜密考证，以儒家正统经书和正史以及方志类书籍为主，以其它种类资料为辅。对于一些因自正史的资料，还进行考证、修订和必要的说明。以“无一字不出于人”的纂辑派修志方法完成的《西安府志》，其资料的广泛性、可信度和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都很高。

应当注意的一点是，修纂《西安府志》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时代的局限以及其他客观因素的影响使该书仍存在一些疏漏和不足，如：详略失体、偏尚文辞、贪载传记等。但瑕不掩瑜，这部《西安府志》仍不失为一部极具特色且价值颇高的方志古籍。

# 浅议莫高窟早期石窟与云冈石窟中的佛像背光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Buddhist nimbi found in the early Mogao Grottoes and Yungang Grottoes

撰文 / 王姝婧

佛像背光是佛教造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佛教艺术风格中的重要研究对象。佛像背光，依显现位置不同，主要分为头光和身光。佛经有云：如来颈相，瓷骨满相，万字印相，是众生间，出生圆光<sup>(1)</sup>。背光也被认为是佛与菩萨的光明相<sup>(2)</sup>，而《大智度论》中也指出“佛身四边各一丈光明，菩萨生便有此，是三十二相之一，名为丈光相<sup>(3)</sup>”。从艺术的角度来说，背光及其纹饰也对造像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

敦煌莫高窟与云冈石窟，是中国石窟中极为重要的两个代表性石窟。而莫高窟早期石窟与云冈石窟兴建时间基本一致。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的第一阶段的三座洞窟，即第268、272、275窟，可能不早于北魏孝文帝初年至太和十三年（471—489）间，也有学者认为是北凉时代开凿的；第二阶段的八座窟，即第259、254、257、251、260、263、487、265窟，时间约在太和十一年至正光之末（487—524）之间<sup>(4)</sup>。而云冈石窟主要开

凿于北魏和平初年至正光年间（460—525）<sup>(5)</sup>。

从造像的背光上来看，两者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云冈第18窟西壁、东壁立佛，第17窟东壁二层佛龕、北壁右部佛坐像，佛圆形头光边沿火焰纹形式与敦煌莫高窟第275窟西壁交脚弥勒圆形头光火焰边饰近似。云冈第19-2窟后壁倚坐佛背光形式与莫高窟第268窟背光形式、图案纹饰近似。云冈第20窟北壁坐佛像头光与莫高窟第272窟圆形头光近似<sup>(6)</sup>”。因此，莫高窟早期石窟和云冈石窟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下文中便主要从佛像背光的角度对两者进行比较。

具体来说，佛像背光的组成又可分为形状和纹饰两大方面。

从单体形状上来看，莫高窟早期背光主要有圆形、叶瓣形（莲瓣形）、舟形、半椭圆形等四种，而云冈石窟的背光则较为丰富，有圆形、长圆形、叶瓣形、长方形、方形、舟形、半圆形、桃形等八种，但笔者对“长方形”这种基本无装饰图案

(1) 原出自《佛说观佛三昧海经·观相品》，转引自卢秀文《敦煌莫高窟早期的背光》，《1994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纪念敦煌研究院成立50周年》第168-188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

(2) 慈怡《佛光大辞典》第三册第217页，台湾佛光山出版社、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6月。

(3) 《大智度论》卷八，《大正藏》第25册第114页，中华电子佛典协会，2008年。

(4) 宿白《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3至8世纪中国佛教考古学》第52页，文物出版社，2010年7月。

(5) 阎文儒《云冈石窟研究》第7-1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

(6) 卢秀文《云冈石窟背光》，云冈石窟研究院编《2005年云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研究卷》第683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8月。

的背光形式存疑,因其与佛教“圆融”的思想相左,且光的形状呈长方形的艺术形式也极为少见,其中很少见图案装饰这一情况也与同时期的背光风格有所差异,这或许说明“长方形”并不是一种背光形式,而只是石窟的形状所限。各种背光形式当中,圆形背光在莫高窟多用作头光,云冈石窟中的佛像头光中则多见桃形背光,而舟形背光在莫高窟多见于头光,在云冈石窟则多见于身光,莲瓣形背光在这两座石窟中应用均十分广泛。从形状组合来说,云冈石窟的主要背光组合形式为圆形头光与莲瓣形身光组合,这在莫高窟中并不常见。综合现有研究,笔者认为圆形背光为印度传来的原始背光形式,而舟形背光则是在对原始背光形式的吸收与演变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并在不同地域的石窟有着不同的发展特色。

从纹饰上来看,莫高窟早期背光的图案纹样主要有莲花纹、忍冬纹、火焰纹、联珠纹、飞天、化佛、伎乐等,云冈石窟与莫高窟基本类似,为火焰纹、莲花纹、忍冬纹、化佛、飞天、花卉、伎乐等。但是,莫高窟的佛像背光中最常见的为莲花纹、忍冬纹,其次是火焰纹,而云冈石窟中最常见的为火焰纹、莲花纹,而忍冬纹则多用于龕楣等处,相对不常用于背光装饰。联珠纹基本用于佛与菩萨的衣饰,少用于背光之中。另外,云冈石窟的忍冬纹均为叶体细长的三瓣型,而莫高窟造像背光中的忍冬纹经历了单叶忍冬纹——双叶忍冬纹——花形忍冬纹的变化过程,形象较为丰富<sup>(7)</sup>。

云冈石窟的修建主要为北魏从凉州迁来的工匠<sup>(8)</sup>，“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的“凉州模式”的影响,汤用彤先生也指出“武州(云

冈石窟)造像,必源出凉州<sup>(9)</sup>,而云冈石窟也是敦煌莫高窟的渊源之一,从地域来说,敦煌近凉州,也会受其影响,是故两者有诸多相似之处也不足为怪,但笔者更加关注的是其中的不同之处,尤其是纹饰的差异与变化。

首先是火焰纹。造像背光中的火焰纹多呈升腾状且形态多样,常常分多层嵌套表现,每层火焰形象也多有不同,如水波状火焰纹、三瓣叶相互连结状火焰纹等。关于火焰纹,主要有三种看法,一种是背光中的火焰纹来自于古印度的焰肩佛<sup>(10)</sup>。第二种则认为是佛教传入与中亚拜火教相联系融合所产生的纹样<sup>(11)</sup>。还有一种看法是火焰纹在印度艺术中基本不见,因而为“中国式背光纹样”<sup>(12)</sup>。笔者较为认同第二种看法,因为焰肩佛形象也称为“迦毕试样式”



火焰纹背光(云冈石窟第10窟前室北壁三层西侧佛龕)

(7) 卢秀文《敦煌莫高窟早期的背光》、《魏书·释老志》卷一百一十四第2016页,中华书局,2003年。

(8) 《魏书·释老志》卷一百一十四第2016页。

(9)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第359页,中华书局,1983年。

(10) 刘珂艳《浅析敦煌莫高窟背光图案中火焰纹的演变》第67页,《中国艺术设计史论丛》总第108期。

(11) 王海峪《敦煌壁画中的火焰纹图案探微》第13页,辽宁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12) 卢秀文《敦煌莫高窟早期的背光》第18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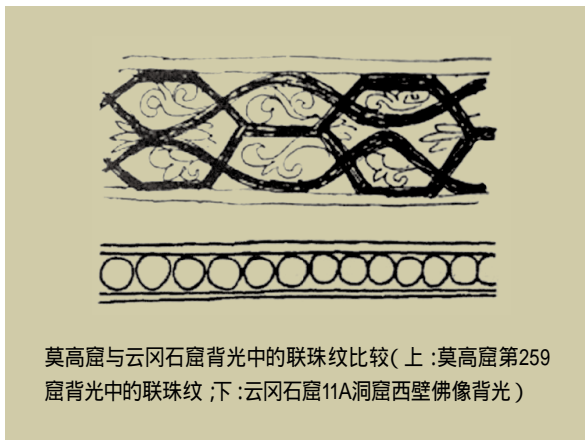
焰肩佛，迦毕试为贵霜王朝夏都，虽然贵霜王朝较为崇尚佛教，但其前身大夏则信仰火祆教，贵霜立国后仍然保持了一部分祆教信仰<sup>(13)</sup>，因而古印度的焰肩佛也应属于受祆教影响的“迦毕试样式”焰肩佛系统，并不是印度本土的装饰纹样，而这也是这种纹饰在其他印度艺术中基本不见的主要原因。因此，这一时期佛像背光中的火焰纹饰或可称为“中亚式火焰纹”。

在敦煌长城烽燧下发现的粟特文古信札里，可以确证祆教早在公元4世纪初就由粟特人带到了中国<sup>(14)</sup>。此外，石窟中所见的石榴纹也是祆教宗教仪式所用的主要植物之一<sup>(15)</sup>。因此，云冈石窟和莫高窟纹饰受到祆教影响也是顺其自然的事情了。云冈石窟的佛像背光从第一期伊始便大量应用火焰纹，且整体时间早于莫高窟的火焰纹大量流行时间，即第一期第二阶段。并且，流行火焰纹的莫高窟石窟也在其他方面表现出中原影响，如莫高窟第254窟，背光中的天人为“秀骨清像”，且有衣缘下垂式服装的释迦坐像，应为孝文帝改革服制后的样式<sup>(16)</sup>。因此，可以推断，莫高窟佛

像背光的火焰纹受到了云冈石窟背光装饰的影响，火焰纹可能是从西域流传至云冈石窟后又再次回传到莫高窟的。

其次是背光中的联珠纹，珠子中心或珠串中心常有火焰纹、鸟兽纹等图案。曾有学者指出，联珠纹是莫高窟背光图案中所特有的表现形式，而云冈石窟和麦积山石窟不见<sup>(17)</sup>，但是在近年云冈石窟的研究中，也发现联珠纹用于背光之中，但较少，而较多的情况则是出现在佛教服饰中，应用于服装也是联珠纹最早的应用方式，如萨珊时期的波斯服饰等<sup>(18)</sup>。另外，从时间上来看，云冈石窟的联珠纹出现在背光中的时间也比莫高窟为晚。莫高窟中从第二阶段较早的第259窟（约486年左右）便出现了联珠纹用于背光的情况，之后较为流行，而云冈石窟则主要在6世纪才开始流行将联珠纹应用于背光图案<sup>(19)</sup>。从整体上来看，相较于莫高窟，云冈石窟背光中的联珠纹较为简单，与其他花纹组合也较少，并且不流行。因此，从联珠纹这种纹饰来看，很可能是莫高窟先于云冈石窟用于背光图案之中，即这种装饰手法可能是从莫高窟流传至云冈石窟的。

另外，还有一些背光的形式为两者各自所独有的。例如，上文提到的背光形式组合，在莫高窟中多为相同形式的头光和背光组合在一起，而云冈石窟中则多为不同形式的头光和背光进行组合；还有上文所述的忍冬纹的发展，两者也都有各自的特点。此外，以云冈石窟第19窟的大佛背光为代表的大像背光，也不见于新疆和河西地区，应是其仿印度背光特点而独创，这也说明了，莫高窟和云冈石窟在相互交流和借鉴佛教装饰艺术



莫高窟与云冈石窟背光中的联珠纹比较(上:莫高窟第259窟背光中的联珠纹;下:云冈石窟11A洞窟西壁佛像背光)

(13) 施安昌《圣火祆神图像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1期总第99期第65-71页。

(14) 荣新江《祆教初传中国年代考》，《国学研究》第3辑第335-35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15) 施安昌《祆教礼仪所用植物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3期总第95期第14页。

(16) 宿白《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3至8世纪中国佛教考古学》第60页。

(17) 卢秀文《敦煌莫高窟早期的背光》第185页。

(18) 解梅《敦煌壁画中的联珠纹》，《社科纵横》，总第20卷第6期第173页，2005年12月。

(19) 李娅恩《北朝装饰纹样研究——5、6世纪中原北方地区石窟装饰纹样的考古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2年8月，第66页。

风格之外，也有着自己独立发展的体系。

综上所述，从莫高窟和云冈石窟的背光形式与图案中，大概可以总结出莫高窟与云冈石窟背光的三种发展模式。第一种为西域（主要为凉州）——云冈石窟——莫高窟的传播和流传方式，即西域因素在云冈石窟中有所体现后，再影响莫高窟的佛教艺术，如背光中的火焰纹。第二种为西域——莫高窟——云冈石窟的发展模式，即莫

高窟受到西域影响后的艺术表现形式传播至云冈石窟，如背光中的联珠纹。第三种为莫高窟、云冈石窟各自独立发展的模式，如大像背光等。

佛像背光是佛教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纹饰、形状与组合关系的变化发展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对石窟进行分期的依据，更向我们展示了佛教艺术在流传过程中的文化互动关系，具有十分深远的文化意义。■

## 参考文献

- 【美】巴兹尔·格雷著、李崇峰译《中亚佛教绘画及其在敦煌的影响》，《敦煌研究》，1991年第1期。
- 包铭新《丝绸之路——设计与文化》，东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
- 陈继春《萨珊波斯与中国美术交流——中国美术中的琐罗亚斯德教因素》，《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总第11期。
- 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
- 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文物出版社，1999年。
- 封钰、韦妹华《佛教雕塑背光图像的象征意义》，《东南文化》，2010年第2期，总第214期。
- 郭俊叶《敦煌火珠图像探微》，《敦煌研究》，2001年第4期，总第70期，第43-49页。
- 赖鹏举《敦煌石窟造像思想研究》，文物出版社，2009年8月。
- 李恒成《云冈石窟与北魏时代》，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5月。
- 李裕群《古代石窟寺》，《文物出版社》，1996年。
- 李姪恩《北朝装饰纹样研究——5、6世纪中原北方地区石窟装饰纹样的考古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2年8月。
- 刘波《敦煌与阿姆河流域美术图案纹样比较研究》，《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总第65期。
- 刘珂艳《浅析敦煌莫高窟背光图案中火焰纹的演变》，《中国艺术设计史论丛》，总第108期。
- 卢秀文《敦煌莫高窟早期的背光》，《1994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纪念敦煌研究院成立50周年》，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
- 卢秀文《敦煌莫高窟隋唐背光研究》，《敦煌学辑刊》，1996年第1期，总第29期。
- 卢秀文《敦煌石窟晚期背光研究》，《敦煌研究》，1997年第2期。
- 卢秀文《云冈石窟背光》，云冈石窟研究院编《2005年云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研究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
- 宁强《敦煌早期图案研究》，《新疆艺术》，1988年第5期。
- 荣新江《祆教初传中国年代考》，《国学研究》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 施安昌《圣火祆神图像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1期总第99期。
- 施安昌《祆教礼仪所用植物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3期总第95期。
- 宿白《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3至8世纪中国佛教考古学》，文物出版社，2010年7月。
- 【英】索伯《北凉和北魏时期的甘肃》，《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总第62期。
-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
- 王海峪《敦煌壁画中的火形纹图案探微》，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师范大学，2008年。
- 王晓娟《北朝联珠纹样探微》，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10年5月。
- 王雁卿《云冈石窟的忍冬纹装饰》，《敦煌研究》，2008年第4期，总第110期。
- 温都苏《北朝时期佛教石窟造型及装饰的混合风格——以云冈石窟佛教雕塑艺术为例》，《艺术探索》，2010年2月，第24卷第1期。
- 解梅《敦煌壁画中的联珠纹》，《社科纵横》，总第20卷第6期，2005年12月。
- 阎琰《北朝外来纹饰——忍冬纹探微》，硕士学位论文，山西大学，2006年6月。
- 阎琰《北朝联珠纹装饰纹样的组合》，《文物世界》，2010年第2期。
- 周苏《北魏中晚期云冈、龙门石窟的比较研究——兼论其文化融合》，硕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2010年5月。
- 张小刚《敦煌壁画中的于阗装饰佛瑞像及其相关问题》，《敦煌研究》，2009年第2期，总第114期。
- 诸葛铠《“忍冬纹”与“生命之树”》，《民族艺术》，2007年第2期。

# 清王鸣盛佚文续补

## A second addition to lost articles by Wang Mingsheng

撰文 / 王光乾

王鸣盛(1722—1797),字凤喈,一字礼堂,号西庄,晚号西,江苏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人。乾隆十九年(1754)榜眼,历官翰林院编修、福建乡试正考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终光禄寺卿。二十八年,丁母忧,遂不复仕。移居苏州阊门外,专事著述。有《尚书后案》三十卷、《周礼军赋说》四卷、《十七史商榷》一百卷、《蛾术编》九十五卷。另有诗文集《西庄始存稿》三十卷、诗集《西居士集》二十四卷。

王氏经史造诣渊深,为乾嘉考据学吴派代表人物之一。此外,其散文先后师法宋欧阳修、曾巩及明王慎中、归有光,熔铸古今,泉涌风发,堪称清季一大家。钱大昕称其“古文纤徐醇厚,用欧、曾之法,阐释、郑之学,一时推为巨手”(《潜研堂文集》卷四十八《西先生墓志铭》)。王昶赞其为文善于“撷经义之精奥,而以委折疏达出之”(《春融堂集》卷六十五《王鸣盛传》)。退居吴门后,由于其学者兼名宦的特殊身份,登门求文者络绎不绝。卒后,赵翼以诗相挽,中有句云:“皇甫三都求作序,李邕四裔乞书碑”(《瓯北集》卷三十九《王西庄光禄挽诗》),虽不无夸谀,但亦可从中窥知王氏生前文名之盛、创作之富。

《西庄始存稿》之外,其文章星散于他处者不在少数。台湾学者陈鸿森以十数年之功,广收博采,先纂成《王鸣盛西庄遗文辑存》(《大陆杂志》第99卷第6期),收王氏佚文五十三篇;后又刊布《王鸣盛西庄遗文续补》(《书目季刊》第43卷第4期),复得其佚文九十七篇。《嘉定

王鸣盛全集》(中华书局2010年版)卷末,亦附有编者所辑《王鸣盛遗文补遗》,有诗文、题词二十五则。此后,曹明升撰成《王鸣盛诗词序跋钩沉》(《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1年第6期),收有各类作品十五则。

笔者久慕王氏之学问,平昔于所见诗文集、方志、碑碣、谱牒、书画中,对其佚文每加留心,累年以来,积得八篇。其中序三、记二、跋三。此八文不惟对王氏文集有补阙之功,对研究王氏学行事迹,乃至清代社会生活,均不无裨益。

兹誉录、标点如下,并略作考释,或可补时贤搜辑之未备。然笔者目力褊狭,所见有限。遗珠之憾,在所难免。若得四方饱学君子抄示笔者所未见者,则可谓幸事也。

### 一、序

#### 1.《钜野姚氏族谱》序

诸侯世国,大夫世家,然后可以立宗子,行宗法。古今异宜,事势悬殊,封建世祿之制断断不可复行于唐宋以后矣。然而,贤人君子皆能考其祖所自出而鸠集其族属者,何也?有祠堂与谱牒存焉尔。然则,士大夫之于其家建祠修谱,盖可忽乎哉?切祠堂数十年不修,则圯。谱牒一修,昭穆明,阅数传,子孙犹得据以稽其世次,别其长幼尊卑,服尽而亲不尽也。由此观之,则谱尤重。半塘姚先生由名进士简授吾邑令,下车两载,善政不可胜纪,以余暇刊

定族谱，而问序于予。

姚氏始祖在金末自南京路陕州迁于山东西路之济州，今为钜野县，隶曹州府云。考《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姚氏宰相二人，陕郡姚氏亦出吴兴武康，而元之相元宗实为陕州硤石人。钜野之姚，其旧为望族无疑也。自始迁祖以下，终元世无有仕者。三世讳曰：景元、景方。景元生三子：温、恭、赐；景方生三子：让、泰、文。分为前后三门，若裴氏之有东西眷也。前三门著者：恭始以岁贡生官获嘉知县；后三门著者：泰之子安始中景泰癸酉（1453）举人，传至嘉靖戊子（1528）举人北监军道会极，而家益大。入本朝，温之元（玄）孙应达，中顺治戊子（1648）举人；泰之六世孙之英，以拔贡生官衢州府通判，论平耿逆功，升金衢严兵备道。自是以后，科名爵位相继不绝，丁口以数千计。族姓之繁，为郡邑冠焉。

姚氏谱抄本流传，自元明已有之。其刻也，自雍正十年（1732）十一世孙武昌守备锡年始。采而辑之者，日照训导振也。今又四纪于兹矣。丁益繁，支派益多。先生为之增辑，且正其伪，补其阙，别附家乘四卷于后。吁！信乎尊祖敬宗收族之美意，而小史莫世、辨昭穆之遗法与（欷）！

儒者读书登第，出宰一邑，以仁为体，以恕为用，不激不随，与民休息，摩拊而噢咻之。平昔读书学道之所蕴蓄，固已小试之而效矣。然而，必先亲其亲，然后足以仁民。先生处则为通儒，出则为良吏，固宜其不匮锡类，加意于宗族如是之切也。

抑吾闻之，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又云：明德之后，必有达人。遥稽先生前世，由钜而陝而武康吴兴，达人之相继出者，诚代不乏人矣。今先生非百里之才，他日勋业所就，必有脍炙人口、光垂竹帛与前代诸名人后先相辉映者，保世滋大，益元厥宗。家乘之所录，行且与国史相出入。吾见钜野之一望，媲美陝州有妣之后，莫之与京，将以是谱卜之矣。

爰 笔而书之，以为左券焉。

赐进士及第通议大夫光禄寺卿前史官吴中王鸣盛西庄氏撰。

按：半塘姚先生即姚学甲，字莲芳，号半塘，清山东钜野（今山东巨野县）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进士。乾隆四十三年至嘉庆五年，六次出任嘉定知县。兴学校、修水利、赈灾荒、礼贤能，政声颇佳，为合县士民所爱戴。

此序曰：“半塘姚先生由名进士简授吾邑令，下车两载，善政不可胜纪，以余暇刊定族谱，而问序于予。”又，下文所载《嘉定姚侯浚西清镜塘记》云：“乾隆四十三年（1778），钜野姚侯来莅吾邑。”由此可知，姚学甲刊定族谱并问序于王鸣盛，当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亦即此记的写作时间。

此序辑自乾隆刻本《钜野姚氏族谱》。今藏于山东省巨野县姚氏族人之手。

## 2.《述记》序

汉人记经，所据以为佐证者，皆晚周先秦之书。孔门七十子之微言，而汉人所自为训，故传记及石渠、白虎之议奏，或为秘府所藏，或为博士所习，又皆班班具在。唐宋以下，去古渐远，古书亡佚者，皆学者罕见。凡古义之不合于俗者，皆妄凭胸臆以疑之，辄谓汉人自撰此语，苟驳前师，向壁虚造，而经义晦矣。

今圣天子在上，寿考作人，敦崇 学，屏除浮华，于是五经古义始复大昌，海内 向风，士咸勉自濯磨，以应诏令。当斯际也，盖不但著述宜遵古训，即场屋应试帖括，亦将非古不道焉。岂非千载之嘉会哉！夫子不云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而宪章文武，梦见周公，一则曰吾从周，再则曰吾从周。然则，好古与从周并行而不相悖也。方今，圣主既以古学造士，则好古即所以遵时尚，可安于空疏庸妄之陋习，而不思自奋邪？惟是古书之仅存者，穷乡下邑，购访为难，苟得节抄之本以引其端，俾后生染指知味，然后渐进于博雅，不亦善乎？

任生文田笃志穷经，嚅啜古学有年，爰摘三代两汉之书几十种，厘为上下册，

目曰《述记》，以嘉惠艺林。嘻！以此为说经之佐证，而供帖括之取资，诚迷津之宝筏、昏途之东炬矣。行且不脛而走，争先睹之为快。聊题数行于简首，以为左券云。

乾隆岁在戊申（乾隆五十三年，1788）二月既望。

按：任生文田即任兆麟，字文田，一字心斋，清江苏震泽（今属江苏吴江县）人。诸生。嘉庆元年（1796）举孝廉方正。幼承家学，博闻敦行，工诗文，精经史，为王鸣盛、钱大昕所重。著有《述记》、《毛诗通说》、《春秋本义》、《夏小正补注》等十余种。

乾隆五十二年（1787），鸣盛又曾为任氏《夏小正补注》作序，序称：“予归田二十五年，念史学之无人也，杜门扫轨，覃思考史为务，辍经不复治，重文田朴学，乃暂度史业，尽一日功观之，观竟，亦叹其善。其疏通证明，实事求是，兼采前哲时贤语，皆有裁断”（陈鸿森《王鸣盛西庄遗文辑存》卷上）。

此序辑自民国上海锦章图书局石印《述记》卷首。

### 3. 恭祝龚母陈太君八秩荣寿序

乾隆四十有二年（1777）五月某日，为龚母陈太君八十设帨之辰，同人竞往登堂举觞称庆，而属予序之。

予闻古之言寿者，若鲁僖公《闕宫》之颂，有寿母之文。其他所云黄发儿齿、黄耇鲐背、酌以大斗、祝以冈陵松柏，而为之称愿于无穷者，盖尤不可枚数。然《洪范》五福以寿为首，而必归之攸好德。诗人所咏妇德母仪，或云温惠淑慎，或云思齐思媚，或云其德不回，班班如也。然则，寿为福之首，而德为福之本，理固然矣。

太君为国学上舍汉荣龚先生之德配，而明经缙禹兄之贤母也。系出名门，幼娴女训，不烦母教而婉孌性成。泊乎于归，勤俭交砺以相夫，慈严并济以教子。古者孟光之举案齐眉、桓少君之亲挽鹿车、柳夫人之和熊胆丸、欧阳公之母画荻成字以课其子。太君视之，殆无有愧色焉。汉荣先生因获内助，遂以家政悉委太君，己则

出而应接宾友，绩学课耕，力行善事，俾家日隆隆起，太君鸡鸣昧旦赞襄交徼之力居多。凡扶贫振弱矜孤恤嫠之事，汉荣为之，太君必从而怂恿之。于是，里党中咸交口称太君之贤。缙禹自幼就傅，太君所以教督之者靡不至，而缙禹志洁行芳，克承家学，由高才生贡入辟雍，声誉焯然。文孙三人崭然并露头角，长者已能摘词艺苑中矣。论者以为，非太君之教泽不及此。嘻！太君之德可谓备矣。

今者齿臻大耋，康强善饭，神明矍铄，视听未衰，将来期颐上寿，乃意中事，且诸孙皆如凤毛之奋起，如玉树之骈生，他日发名成业，金章紫诰，荣贲里闾，以为太君光宠者，正未有艾。岂非以德致福之符？洵有如操左契交手相付者哉！且予闻之，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是故七十之年，古以为稀，而况八十乎？八十者，亚于百岁，真人生难躋之算也。况以太君之神明矍铄、视听未衰，寿宁有量耶？又加以饶衍蕃盛昌炽景懿之况，诸福且毕集耶！而皆恃德以致之。然则《洪范》之所陈、风人之所咏，诚为信而有征，而冈陵松柏之庆，诚非可以幸而致也。今者长筵既启，介雅征歌，锦幃宏开，云 迭奏，回思少壮勤毳，辛苦备经，俯仰几十年，亨屯否泰之间，太君其亦可以輶然而晋一卮矣。若夫交梨大枣之奇，龙管凤笙之美，特世俗夸诞之词耳。此何足为太君道哉！此何足为太君道哉！

是为序。

赐进士及第通议大夫内府光禄寺正卿前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年家眷侍生王鸣盛西庄氏再拜谨撰。

按：清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三《王鸣盛传》称：鸣盛辞官后，“卜居苏州阊门外，不与当时通，亦不与朝贵接。家本寒素，卖文谏墓以自给，余则一介不取也。闭户读书，日夕探讨。”鸣盛挚友赵翼《瓯北集》卷三十九《王西庄光禄挽诗》云：“风趣长康半点痴，牙筹不讳手亲持。出门误认仪同宅，筑室遥催录事资。皇甫

三都求作序，李邕四裔乞书碑。即论致富惟文字，前辈高风亦可思。”以上两则材料明确告诉我们，王鸣盛家本寒素，但由于其功名高、文名盛，颇受世人青睐，故能以润笔致富，从而为其从事著述提供充裕的物质条件。此寿序罗列典故，铺陈辞藻，极尽溢美，很可能是当时所鬻之文，或为亲友间的应酬之作。

此寿序录自王鸣盛手书原迹。今存于上海某藏家之手。藏家美意拳拳，允笔者刊布，特致谢忱。

## 二、记

### 1. 嘉定姚侯浚西清镜塘记

水利者，民生之本也。沟洫不通，堤防不修，则土田不治，而民生日蹙矣！吾邑滨海，潮汐往来，沙土易汙。向有疏浚之法，凡田百亩，岁出一夫浚河，利灌溉、便舟楫也。

城内干河二：东西曰练祁，南北曰横沥，皆自吴淞江、刘家河入海，或自入于海。支河，以泾名者：吕墅、野奴、东西库也；以浜名者：何家、杨树、邢家、饭锹也；以渠名、塘名者：曰新渠、东西清镜塘也。

西清镜塘，在城西北隅，东通横沥，经县治后一里许折而南，入于练祁。民居甚繁，溉田若干顷。前令咸宁黄侯用河夫开浚，至今四十余年。潮水沙土之停滞，居民瓦砾之填积，其流渐断。民之诉于官者屡矣，而不见理也。

乾隆四十三年（1778），钜野姚侯来莅吾邑。越明年，浚刘家河，民不疲劳，而工加于昔。是年秋，设法浚西清镜塘，平准有度，以人所求浚不得者，一旦不待请而通之。其为利民者多矣！

夫嘉定之浚河，以为农也。然城市之河，亦以通民用，不当以为无资灌溉，而令附近居民开浚也。况城市虽地属畸零，其助役则同，而复浚市河，非均也。前此，黄侯浚是河也，盖与东清镜塘、吕墅泾、西库泾并详请役河夫，即后之廖侯浚野奴泾亦然，近则不能矣。或谓：浚河本意，专为干河及农田之利也，故不及城市河。如是，

则宜干河之深广使水旱无虞，支河之流通而蓄泄有备矣。何以载在县志如练祁，本有自入于海之道，而今止入刘家河一道耶？而郑氏所谓“七里一纵浦，五里一横塘”者，日就湮没，则农田不虑失其利乎哉？

今侯之浚此也，不役河夫，而居民不扰。此其爱民之心与其才，洵有不可及者矣。夫民可与观成，难与图始，保无从而沮之者，侯毅然为之。未几，而滔滔之流与侯之德俱长矣。今侯每舆过塘上，小民妇子顶香拜祝，虽欲止之而不得。为民父母，何不乐为民兴利而顾传舍视之耶？此犹侯之一节耳，而系乎民生者甚切。予故笔而记之。

侯名学甲，字莲芳，别号半塘，乾隆丙戌（1766）进士，例得备书。

进士及第通议大夫光禄寺卿加二级王鸣盛撰文。

进士候选教授钱塘篆额。

新阳县学生王鸣韶书丹。

乾隆四十五年（1780）秋七月。

按：此记抄自同名碑刻。该碑为青石质，高159厘米，宽64厘米。现嵌于上海嘉定孔庙礼门西壁，保藏完好，笔画无漫漶。

### 2. 折漕报功祠复祀碑记

本朝列圣继承，以勤民为家法。凡胜国之政害于民者革之，革之而惟恐其不尽也；利于民者因之，因之而惟恐其不久也。若嘉定之折漕，亦其一矣。

苏松之漕甲天下，而嘉定确确，独不产米。明太祖用重赋困吴民，嘉定以不产米故，困尤剧。至宪、孝间，塘浦塞，水利坏，民无力给漕，县几以废。耆民瞿仁等吁请改折征银，时邑令朱公廷益、乡贤徐公学谟等力持其议，得奏报可。于是，嘉定折漕自万历十二年始。邑人以朱公实有功于民也，建祠祀之，而凡曩是举者，咸奉粟主祀焉。前人记之详矣，具载县志，可覆按也。入国朝，年远祀废。康熙五十二年（1713），有土豪潘姓者私改为土地神庙。

雍正八年(1730),其子复私改祠中匾,窜易己名,而祠址及祠旁公地指为荒区,别报开垦,占作私产。先贤遗址,尽渐灭矣。乾隆三十五年(1770),孙敬妃诉诸制府高公晋洎方伯李公、湖州牧介公玉涛,先后严饬覆实。邑令李公仕清躬莅勘验,访诸缙绅曹桂芳、钱桂发、秦大成等,廉得私占状,据实以请。高公乃檄令复其祀。爰苍贞石,俾为之记。

闻之民为邦本,政在养民,然民甚蠢愚,事过辄忘,久之,则顽然曰:是固然耳。夫养民之政,诚非欲以市恩,然氓之蚩蚩,被以大德惠而不知感,人心涣不相属,则奈何?惟赖邦之贤士大夫为民表帅而倡导之,以报本返始之情,服畴食德之谊,而封疆大吏复以主持公论、修举废坠为己任,庶相与潜驱默率,尊君亲上,以携持固结而不可解。

折漕之举,胜国诸公同心戮力,大声疾呼,为民请命。尸祝而俎豆之,宜也。是固不可废也。抑更有说焉:万历改折以后,天启四年(1624)复漕,已而止。崇祯十四年(1641)又复漕,已而止。至本朝定鼎,迄今百数十年,而永折之议从无改易。然则,列圣勤民之心高出于前代远甚。自有此祠,而朱、徐诸公之功见,即本朝之深仁厚泽亦于是乎益见。尚可废哉!

当议折之时,士大夫岂必皆贤?然其贤遂能为民请命,而当事亦信从其言,故得兴利除弊,相与以有成。今之君子倏倏然不肯可否事,恐恐然退与编户齿。其自为计,则得矣。其所以为愚民表帅而宣上德意以美劝者,将安在也?若乃间左桀黠无良辈乘隙徼利,变乱黑白,至欲举数百年之崇祀而抹杀之。此虽一邑一事,其为人风民俗害,岂浅浅耶?宜绅裔等连袂上陈,不惮至于再至于三,盖诚有不得已焉。然非高公之率其属而力持公论,以修举废坠为己任,则祀终不可得而复。公盖虑夫民气之骄、民风之偷,思有以维挽而惩艾之,固不独为诸贤一瓣香地也。公可谓具深识、知本计者矣。

予又考之漕之始折也,朱公为首庸,故祠之建,为朱公建。然朱公不久去,继之者熊公密。方是时,犹岁岁奏请。后改为三岁一请。至万历二十三年(1595),始定永折。时伏阙上书,为耆民徐行等,而主其议者为邑令王公福征等若而人。乃天、崇之又折,则为张公承诏、归公子顾、倪公长圩、侯公峒曾及征士张鸿磐等。有功者既多,不得独系朱公,故又名“报功”。今仍之,纪实也。

若夫核其基址号段,正其粮册户籍,具于碑阴,兹不赘缕云。

按嘉定土地高亢,且因滨海,土壤盐碱化程度较高,适宜种植水稻的地块较少。再者,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境内河道日渐淤塞,水稻种植面积急剧缩减。人们审时度势,转而发展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口粮则主要余自外县。然而,由于朝廷赋税仍征收漕粮(粮米),人们只能以布易银,以银购米,以米纳赋,遭受重重盘剥,苦不堪言。因此,嘉定士民前仆后继、奔走呼吁,经过数代人的努力,才促使朝廷准许嘉定县折漕为银,以银代粮,从而简化了纳税程序,减轻了农民负担。为了纪念为折漕做出巨大贡献的有识之士,嘉定人民特地在县城西门外修建了折漕报功祠,为造福桑梓的功臣树碑立传。清末,嘉定诸生程博览志乘、碑记、文集,搜集相关史料,纂成《折漕汇编》一书,详尽地记录了这场具有嘉定特色赋税改革运动,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由于原碑已佚此文辑自嘉定图书馆藏光绪刻本《折漕汇编》,但该书未载撰文树碑之时间。查阅光绪《嘉定县志》卷二十九《金石志》,文虽未获载录,碑却已然存目,且目下缀有数语:“乾隆四十七年(1782)王鸣盛撰,钱大昕篆,吴轩翹书。”足可补缺释疑。

### 三、跋

#### 1. 跋王敬铭山水图轴

此幅乃吾家未岩殿撰所作未成本也,笔意规仿黄一峰老人,苍秀生动,可云具体。未岩归道山后,笔墨流传者已多零落,大幅尤为难得。此虽未成,丘壑已备。吾弟宜善藏之。

己丑(1769)长夏,西庄鸣盛题。

按：王敬铭（1668-1721），字丹思，一字丹史，号味闲，别署未岩，清江苏嘉定（今上海市嘉定区）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工诗文，善小楷，且受学于当世画坛巨匠王原祁，山水清腴闲远，书卷之气溢于楮墨。与金永熙、曹培源、李为宪并为王氏四大弟子。

此跋抄自王敬铭山水图轴。该轴先为王鸣盛之弟王鸣韶收藏，后辗转二百余年，又为鸣盛五世孙王元增购得，并于20世纪50年代捐赠予嘉定博物馆。除王鸣盛外，题跋者尚有乾嘉学派巨擘钱大昕、近代著名画家余绍宋，故此轴不仅艺术价值不同凡响，文献价值亦不可等闲视之。

## 2. 跋黄淳耀《临干禄字书》

余题先生墨迹凡数次矣，其文虽无所发明，亦必存之，以识不忘。盖书不以跋重，而跋则以书重也。此册为先生临颜清臣《干禄字书》，两公大节，先后照映，洵堪宝贵。

余不到故里已十三年矣，始因老懒，继乃目疾，遂至双瞽，闷坐三年，烈日中一无所见，自分已成废人，不料七十乃获重明！甲寅（1794）春，因送幼儿县试，复至嘉定，雪樵以此见示，且喜拙稿中复得跋一篇，遂书于后。

西 后学王鸣盛，时年七十有三。

按：黄淳耀（1605-1645），字蕴生，号陶庵，明末嘉定人。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未受官职，家居潜心研读经籍。顺治二年（1645），与侯峒曾率嘉定士民守城抗击清军。城陷后，与弟渊耀自缢于僧舍。清乾隆间，追谥“忠节”。经史造诣深粹，诗文卓然成家，著有《山左笔谈》、《陶庵集》。善书，法颜真卿（字清臣），亦工绘事。《干禄字书》，为颜真卿楷书力作之一。

此跋抄自《黄忠节公临颜书》石刻。该组石刻包括黄氏所临《干禄字书》及钱大昕、王鸣盛等七人题跋，今存11方，现嵌于嘉定孔庙碑廊。

## 3. 跋慧照《淞南纪游图》

家述庵先生居云间，与吾嘉定相距七十里而近。先生官少司寇，方以参密勿、备论思，在日月之际，勋名勒诸钟鼎，著述藏在蓬莱，学者争仰望之而未由得睹也。癸丑春，请急省墓，暂得休憩，于是踵门求见者，户外之屦满焉。钱少詹晓征与予三人，皆五十年前题襟击

钵、把袂拍肩素交也。其后三人者同登进士第，官京师。予最先归，年四十二；其次晓征亦归，年四十八；而先生暂假在籍，年七十。如晓征及予以暮齿遇素交，千里相思，尚劳仲梯，况在密迩，宜其鼓棹相寻，惟恐不速。予顾以事牵不可偕，独晓征以九月下旬挟子星伯访先生于三泖渔庄，述庵大喜，留信宿，遂邀秀水汪书年、华亭张坤厚、金冶、圆津庵僧慧照、万寿道院道士沈雪帆同方舟至余山，入王氏园，登皆山阁，吊陈眉公故居；复至天马山，登周氏山舟堂。先生作四诗，未有见及语，惟素交之阙其一也，爰属慧照写《淞南纪游图》。按：图中坐而翻经者述庵，从松下行而返顾者为金冶，捉笔而题壁、旁有童捧砚者为书年，结跏趺坐者为慧照，倚船窗眺望为坤厚，曳杖行者为晓征，共坐而语者则星伯与雪帆也。呜呼！人之出处显晦不齐，其所以传于后者，惟志行之高洁及文章翰墨为可久。今观先生恬淡出于性生，一旦致君事毕，从容退处，虽居荣观，燕处超然，而诸君子同抱夷旷之趣，工妙之文，徜徉山泽间，岂不幸哉？惜乎予之不克同此游，而欲托于记以传也。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腊月既望，西 王鸣盛记，时年七十有三。

按：慧照，清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圆津禅院住持，精禅理，擅诗画，与王昶（述庵）、钱大昕、王鸣盛等鸿儒名士交谊颇深。著有《圆津禅院小志》。

此跋辑自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光绪刻本《圆津禅院小志》卷末，原题作《圆津禅院小志跋》。但通观全文，所记述之事为：钱大昕、王昶、慧照等人游览松江府诸胜迹，访友吊古，唱和酬赠，并由慧照作《淞南纪游图》以志之。并不厌其烦地指出参游诸人在画中的位置、神态等等。足见此跋系为图所作，而非为志所作。再者，该志卷首有钱大昕《圆津禅院小志序》，序云：“今夏，慧照来吴门，以所辑《圆津小志》出示，且谥予曰……既退，述主客之语，以为斯序……嘉庆七年岁次壬戌（1802）九月，嘉定钱大昕书。”可知《圆津禅院小志》成书于嘉庆七年，而此跋作于乾隆五十九年，更可证明上述结论。■

# 甘肃漳县汪氏家族墓地 出土文物鉴赏

## Excavations from the Wangs' cemetery

撰文 / 尤宝铭

汪氏家族墓地位于甘肃省定西市漳县城东南，系元代陇右王汪世显家族的墓地，占地面积3万多平方米，墓区呈三角形。汪氏家族墓地始建于1243年，至明万历丙辰年（1616），历经373年，埋葬有220余人。《重修漳县志》上也有“南山在城五里，一名汪古山，元陇右汪世显墓在东麓”之记载。

由于元代统治者实行“薄葬”，因此元代大型墓很少。1972、1973、1975、1978、1979、1990年，甘肃省博物馆联合漳县文化馆先后6次清理发掘了29座元、明墓葬。元墓的墓葬结构与宋墓基本相似，所清理发掘的墓葬中共出土陶器、瓷器、铜器、木器、金银器、玉器、丝织品及墓志等各类文物1019件套，其中的元代玻璃莲花托盏、高足青瓷杯、衣帽、木屋模型、彩绘陶俑、双龙铜镜等非常珍贵，为国内同期墓葬之少见。而那些反映当时人们生产、生活的砖刻及二十四孝人物，造型生动，形态逼真，表现的神话人物故事更是线条流畅、栩栩如生。还有大量的墓志铭。出土的器物中包括国宝文物1套2件，一级文物28件套，二级文物44件套，三级文物362件套，未定级别的收藏品657件套。这些墓葬及文物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元代的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生活习俗、建筑技术以及元代西北史、手工业经济史等提供了翔实的实物资料和文字资料。该

墓葬群为我国发现的最大的元代墓葬群，其丰厚的随葬品及历史、科学和文化、艺术价值绝无仅有，因此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史料记载，汪氏家族源自徽州汪氏，金、元、明三代，累官多人，史书上有传记及列名者达30余人。从唐初汪达镇守巩县（今甘肃陇西县），到元朝汪世显因功封陇右王，历经唐、宋、金、元、明、清诸朝而不衰，在统一中国的战争及后来削平蒙古诸王的内乱、平定西南少数部落贵族的反叛，保卫西南、西北边境的历次战斗中屡建功勋，足迹遍及陕西、甘肃、青海、四川及云南，为促进民族融合、确保国家统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从汪世显到其曾孙五代，贯元朝始终，“为官者一百八十余人，其中王者三、公者十”，即著名的“三王十国公”。他们不仅在军事上居于显赫地位，而且在行政上也位高权重，掌握着中央及地方政府的重要权力，所任高级职务如中书右丞、陕西、四川、云南等行省平章及刑部尚书、工部侍郎等。文官序列中，官阶在三品以上有15人。历代朝廷对于外姓功臣封王，都十分审慎，有的明确规定不封外姓王。而元朝对于不仅是外姓，而且是外族的汪氏封爵如此之高，在我国封建王朝史上较为罕见。正因如此，墓葬中出土千余件种类繁多、价值极高的文物。下面择精品介绍几件。

### 1. 玻璃莲花盏托

汪氏家族墓中的第20号墓出土，整套器物由托和盏两件组成，平底，盘状，矮圈足，底心微凹，为普蓝色半透明玻璃质地。盏高4.8厘米，口径8.6厘米，底径3.2厘米，口、腹部呈七瓣莲花形，托腹壁直外撇，呈八边形，外边沿似八瓣莲花。托高1.2厘米，口径12.5厘米，内圈为八边形，斜内凹，口沿稍扬起，颜色比盏略浅。整个器型制作精巧、色彩明亮，托与盏搭配得相得益彰，宛如蓝色夜幕下一朵盛开的睡莲，这类蓝色玻璃可能为西亚中亚地区的玻璃作坊吹制。现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图1）。



图1

### 2. 雕漆供案

汪惟贤墓中出土的这件雕漆供案属国家一级文物。供案由四根圆柱形直腿支撑，长方形桌面，类似现在的茶几，当时用来摆放供奉物。桌面长70.2厘米，宽35.8厘米，图案为双龙牡丹，其余部件均为缠枝牡丹及叶片。整个器物采用唐、宋时期盛行的米红髹漆雕刻技法和剔红工艺，两条龙造型大气，神态逼真，刀法精致细微；牡丹花叶层次清晰富丽，具有较强的立体感，整体给人以豪华、高贵、精美的艺术感觉。将龙和牡丹雕刻在精美、较大的漆案上，充分显示了墓主人的身份。现藏于漳县博物馆。

### 3. 黄丝绿玉带钩

出土于8号墓，国家一级文物。钩身似琵琶形，扁薄宽平，呈青白色，有淡黄褐烤色，长12厘米、

宽2.4厘米，高2.5厘米。钩首呈兽头形，额间阴刻一“王”字，腹部浮雕一虺虎，虺首扁而额微突，五官集于前部，虺身弯曲作爬行状，尾细长盘卷；钩首曲深与钩面弧度适中，背凸雕一圆形钮，钮帽薄而平。钮柱上系黄色丝绿带，宽约1.8厘米，用丝绳捆结，编织密致，边缘修整。此件带钩雕法洗练，碾磨精细，品位高雅而且大气，为典型的元代玉钩形制风格。8号墓为一座元代夫妻及幼女合葬墓，带钩出自墓室南面棺木中男尸的腰部，应为死者生前的实用物。现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 4. 定窑白瓷盘

为北宋定窑白瓷的典型器物。高3.6厘米，口径14.8厘米，底径8.9厘米。敞口，深腹，外观近似洗形，矮圈足、平底。内底刻花，卷叶折枝似萱草，花瓣平整如莲花，花、叶搭配得体。外底亦施釉，正中刻楷书“复古殿”三字，右侧刻一“冬”字。刀口破釉处露胎，显然是后来使用者所为，而非入窑时原刻。这种风格的后刻款，更增加了此盘的珍贵。由于采用覆烧法，器沿未施釉，故呈芒口。胎体细洁，釉色白中闪青，莹润明丽，柔和典雅。由于北宋定窑白瓷保存完整者非常稀少，而具有特殊刻款者尤为罕见，故此盘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 5. 宋官窑多棱直颈瓶

高15.5厘米，口径6厘米，底径8.8厘米，瓶腹略呈鼓形，通体施粉青釉，平底，长颈，口沿外张略有参差的花齿状。腹、颈皆饰多道棱褶，颈棱密而腹棱疏。瓶底均匀分布6个烧制时留下的支钉痕眼，露出黑色胎质。造型典雅，釉质匀腻，光泽莹柔，青白如玉，且有细碎开片。以褶棱装饰器身的形式，唐代即已出现，但并不流行，用于酒器的更是少见。由于宋代官窑为皇家专用窑，故只烧制高档器物，精选优质瓷土，胎体纯净坚致，施釉匀腻如脂，色泽青莹柔和，有冰月云魂之神韵。该器为南宋早期修内司官窑中的精品。被定为为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图2）。

### 6. 元代抹胸织金锦

形似背心,长 26 厘米,宽 30 厘米,内外两层。衬里为褐色的麻布品,黄地织金锦作面,上有菱格宝相花图案。前面正中开襟,配有 9 个黑色横排盘花祥扣纽扣,排列整齐。下摆呈大弧度圆角,线条谐美。背后由两条交叉的布制宽带联结,另有两条丝带下垂。从规格看,应为一未成年少女的内装。此衣狭窄贴身,兼具乳罩的功用,9 排横扣将前胸包裹得严严实实,但衣形舒展,采用开襟式,且下部略宽,束而不捆,严而不窒,保持体气通畅,着身柔适。由此可知,元代女性和现今女性一样,也是非常注重对胸、乳的约束和保护;既注重美观,又讲究卫生。用华丽的织金锦作内衣面料,一方面反映了墓

主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也显示我国生活领域的一种古老传统,即讲究内衣要用鲜艳的面料缝制,意味着富贵吉祥。在织物上加金是元代丝织业的一大特色,受阿拉伯、波斯织锦工艺的影响。元代织金锦蒙古语称为“纳石失”或“纳失失”,专供朝廷官员穿用。此衣色彩鲜明,工艺精湛,目前全国仅此一件,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图 3)。

### 7. 木屋

出土时放置在墓主人的棺盖上。屋高 74.8 厘米,长 180.5 厘米,宽 55.7 厘米。木屋为七层歇山顶,屋顶两面坡比较平缓,顶表以墨绘出宽条瓦楞。角脊头端似云头形,昂首做劈竹状。正、脊屋门均悬牙雕刻。上层雕仿木结构的斗拱、椽、檐、瓦垅,然后逐次分收,叠涩砌成攒尖顶,最高处悬铜镜。木屋正面开两道门,绘制了四位手捧琴棋书画的侍女,从服饰、形象来看,是典型的汉族。木屋的东门内插一木板,上绘一端坐在垂帐檐下的老妇人。木屋按照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制成,尤其是上层的 28 个斗拱,象征天上的二十八星宿。木屋虽然制作简单,但仍不失为研究元代木构建筑实物的参考资料。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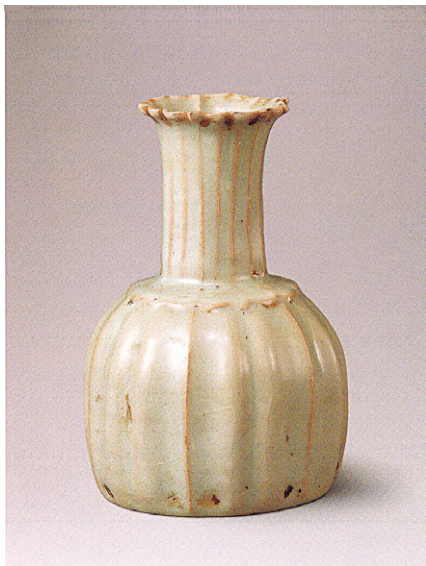


图2



图3



图4

正、脊屋门均悬牙雕刻。上层雕仿木结构的斗拱、椽、檐、瓦垅,然后逐次分收,叠涩砌成攒尖顶,最高处悬铜镜。木屋正面开两道门,绘制了四位手捧琴棋书画的侍女,从服饰、形象来看,是典型的汉族。木屋的东门内插一木板,上绘一端坐在垂帐檐下的老妇人。木屋按照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制成,尤其是上层的 28 个斗拱,象征天上的二十八星宿。木屋虽然制作简单,但仍不失为研究元代木构建筑实物的参考资料。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图 4、5)。

# 高立意 广视角 好效果

## ——南湖革命纪念馆新馆基本展陈特色论

### Highbrow idea, wide perspective and good effec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ermanent display in Nanhu Revolutionary Memorial

撰文 / 张志松

南湖革命纪念馆成立于 1959 年 10 月，是中共“一大”南湖会议会址的宣传、保护、研究和管理机构，属于近现代纪念性专题纪念馆，2001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湖革命纪念馆新馆占地面积 2.73 公顷，总建筑面积 19633 平方米，基本展陈面积 5194 平方米。新馆坐落于七一广场中央，由“一主两副”三幢建筑组成，呈“工”字型平面造型，设有主展区、临展区、影视（学术报告厅）及室外宣誓广场、水幕影视播放等功能区块。各功能区被精心地、科学地组合，共同为一个展览主题服务，使陈列展览馆内外结合，形成一个立体的、综合的展览空间，呈现鲜明的展览风格。新馆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中国共产党 90 华诞前夕正式开馆。

#### 一、创建史为重点，光辉历程是拓展， 高扬共产党好时代主旋律，展陈主题立意高

##### （一）既有重点又前后延伸的深广展陈范围

“任何成功的陈展，离不开成熟的陈列内容。换句话说，陈列是一门反映人文科学的艺术，它的灵魂是其内容的科学把握与选定……作为一名陈列内容的设计者，一定要具备对陈列主题、相关的学科内容、文物史料及其他展品的熟悉的把控能力，具有创新的理念、丰富

的知识和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sup>1</sup>南湖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之一，“红船”是中国革命的母亲船。1921 年 7 月 23 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由于法租界巡捕房的袭扰而移师浙江嘉兴南湖，在“一大”南湖会议上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共领导机构，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因此中国共产党创建史无疑是整个展陈的重点。为此，展陈领导小组专门召开了由中宣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和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研究室等中央和省市有关部门领导、专家参加的新馆陈列内容定位咨询会。又经嘉兴市委书记办公会议研究确定，南湖革命纪念馆新馆陈列内容定位为：以“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一历史事件为核心，以党的先进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一大”为重点内容，向前延伸至中国近代史，向后延伸至中国当代史。

##### （二）科学把握史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展陈立意

展陈内容的重点、范围和主题确定体现了展陈设计者对历史事件的史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把握水平。在征集各方面意见建议基础上，大纲编写小组又不断修改完善陈列大纲，最后

确定基本展陈共三个楼面，一、二层楼是重点，主要展示党的创建背景和过程，三楼是拓展，扼要介绍党走过的90年光辉历程。展览在清王朝中晚期走向衰落，生产力落后，政治腐败，思想统制，人民苦难中徐徐展开，又与同时期的英、法、美以及近邻日本陆续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力发展迅猛，海外殖民掠夺作鲜明的对比，然后有步骤地对志士仁人探索救国救民道路做了较系统地展示。屡次探索实践均遭失败，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革命的新方向，于是展陈重点介绍了各地早期共产党人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进步社团，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各种革命活动。“一大”会议召开的过程，特别是嘉兴南湖会议召开的情况，通过大型场景，大型艺术作品，反映历史时空的大型物件、照片等作了浓墨重彩的展示，突显其成立的历史意义。三楼基本以时间为顺序扼要展示党建立以后开辟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使革命最终成功；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有成绩也有曲折；实行改革开放开辟振兴中华复兴民族成功之路。最后以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提出的建党一百年，建国一百年发展目标作为展览的结束语。整个展览立意高远，以民族历史背景开始展陈，形象深刻地表现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华民族以此开始翻身解放，革命从此走向成功。90年光辉历程如歌如泣，今日的光辉与昨日的屈辱在短短的一个小时参观时空中凝缩，强烈震撼着每一位参观者的心灵，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与光辉，自然呼唤出万众一心跟党走，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最强音。

一馆两展，一重一拓，体现的是展陈设计者的政治水平、展示智慧、创新精神和恢弘手笔。从展览开幕以来接待了百万余参观者的盛况可看出，这样的展陈设计，既具历史感，又富现实性，党史的史学价值和党建的现实要求得到

了很好的结合和统一，设计获得很大的成功。

## 二、全景展示，详略得当，手段多样，呈现历史的波澜壮阔，展陈形式视角广

### （一）向前延伸，历史背景广阔。

南湖革命纪念馆新馆展陈的历史前后长达170多年，但没有给人以平铺直叙，一览无余之感。文如看山不喜平，展览艺术也是如此。近代中国被帝国主义入侵，每次入侵都强行与清王朝签订不平等条约，共有1182个，展陈重点选取了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北京，然后就用图表概括介绍，用爱国华侨谢缵泰的《时局图》来形象地说明山河破碎，人民苦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现状。叙述对民族出路的早期探索由魏源著述《海国图志》100卷开始，重点选取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洋务运动清廷自强求富，变法维新，辛亥革命孙中山建立共和政体又归于失败，北洋军阀割据战乱，民不聊生的窘况，清晰地参观者传递出了在清王朝中晚期国将不国的民族危机中，志士仁人无论是传统式的农民起义，封建王朝被迫打开国门改革，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的革命运动最终都未能挽救国家民族命运，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期待着一场新的革命。伟大的革命运动需要伟大的理论作指导，而伟大的理论的产生和深入人心需要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南湖革命纪念馆新馆的展陈对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进步社团的建立和活动作了较多的展示，通过图片、实物模型、场景及文献资料等手段重点介绍了以“北大红楼”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运动，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各地涌现出来的300多个宣传新思潮的进步社团，重点选取了李大钊的少年中国学会，毛泽东、蔡和森的新民学会，恽代英的利群书社和周恩来的觉悟社作介绍，通过典型照片、社刊和组成人员图表精炼地作了展示。在多种新思潮风起云涌之际，马克思主

义如何成为主流思潮，展陈重点介绍了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和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以及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几次大活动史实。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民族历史背景的展陈是为重点展陈党创建历史及其意义的铺垫展览。面对浩繁的历史现象，处理不当，易陷入或浮于表面蜻蜓点水，或事无巨细一味铺陈，但展陈设计者善于驾驭裁剪，使得介绍既有面上史实的一览图表，又有深入历史的人物事迹和时空形象。

## （二）突出重点，以史立论以论驭史

对中国共产党诞生事件的展览是整个展陈的核心，呈现如下特点：

1. 凸显陈独秀李大钊两位创始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逻辑结果，更是多少中华仁人志士探索救国道路的最终选择。展览用一幅当代著名军旅画家陈坚为新馆创作的大型油画“南陈北李”拉开介绍的序幕，用一个展厅单元重点介绍这两位创始人的生平业绩，凸显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首功”地位。

2. 较好处理了上海与南湖的关系。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上海作为中国近代工商业的中心城市，是工人阶级最为集中的地方，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多个“第一”都发生在上海。介绍党的创建史，上海的地位是一定要重视和突出的。展览在介绍了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在最显眼醒目的位置按1:1比例对上海“一大”会址作了场景展示，同时对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和共产国际代表照片群也在这一场景中安排，给人以会议的主会场感和会议的整体感。为了突出上海“一大”会址，展陈设计者还对灯光作了技术处理，运用颜色具有变化的变光射灯再现当时会议夜以继日举行，集中开会主要在

夜间的史实，又用视频展演反映“一大”会议的影视短片，让观众驻足细看，身临其境，进行历史的情感体验。然后再叙因会议遭法租界巡捕房的袭扰而被迫转移至嘉兴南湖。“一大”南湖会议是续会，展览介绍其中的缘由，阐述嘉兴邻近上海，交通方便，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特别是贤达人士，早期共产党人在嘉兴多有活动等人文元素，说明中国共产党最终诞生在嘉兴看似偶然，其实为必然的史实。对“一大”南湖会议的介绍是整个展览的重中之重，当然需要浓墨重彩，但展览在处理与上海“一大”会址的关系上注意了尊重历史，恰如其分，观众反映处理恰当，各得其所。它既是整个展陈的重点，也是棘手的表现难点，但通过对史实的研究和技术手法上的创新处理，又成为整个展览成功的亮点。

3. 代表的生平业绩介绍体现以史育人要求。在介绍好“一大”南湖会议议程以后，观众进入了一个南湖“红船”的1:1实景场地，通过等身幻影成像再现南湖会议的情景，并塑有十三位代表的大型铜质群雕。这个展厅里作为党的创建史的第三部分介绍了十三位代表的生平业绩。展陈站在以史育人的高度对十三位代表的生平业绩介绍作了大胆的详略处理、排序处理，体现以论驭史观。毛泽东、董必武是“一大”代表中的“成功人士”，他们既开天辟地，创建中国共产党，又坚定理想，百折不挠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更立党为公，忠诚为民，为人民服务一生。因此这两位代表首先介绍，最为详细，毛泽东更详细些。陈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是“一大”代表中的烈士，他们对党忠诚，甘洒热血，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党的革命事业，展览作了较详细地介绍和高度的褒扬，将他们的光辉业绩，闪光语言呈现给观众，何叔衡的“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誓言，王尽美的“唯尽唯美唯解放”诗句长使观众受到心灵的震撼和人生观的升华。李达、李汉俊因党内矛盾而负气脱党，但他们为

党的革命事业尽心尽力工作终使他们回到党的怀抱，或获得毛泽东手签的首批革命烈士称号或终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家。刘仁静、包惠僧则由于革命信念出现动摇半途脱党，间或跑到敌人中营生，但最终迷途知返得以安度晚年，善其终身。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则叛党叛国犯下罪行终被历史和人民抛弃。十三位代表的生平业绩是一部共产党人的厚重教科书，展览按照以史育人要求做出这样处理符合历史真实，更符合教育人的现实要求。

### （三）向后延伸，呈现苦难与辉煌

光辉的历程部分是对党的创建史的拓展，也是展陈的大胆创新。它以历次党代会为线索，对重要的历史节点作扼要展示，呈现党的历史的实质，苦难而又辉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展陈大胆地运用两幅高为4米，共长达20多米的巨型壁画艺术地展现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党的艰苦卓绝历史，又用半景油画结合多媒体声光电生动展现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摧枯拉朽的壮丽史诗，主展线则是历史图片间以革命文物表现多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建国以后的展陈分为三个历史时期，1949—1956年为巩固新生政权、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时期，1957—1977年为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艰苦探索中前进时期，1978年以后为开创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时期。每个时期分为两个部分作介绍，先是重要会议、重大决策、重要政治事件，再是这一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取得的成就介绍。由于时间跨度长，涉及内容多，展览采用基本归类方法作面上的展示，而对如开国大典、邓小平南巡讲话、港澳回归、中央政治局常委到联系点指导科学发展观深入学习实践、奥运会、世博会等重大历史事件则运用影视播放相关史料的办法加以展示，又根据多个展厅迂回空间较大的实际安放了“双百”人物事迹展示，秦山核电站模型，港澳区徽旋转成像，伟大成就展等多媒体触摸屏加以展示，从而有效扩大了展陈的容量，又

呈现展陈形式的广袤视野。

“依形象出现，把文字的陈列计划变成直观的可视形象表现出来，通过艺术性表现思想性和科学性，这在陈列中被称为形式设计。”南湖革命纪念馆新馆展陈将苦难而又辉煌的波澜壮阔的中国共产党史通过详略得当的裁剪、历史文物与照片的精选、重点史实或艺术或科技的再现，从而成功体现出重大题材内在的逻辑力量，表现出展览深广的全景式的历史画卷。

### 三、图片、文物、场景、

#### 多媒体有机结合，注重互动，观众反映效果好

1000多幅来自主流媒体权威发布的经典图片，800多件（组）的文物实物，6个大型场景，8个多媒体实景演示，10个录像影视资料视频播放点，20多个可供参观者动手触摸操作的显示屏，20多件艺术作品，800多米的展线呈现给观众的是一幅波澜壮阔、色彩斑斓、气势恢宏，可让观众融入的党的苦难而又辉煌奋斗史画卷，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心灵震撼力，持久回味力和情绪感染力。

#### （一）国内首创的序厅设计

一走进展厅，高9.5米，直径19.5米，占两个楼层的圆形展厅让人眼睛一亮，全铜铸造的大型红船从历史画卷中冲出，两侧是1840年至1921年间中国近代史历史的重大事件石材浮雕，用以说明中国共产党诞生是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必然，二楼则是玻璃钢材质的浮雕，反映党建立时，嘉兴南湖烟雨风光，散发浓郁的江南水乡特质，体现展陈的地域文化元素，顶部为大型LED屏幕，为了增强表现效果，设计者精心设计了一段反映党诞生具有开天辟地意义的视频短片，配以浮雕灯光，简要讲解，强烈表达出了整个展览的深刻主题。这样的设计在目前国内尚属首创。

#### （二）强烈冲击力的对比手法

反映近代中国的屈辱历史，展览从内容到

形式用的是对比的手法，一开始就紧抓住问题的要害，令观众深思。清王朝中晚期的男耕女织传统落后生产力，土地兼并严重，阶级矛盾突出，农民卖儿救穷，思想统制严重，大兴文字狱，国家万马齐喑，而同时期的世界则已开始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英、法、美和邻近的日本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机器大生产代替了传统的手工作坊，生产力大大发展，航海技术的运用使得资产阶级纷纷向海外殖民。“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并且“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法则”。在展览形式上，清王朝历史用的是开裂的岩石、被侵略者烧毁践踏的断垣残壁、昏暗的灯光，同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用的是大生产滚滚的机轮、坚船利炮照片和侵略者持刀枪侵入的血腥形象，从而入木三分地向观众传达出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

### （三）让观众进入历史的场景与科技结合

大型场景设计采用形象展示和现代科技相结合，观众可融入的手法增强表现力。虎门销烟场景观众可步入其中亲身体察滚滚弥漫销烟现场，体验将士们洗雪国耻心花怒放喜悦情感。南湖红船以1:1造型，还原历史，在中舱、前舱和船尾三个地方采用等身幻影成像技术生动再现了当年红船会场代表们激烈讨论，王会悟前舱望风守护，船娘船尾摇橹的情景，成为展览的一大亮点。表现解放战争历史用一条信息带简要介绍重要历史事件，在信息带的背后是巨型油画，上部转为空间渐远喷绘油画布，描绘了三大战役的战争场面，设计者用多个投射器和音响将我双方的行进队伍，枪炮声，落地炸点表现得绘声绘色，配以生动的解说词，把观众拉回当年的峥嵘岁月。

### （四）重要历史节点用视频展演

为了尽可能地展示更多的史实，设计者在重要的历史节点采用视频播放手段来增加展示内容，如俄国十月革命、“一大”会议、港澳回归、

王会悟专访、嘉兴历史旧貌、开国大典、邓小平南巡讲话、北京奥运等。观众在时间许可下，可驻足观看，深入到历史的具体细节，从而拓展了历史长度和深度。

### （五）尽可能让观众“动”起来

为了让参观者更好地走入历史，增强教育效果，展陈运用了较多的触摸屏，有历史图片的展现，有关知识的问答，还专设留言区，观景廊，其中安放了较多的休息椅和站立把手，目的则是让观众在参观过程中有较多的动手操作机会。从教育学的角度看，教育是通过“教学”进行的。而观众的动手操作就体现了“学”的要求，从而调动了参观者在参观过程中的自觉参与，求知体验，实践感悟的积极性。开馆以来，“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改革开放伟大的成就”等多部触摸屏的使用率极高，不时出现因观众动手太多爆棚而死机现象。在留言处，不时可看到久经考验的老党员对历史沧桑的深刻感悟和对今天民富国强、国泰民安的由衷感叹，广大青年入党积极分子对党的宗旨认识和坚定信念跟党走誓志铮言。

“陈列是博物馆实现其社会服务功能的主要方式和手段，也是博物馆贡献给社会的特殊精神产品。”南湖革命纪念馆将以一流的展览，一流的管理，一流的服务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传播，文化强国建设中尽到党的诞生地纪念馆应尽的社会教育责任。■

### 参考文献

- 朱成山《鼎力铸史》，南京出版社，2008年11月，第14页。  
 吴永琪等主编：《遗址博物馆学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第242页。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9月，第31页。  
 盛群力、李志强编著《现代教学设计论》，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2页。  
 朱成山《鼎力铸史》，南京出版社，2008年11月，第12页。

# 走出困境 转型发展

## ——关于博物馆讲解员专家化的思考

### How to guide tours in a curatorial way

撰文 / 何沫

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背景下，博物馆、纪念馆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随着新建、改造和待建的场馆不断增加，硬件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走进博物馆、纪念馆参观的观众也日趋多样。人们不断提高的文化素养和鉴赏水平，向身处一线的宣教人员，特别是讲解员提出了新的挑战。讲解员是博物馆陈列展览的传播者，是展品和观众之间交流沟通的桥梁，是实现博物馆传播、教育功能最直接的承担者。在当今国际化的背景下，如何与国际接轨，如何在新的历史机遇期，实现文博讲解员的转型发展，实现宣传展示、开放服务的最优化，笔者认为，专家化讲解是未来博物馆讲解的发展要求，专家型讲解员是未来讲解员发展的趋势方向。

#### 一、国际博物馆讲解工作现状

在欧美国家，博物馆并没有我们所设的讲解员。在美国，很多博物馆都设有教育部，往往设有教室，但并不是由博物馆人员为观众上课，而是提供给学校老师，他们可以直接带着学生去博物馆上课。在洛杉矶里根图书馆内所设的博物馆，没有专职讲解员。在职员工 25 人，而志愿者讲解员却有 165 人之多，都由退休教师、相关问题专家担任。他们的岗位很灵活，他们在服务台、展厅内散布着，只要观众有需要，他们就会主动为你讲解。当然，这种讲解是非常专业、非常学术的，并没有半点表演的意味，他们与观众的交流，常常是讨论式的，如果你不能跟他对等沟通，他可能不会告诉你更多的东西。在日本，陈列展览一般也没有专职的讲解员。但遇

有同行和贵宾前去参观，讲解工作往往由“学艺员”来担任，他们实际上就是相关展览内容的研究专家。他们的讲解也没有固定的套路和程式要求，他们更多采用的是一种“解说”或者“解答”的方式，完全是口语化的，常常是一对一，或一个对两三人。他们更乐意回答你的问题，而不是导引参观。这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

#### 二、中国博物馆讲解员面临的困境

在中国，长期以来人们对讲解员这个职业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常常单纯地把讲解员看成是青春职业。普遍认为，讲解员只需年轻貌美，外形、气质上佳，普通话标准，声音优美，背熟讲解稿即可上岗服务。讲解员受重视与否，也往往受制于单位管理者的认识和重视程度。现行博物馆由于体制、编制、类型、属性、地域及功能的差异，对讲解员的录用、培养和发展方向的定位不尽相同，直接导致讲解员队伍文化知识、年龄、性别等层次结构参差不齐。不同管理者的不同认识，外界对讲解员职业的偏见，造成对讲解员一种无形的伤害。而讲解员本身，由于业务追求最终无所归依，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结构的断层，外在优势的逐渐流失，只能无奈地在迷茫中沉浮、挣扎。因而，讲解队伍不稳定的现象较为普遍。

目前我国讲解员总体的学术水平不够理想。较多讲解员停留在引导参观和一定程度的表演色彩，而专业基础和研究能力较为薄弱，对专业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鲜有了解，导致讲解内容一成不变，仅

仅满足于一般观众的参观需求。

由于认识上的偏颇，对讲解员的培训也较偏重于语言表达、发声方法、讲解技巧、形体礼仪等入行的基础内容。而就本专业的学术、理论研究的科目设置和培训项目相对较少、较弱。究其原因，笔者以为：1. 讲解员自身对职业理解上的偏差，对讲解工作所承担的社会教育和传播功能的内涵缺乏应有的认识；2. 讲解员本身学业基础较弱，缺乏学习、研究的能力，加之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性，缺乏从业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3. 讲解员视野狭窄，缺乏关注研究成果和信息的意识和渠道。研究与宣教相对脱离，研究为宣教服务未形成良性的互动。

近年来，一些革命纪念地的讲解员，为丰富讲解形式，更生动、形象地展示讲解内容，以讲、唱、跳、演的形式贯串于整个讲解过程之中，不失为一种值得借鉴的创新形式。讲解的最终目的，在于引发观众参观兴趣的同时，引发观众对展品的持续关注，对展览内在所揭示和传递的文化、历史、人文等精神实质有更深的体悟和思考。后者恰恰需要的是作为教育传播的载体——学养深厚的讲解员来帮助实现。而适情、适境的唱、跳、演的形式融汇于学研功力深厚的讲解，可谓是锦上添花。但就长远而言，如果到了四五十岁，是否还能这样表演？如果观众希望了解更深层次的内容，讲解员是否能满足需求？

博物馆、纪念馆的讲解工作是一种传播、教育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讲，讲解员应具备教师的素养。因材施教、因人施讲理应成为讲解员追求的最高境界。但事实上，年轻讲解员即便具有一定的教师素养，如果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往往缺乏激发调动观众兴趣和主动情绪的意识，缺乏与观众进行比较专业的沟通、互动的能力。只能作浅表的讲解，难以应对观众提出的有一定专业深度的问题。

而学研造诣较高的资深讲解员却能随时捕捉观众的心理和情绪的微妙变化，并深入、专业地讲说展品背后的故事，甚至解答观众的各种难题，满足观众了解历史、获取知识、陶冶情趣等多方面的需求。

### 三、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背景下，博物馆、纪念馆也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据统计，目前，全国博物馆总数达到 3415 座，年增博物馆 395 座；免费开放博物馆达到 1804 座，年接待观众 5.2 亿人次。随着受众不断扩大和普及，博物馆、纪念馆的公共服务性、社会化教育、人性化服务的属性和功能也愈加突显。宣传展示、开放服务成为场馆又一个工作核心。知识的获得和文化的追求，使得更多的大众走进博物馆，普及与提高人们的鉴赏水平，艺术修养，引导大众了解历史，尊重历史、面向未来增强了博物馆的责任和使命。

随着物质生活、文化层次和文化自觉意识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有了更高、更大的需求，对博物馆、纪念馆的认知、鉴赏能力和水平较以往也有很大的不同。讲解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对展品的介绍和说明，更多则是知识的传递，内涵的揭示，文化的传播。受众已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依从个体兴趣、关注内心诉求，主动选择和探究。目前，普遍陈式化的讲解已难以满足不同观众的需求。那么，倡导善于学习，不断汲取新知识，讲清展品、激发观众兴趣，引发观众关注和思考，富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专家化讲解员的职业方向，显得尤为重要。

同时，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随之快捷与多元。带着各种疑惑的人们走进博物馆，渴求获取更权威、更科学、更专业的信息。因此，直接面对观众的讲解员不能只是孤立、被动地利用现有的讲解内容开展传播教育活动。而是应该利用工作一线的优势，捕捉文物征集的信息，随时了解和熟悉博物馆行业及本专业领域的最新动态信息和研究成果。了解新的不同学术观点，把握学术发展动态、掌握新发现的史料，来充实讲解内容。首先成为观众眼中的专家并逐渐使自己成为专家眼中的专家。这样，一个讲解员就从一个类似导游的宣讲者变成了专业的阐释者，当积累到相当程度后，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专家，顺理成章地转型为“专家型讲解员”，并最终转变为“善于讲解的专

家学者”。这样，讲解员就既具备了专家型讲解者的能力，又具有专职讲解员更善于表达、甚至表演的双重能力，从而得到更好的讲解效果。这也是与国际接轨，实现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

#### 四、实现转型发展的有效途径

博物馆讲解员实现向专家化转型，笔者认为可以从这几方面入手：

##### 1. 提升对讲解员职业的认识

博物馆教育是感观教育，其目的是拓宽视野、增长知识、传播观念。而讲解作为博物馆教育的一种形式，其作用和意义在于引导观众参观，诠释展览的同时，激发观众兴趣而引发思考，在与观众沟通互动的过程中产生共鸣，体现博物馆的人文关怀。讲解员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展览与观众间传递信息的载体，还应具有再创造的能力和功能。基于这些认识，我们应该努力走出定位讲解员为青春职业的误区。突破长期以来讲解员在录用标准，培训方向，服务理念等观念上的制约。在录用标准上除了入职的基本要求外，更应该重品学兼优，重专业对口，重学业基础，重研学能力。在培训方向上除讲解员应具备的基础条件外，从业人员的社会责任感，专业素养，融会贯通的研学能力以及交流沟通能力也更显重要。

##### 2. 提升讲解员综合素质

从某种意义上讲，讲解员是一个形象代表。因此，讲解员政治、文化、职业等综合素养的提升势在必行。首先，讲解员应具有高度的意识始终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立足博物馆、纪念馆这方特殊的舞台，借助历史文化遗产，以传播、教育为己任，积极引导受众建立健康向上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弘扬先进文化，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其次，不断加强文化和艺术修养，也是讲解员综合素养提升的重要一环。培养关注人文、历史、艺术的兴趣和习惯，提升文化品味。再次，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更是讲解员从业的必要环节。掌握基本的职业技能是从业的基础，树立持

久的职业信念，坚持职业操守，恐怕是讲解员应不断追求和实践的行为理想。

##### 3. 提升讲解员专业素养

要成为专家型的讲解员，除了努力提升政治素质、文化素质、职业素质外，更应该以提升研学能力为最高目标。具体来说，可以从如下途径着手：第一，不断学习吸收新的知识、探究新发现的兴趣和能力的。不满足于只在表面上对展览和展品的资料了解和掌握，而是力求深入和扩展。深入了解文物或展品的来历，背景和背后的故事，研究探索蕴含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思考各种角度诠释展品的可能和方法，充分体现陈列意图。善于学习新成果，发现新问题，具有怀疑和否定，争论和探讨的科学态度；第二，善于分析和理解新的学术观点，掌握和运用新的学术成果。物史结合，重点突出，用亲切自然的态度，简明通达的语言，深入浅出的表达，充分诠释展览内涵和精神实质。由此，引发观众兴趣，主动融入展览，激发思考和情感；第三，善于关注和研究观众的类型和诉求，思考我们应当给观众什么？哪些是观众自己可以获得的信息，哪些不能？不程式化地重复每一次讲解，面对不同观众能迅速判断其身份、需求与倾向，针对性地传递给观众所需的信息，随时把握讲解过程中观众的关注点，引导互动和交流。让观众充分享受获取知识的满足和愉悦。

#### 结语

综观国内外博物馆讲解工作的现状，专家型讲解越来越为人们所期盼，讲解员向专家化转型和发展的趋势也愈加显著。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成为“专家”是讲解员的最高理想，对大多数讲解员来说有着遥远的距离。但是，只要我们坚守社会责任，坚守耐得住寂寞的从业信心，坚守学习探索的科学态度，并准确定位讲解员社会角色和功能，不懈努力钻研业务，相信我们的讲解员团队会在“专家化”道路上不断前行，并无限走近“专家”。

# 让传统节日的故事“走”出来 让优秀文化的氛围“活”起来

## Tell the stories of traditional festivals and activate cultural atmosphere

撰文 / 朱臻

### 引言

今天，面对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人类社会珍贵的文化记忆也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承载着松江地区文明发展印记的博物馆，不仅拥有丰富的藏品资源和文献资料，更拥有着深厚的人文精神。近年来，松江博物馆通过举办多种内容、多样形式的展览，体现出博物馆的社会职能，也获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

为了激发博物馆可持续发展的活力，进一步加快博物馆融入社会生活的步伐。松江区博物馆不断寻求展示与教育互动的契合点，努力尝试知识性与艺术性结合的突破，换种角色和视角，并根据关注观众需要，开始从“以藏品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转变，走出“馆舍天地”面向“大千世界”。而这种变化在2011年的“民俗节日系列”巡展进校园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现，也使松江区博物馆的亲合力与影响力得到了增强。本文试就通过总结“民俗节日系列”展览进校园活动的实践，为探索一条让学生不出校园就能了解本地区传统文化和民俗风情的路子，促进他们对本地区历史

文化的了解和热爱，从而达到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的目的。

### 一、活动的灵魂在策划

当前，随着社会上各种形式“国学热”的出现，传统文化及其教育问题，再次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上的报告》中强调：“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这表明，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已经在全社会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与支持。松江博物馆举



办的民俗系列展览也应运而生，观众慕名而来，尽兴而归。然而在观众统计中，本应成为博物馆主要观众的青少年学生，却鲜觅踪迹。结合观众调查，不难发现繁重的课业，使学生们难得有自由活动的自由时间。面对当前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的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是否可以“贴近生活”，从本土优秀的民俗文化着手，通过更为有效的途径来实现博物馆宣传窗口的作用？

松江博物馆开放教育部的工作人员敏锐地意识到，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目前博物馆“贴近群众”，融入校园文化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在初步构思了活动的框架后进行了可行性分析，最终确定了“民俗节日系列”的巡展计划。考虑到中国的传统节日不仅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且地域形式也各不相同。松江人尤爱过节，几乎每一个节日都有其特殊的习俗，人们借此享受节日的种种乐趣。譬如：中国人扫墓祭祖的清明节，松江人都会吃青团。因为青团包含了“团圆”的吉祥意义，满足了人们希望阖家团圆的心理需求，成为最具特色的节日饮食活动。在带有浓重爱国主义色彩的端午节那天，松江人都会以裹粽子、吃粽子来纪念屈原。中秋时节松江人除了赏月吃月饼，还喜食南瓜饼。在体现保持家庭和睦、尊老敬老优良传统的重阳节，松江地区则有饮菊花酒、蒸重阳糕，结伴游九峰或去古塔作登高会的习俗。这些饶富特色的民俗目前正在逐渐退出我们的生活。想要让青少年了解传统民俗，首先要走近他们的生活，学校就成为展览最好的平台。那么如何选择展览时间？如何吸引中小学生参观？这些都是实现展览目标的关键，通过与学校老师的沟通，共同商定了清明、端午、中秋和重阳节的展览主题。

## 二、活动的关键在准备

依据陈列展览主题撰写展览大纲之前，专业人员首先要对展览所涉及的内容，进行充分的资料准备，这是保证展览工作顺利进行的关键。展览资料准备的范围主要包括理论基础、

研究动态、文字资料、实物资料、照片和图片资料等。在进行了扎实、认真、详细、周密的展览资料准备的基础上，经过对展览资料的整理、思考与研究，展览工作才能真正进入到展览大纲的创作阶段。

由于展览是以民俗节日为主题，专业人员首先参考了国内较为成熟的民俗展览，形成一个大致展览轮廓。然后正式进入展览资料的收集、整理阶段。为了保证展览内容的准确性，借鉴了国内专家、学者的理论研究成果，如我国第一套按照当代民俗学学术规范撰写的、系统介绍中国民俗的大型志书——《中国民俗通志》。同时还参阅了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撰写的《图说民间传统节日》，辅以《我们的节日》系列丛书等近十部相关民俗学的著作。“贴近实际，贴近生活”是系列巡展的侧重点，为此研究人员不遗余力地挖掘松江本地区的优秀民俗传统文化，以《民俗上海》（松江卷）和《松江民俗》为蓝本，做了大量的笔记和摘要。通过近三个月的资料收集和整理。研究人员结合青少年探究心理特征，编写出了适合松江广大青少年了解本地区传统节日文化的展览大纲。

通过研究审核，最终确定系列展览的四个总标题为：话说“清明”时节、粽叶飘香话端午、花好月圆话中秋、诗情菊香话重阳。

## 三、活动的亮点在设计

展览大纲撰写完备后，为了使设计人员充分了解和把握展览内容，由大纲撰写人员为其解读展览的内涵和相关的专业知识。内容涵盖展览主题、风格、重点、图片及文字说明等相关内容。而设计人员在展览风格的确定上与大纲撰写人员进行商定，力求展览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凸现展览鲜明的风格和独特的内涵。

由于系列展览的受众是广大的青少年学生，如何让展览的信息真正被他们接受？设计人员根据展览主题，确定了以图片来解释文字的展览信息传递方式。每个展览均根据文字内容配上相

应的图片，而这些图片则要求契合文字内容，能准确、鲜明、生动地表现陈列主题。为进一步吸引学生的注意，在展览首版上除了用显眼的加粗字体标示展览主题外，还辅以与本节日特定相关事物的图片，起到一目了然的作用。

如何能使学生在一种平实的氛围中感受节日、从生活的点滴中感受传统，充分体会中国传统节日的含义与韵味？设计人员从字体的选择着手，综合考虑了学校书法教学和学生审美趣味的特点，选择比较受欢迎的楷书为主体文字，辅以2008年奥运会官方字体。展览文字中难免遇到生僻字，他们也细心地用水印的方式标注出正确的读音，在不影响版面美观的前提下，为学生参观的完整性提供最大便利。色彩上则做到一个节日一种颜色，根据每一期展览的内容运用一些色彩肌理和月亮、祥云、传统山水画、牡丹、织锦纹理等效果作底纹。运用古桥一角、绿叶等图案作一些装饰，在色彩构成上加以处理完美。运用一些点、线、面的平面构成组合方法，在排版上做到合理布局，突出重点，同时大胆留白，使整体上大气、流畅。为使一级标题更为醒目，选用了代表节令的传统色调作底纹，增强了展览的新鲜感和视觉上的美感。使学生不仅直观地感受到浓郁的节日气息，更是在不经意中被中华传统文化所浸润。

#### 四、活动的核心在宣传

策划周密的宣传是展览活动成功与否的关键。在这个方面，上海博物馆的成功经验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根据本馆的特点创新地采取“前期宣传造势、后期持续渗透”的宣传手段。为了扩大展览的影响面，开放教育部的工作人员主动联系了《松江报》的记者，在“民俗节日系列”巡展前“吹风”，在提供准确信息的同时，为活动的顺利开展提前造势。

与学校老师QQ群的建立，使我们能与老师们始终保持良好的联系，不仅方便与学校老师的沟通互动，避免展览时间与学校的重大活

动产生冲突，而且也方便了相关展览的信息的告知。在展览开始前一周，正式启动校园宣传工作，将巡展的主题和框架内容通过口头形式告知老师，对于相关知识的辅助解读资料也通过QQ网络进行了传送。这一做法有利于老师提前了解展览内容，进一步做好学生观众的宣传与发动。展览布置结束后，在第一时间通过网络，将简讯及布展工作照片投送各媒体。

为了延伸展览的效应，还主动联系老师，摸索与学校教育活动接轨的新途径。走进中学校园，举办题为《松江城隍及城隍庙照壁》的专题讲座，穿插了许多相关的图片资料并加以详细深入的注解和剖析，将斑斓、丰厚的松江“府城民俗文化”一角，展现在在青少年眼前，使其从家乡的古代文化中汲取丰富的营养。

#### 五、活动的保障在组织

观众的组织也是判断展览活动是否成功的衡量标准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博物馆的教育范畴也日益拓展，如何有效地实现“民俗传统节日”系列巡展的教育目标，成为松江博物馆开放教育部人员急需攻克的课题。

要解决问题首先要了解问题的关键所在，回顾了近年来在学生参观、征文、知识竞赛、夏令营及历史讲座等活动组织中遇到的问题和成功经验，结合观众调查的结果。发现成功的



观众组织，不可或缺的是抓住观众的特点。具体到本次巡展的受众是中小学生在参观类型上属于学习型，要求比较一致，往往会有老师在旁协助。这些学生求知欲比较强，思想活跃，常会提出一些新奇的问题。根据这一特点，我们先期与学校大队辅导员进行联系，将展览内容进行大致的介绍，请他们在一定范围内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关注的与展览相关的问题进行汇总，并转发给开放教育部。由开放教育部进行解说词的编撰工作，并进校培训小小讲解员。这一做法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通过小小讲解员稚嫩的嗓音，本地区的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更为有效的宣传，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实现了展览的最大效益。

#### 六、活动的重点在实施

展览实施阶段的时间非常紧，容易遇到各种各样不可预见的问题。设计人员工作做在前，在实施前通过开放教育部与学校取得联系，提前到展览放置的区域进行实地观察，之后再确定下展架的形式、质地及展板的选材。由于展览是布置在室外，结合历年外出巡展的经验，选择了不生锈、较防风的人字形铝合金折叠展架，底板则选用稳定性较强的雪弗板，而版面的材质则选用了不容易产生颜色失真的写真板。

在实地布展的过程中，也进行了相应程序的调整，譬如在第一次巡展中采取的是提前一天将版面安装到展架上，按照展线设计，在标签纸上写上标示展架次序的阿拉伯数字，统一粘贴到展架的左上角。然而到了布展实地，却发现这样做反而给布展工作增加了难度，版面也容易划伤。第二次布展就改为由设计者统一安排，现场进行版面的安装，通过实践证实这一方法有效地提高了工作效率，确保了展览的效果。

在与展览配套的讲座活动开展前，开放教育部人员就先期与校方进行沟通，在几次更改时间后，确定最后的活动时间，并对学校内的活动场地进行了现场观察，测量横幅尺寸，确

定讲台位置及计算机、音响、投影设备的运行情况。活动当天提前一小时到场，测试课件播放是否正常，并做出及时调整。

#### 结语

我们欣喜地发现除了校方组织的参观活动之外，还有不少学生在展板前流连驻足，提出要在端午节举办包粽子比赛的请求。老师们说博物馆的巡展活动，在校园中营造出浓厚的传统节日氛围，展览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不用专门去博物馆就能看到展览，了解中国传统节日的相关知识，感受松江独特的地域文化。

在欣喜之余，却有一丝遗憾。虽说此次系列巡展在收获赞扬中告以段落，但在学生层面来看，参观过后，心中的感想却没能在一个由博物馆和学校提供的平台上展现。这种遗憾也提醒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常用换位思考的方式来考虑问题。

作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青少年教育服务一直是博物馆的重要使命。松江区博物馆蜕去教育者、训导者的角色，走出庭院，走进校园，开展“民俗传统节日”系列巡展。以平等的姿态，吸引孩子们主动走近“记忆的殿堂”，在潜移默化中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创新展览形式，使学生进一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不断吸收其中的有益成分，将其印入心灵之中，融入生活之中。📖

#### 参考文献

- 单霁翔《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天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
- 中国博物馆协会、宁波博物馆《21世纪博物馆核心价值与社会责任》，科学出版社，2010年。
- 北京博物馆学会《博物馆社会教育》，北京燕京出版社，2006年。
- 齐玫《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策划与实施》，文物出版社，2009年。
- 姚安《博物馆策展实践》，科学出版社，2010年。

# 论博物馆纪念馆藏品信息化管理

## On managing information in museums and memorials

撰文 / 朱中一

信息是事物运动状态的表述，是物与物、物与人、人与人之间的特征传输，信息是数据处理的最最终产品，即信息是经过采集、记录、处理，以可检索的形式存储的事实与数据，信息具有可识别性、可存储性、可扩充性、可压缩性、可传递性、可转换性、特定范围有效性，是管理和决策的重要依据。博物馆的信息化是以藏品信息化为基础的，博物馆数字化及数字化博物馆的建设都是基于藏品信息化之上的。

当今信息技术已经渗透到了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信息化给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信息化的飞速发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理念，同样，信息化也影响着文博事业的发展，博物馆的信息化承担着文物的收集、保护、管理与利用功能，为人类的历史文化遗产信息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提供全新的理念和方法。

### 高新技术管理模式终将替代传统的 藏品管理模式

传统的藏品管理模式无非就是用编目卡片记录藏品的基本信息，卡片式管理阻碍了我们现在的高效、快节奏的工作，卡片式管理至少存有以下6个不足之处：第一，卡片本身可填写的信息区域很有限，卡片上不可能保存藏品的多媒体信息；第二，卡片上的文字清晰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得模糊不清；第三，卡片会随着使用人的增多可能会被丢失；第四，卡片使用后，在放回原处时很可能会放错位置，

致使给以后的使用者带来很大的麻烦，甚至会找不到该卡片；第五，卡片式管理不能对藏品的利用情况或变动情况进行跟踪记录，藏品的档案信息就不完整；最后，也就是最突出的问题，通过卡片检索很不方便，比如要检索包含有某一个关键词的卡片，要在成千上万张卡片堆里，通过人工来完成检索，这个工作效率就好比蚂蚁啃骨头——慢慢来，如果要检索多个关键词那最起码要花上好几天甚至于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完成，有时甚至无法完成，耗时耗力、工作效率极其低下，而且检索出来的结果还不一定完全准确，因为这是通过人工操作来完成的，人的大脑工作时间长了就会疲劳，疲劳就会产生差错，这是一种生理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工作效率对于当今高要求、高速度的工作节奏是极不相符的，因此，传统的卡片式管理模式势必遭淘汰，替代的就是利用高科技技术——计算机信息管理技术，利用计算机的高速计算能力，既提高了藏品的检索、统计速度又提高了检索的准确性，尤其是在藏品量非常庞大的情况下，对藏品进行各种条件的组合检索或统计时越能显现出计算机的优势，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 做好藏品数字化管理的前期工作

#### 1. 藏品指标的确定。

在藏品信息化管理建设之前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前期准备，这其中包括：首先，要做好藏

品的编目工作。藏品的编目工作很重要，这关系到今后的检索、统计等操作，根据国家文物局下发的《馆藏文物信息指标著录规范(试行)》，藏品的编目涉及到的全部指标有：文物总登记号、分类号、原名、名称、藏品级别、藏品类别、年代、时期、质量、尺寸、实际数量、传统数量、说明、入藏日期、鉴定日期、鉴定机构、鉴定人、鉴定意见、保护记录等 220 个指标项，其中核心指标有：原名、名称、文物类别、年代类型、年代、质地类别、形态特征、完残程度、完残状况、尺寸、尺寸单位、质量、质量单位、实际数量、实际数量单位、来源方式、来源(单位或个人)、收藏单位、总登记号、入藏日期、鉴定日期、鉴定机构、鉴定人、鉴定意见、文物藏品级别、当前保存条件、保护优先等级、保护记录等 42 个指标项，在指标项的选用方面，220 个指标项不可能全部用上，要根据自己单位的实际情况来选用，但是核心指标是国家文物局规定的，它具有全国各个博物馆最基本、最共性的特征，然后再根据自己单位的需求可以新增若干个特定指标项。笔者就曾经遇到新建的博物馆、纪念馆前来咨询怎样进行藏品数字化管理，结果得知前来咨询的单位连藏品的编目、藏品的分类还没有确定，这就无法对藏品进行数字化处理，更不用说对藏品进行著录工作等，因此，只有在做好藏品的编目和分类等工作之后才有搞藏品信息化的基础。

## 2. 藏品管理软件的选用及功能的分析。

在完成藏品指标项确定的基础上，下一步就要考虑选用什么样的藏品管理系统、藏品管理系统要包含哪些功能等等，首先要考虑到藏品管理系统的结构必须是开放型的，这样有利于今后新增指标或删除或修改指标等，为以后可能会增添新的藏品指标项留有可扩展的余地；其次是该藏品管理系统采用什么样的数据结构，数据结构主要有 B/S 结构和 C/S 结构两种，B/S 结构的管理系统在软件的安装、数据的维护以及远程访问等，不论是用户使用还是

管理员的管理都比 C/S 结构来的方便，而 C/S 结构的管理系统在软件的安装和数据的维护方面不如 B/S 结构简单，软件维护成本也会随着使用人数的增多而不断增高，因此建议尽可能使用 B/S 结构的管理系统，另外藏品管理系统在开发时还要充分考虑到藏品管理系统的各个功能，笔者认为花在这方面的时间要适当多些，各单位要尽可能地考虑到本单位的工作流程，要做哪些事情，一定要尽最大可能地考虑周全，因为有些功能模块是互相联系的，如果要在今后再增加功能的话就会带来很大的麻烦，甚至会出现有些功能模块不可能添加等问题，笔者就有这方面的经历：由于第一次搞藏品信息化建设，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在还没有完全弄清楚自己需要哪些功能时就急于开发系统，结果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觉得还需要添加新的功能时，开发商回答说该系统的结构已经确定了，不可能再增加新的功能了，要么全部重新开发，重新开发意味着原来的系统就要全部废除，另外还要涉及到经费的浪费等问题，这就有点麻烦了。如果在短时间内无法确认使用哪家开发的管理软件或功能还不能基本确定时可以先用 Excel 表格进行数据的著录，这样至少可以先用 Excel 电子表格来对藏品进行检索和统计，因为 Excel 电子表格的数据可以导入到今后的数据库管理软件里，也就是说 Excel 电子表格数据是不会白做的，这样既可以先进行藏品数据的录入，又为方案的决策预留了足够的时间，做到两不误。笔者在第二次选用藏品管理系统时就特别重视该系统的管理功能是否基本满足本单位的需求，是否与本单位的工作流程大体上一致等事项，现采用的是国家文物局信息咨询中心下发的“博物馆藏品综合管理信息系统”藏品管理软件，首先该管理系统的结构是开放型的，如图 1 所示，用户可以随意增减指标项或修改指标名称等，使用非常方便。

该管理系统的功能比较全，除了具有记录藏品的基本信息以外，还可记录很多与藏品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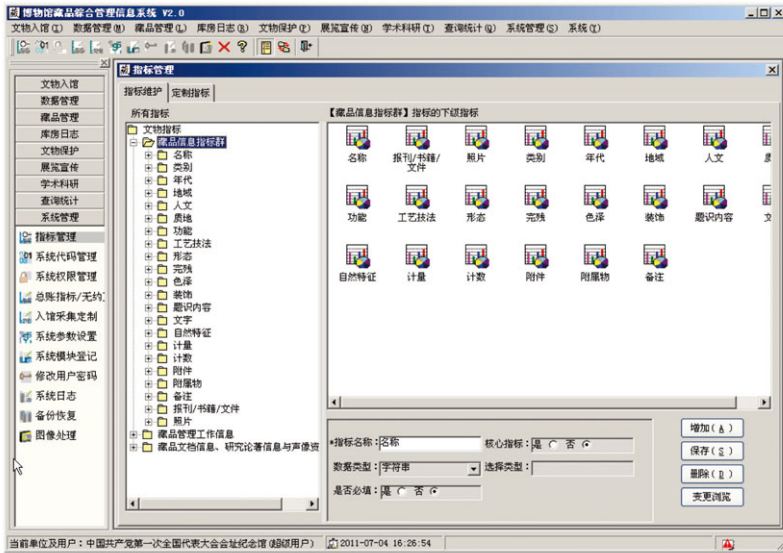


图1

关的信息，比如有藏品的出入库记录信息、藏品的学术科研信息、藏品的保护记录、藏品的移动、事故等记录等，如图2所示，但存在的不足就是该系统结构是C/S型的，给管理员带来了很大的工作量，不仅要在每个客户端需要安装该管理系统，还要对每个客户端的管理系统进行维护升级。

### 藏品数字化管理尚且存在的问题

#### 1. 藏品管理标准化的问题。

所谓藏品管理标准化就是在藏品信息化建设时全国各博物馆、纪念馆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分类、定名、定级等，使藏品信息化有据可依。全国各博物馆、纪念馆在搞藏品信息化建设时首先考虑到藏品信息标准化的问题，标准化是藏品信息化的基础工作，有了标准化就能在文博业界实现藏品信息的资源共享、互联互通。实现标准化最突出的问题是：藏品的分类、定名、定级、年代、件数、质地、说明等都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各博物馆、纪念馆只能根据各自的实际

情况来制定标准，建立各自的藏品数字化信息。另外还由于我国地域宽广，难免在各地区存有明显的文化差异，从而形成对藏品的描述不确定、称谓不统一等现象，有时就同一件藏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不同的年代对其的称谓甚至也会不一样，存放在不同的文博单位对其的称谓等也会有不相同的问题，从而形成了各馆的藏品信息化标准不统一、不具有通用性和资源共享性，检索不方便，

重复建设严重。因此，解决藏品信息的标准化问题藏品数字化建设的当务之急。

我国的藏品信息管理的标准化工作起步较晚，且过分强调各博物馆、纪念馆的行业特点，因此标准化的制定和推行工作显得迟缓，现有标准没能完全配套。笔者认为，根据当前形势，各地博物馆、纪念馆应该严格执行已有的国家标准（如《文物藏品定级标准》、《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等），对一些通用的国家标准（如日期表述方法、行政区划、中国各民族名称、论著出版形式类别等）直接采用；而对于具有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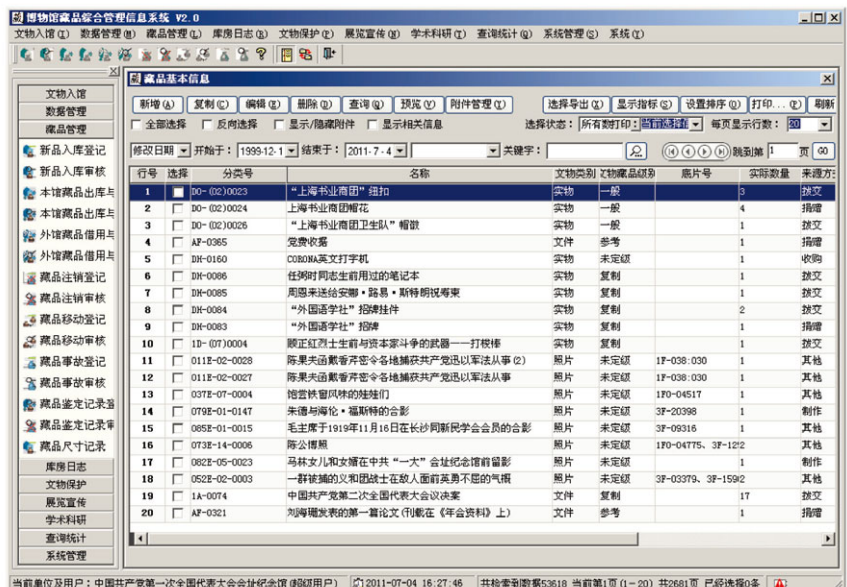


图2

行业特点、没有既定标准可用的(如藏品名称、级别、质地、分类等),则应结合行业特点和习惯来确定。藏品名称、纹饰、工艺、来源等信息,必须采用专业、规范的文字语言进行说明性描述;藏品的计量统计可按照藏品的保管、统计意义来规定计数原则和计量单位,尽可能提高信息的准确性。笔者建议藏品的统计可分两种统计方法:1是统计单位为“套”;2是统计单位为“件”,按用途拆分到不可再拆分为止,作为一个计件单位,每个计件编有一个分类号,几个单件需组合起来使用的作为“套”,这样可根据管理员的需要统计出每件藏品或一套藏品的利用情况,如果几件藏品合编为一个分类号,那么在统计藏品使用情况时就很难说明是哪件具体的藏品。

全国博物馆、纪念馆的藏品的分类繁复,几乎包容了世界上所有的类目,藏品的分类也就不可能做到完全一样,比如艺术博物馆藏品的分类有青铜、陶瓷、书画、玉器、漆器、家具等,而纪念馆的藏品分类有实物类、报刊类、书籍类、文件类、照片类等,实物类分有武器类、钱币类、文具类、艺术品类等,各博物馆的分类多有不同,然而国家文物局下发的藏品管理系统里预设的文物指标项基本按照博物馆的标准制定的,管理系统要做到全面兼顾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各单位可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增减指标项,按照国家文物局制定的核心指标逐一填充信息。

笔者认为在藏品信息录入时有些指标项的内容可以暂且模糊或空白,比如来源、年代、时期等,不要拘泥于指标的规范,相反应该要保证一些核心指标,藏品信息化的宗旨是要本单位使用简便,以提高工作效率为上,要以解决文博行业的实际需要为目标,开发功能完善、安全可靠的藏品管理系统,加快推广应用,切实提高文博业界的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真正实现以信息化推动文博事业的全面发展。至于藏品分类、定名、计件等还存有分歧的内容,

尚需全国文博界共同研究,编制出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标准,避免“因馆而异、因物而异”,并逐步形成标准化体系。

当然,要制定一套能涵盖所有博物馆藏品的定名标准,把全国各个博物馆的藏品定名统一起来,无疑是非常困难的。即便有这样一套标准,要对我国数以千万计的藏品加以整理并规范定名,也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工程。此外,要建立全国统一的藏品数据库,藏品的分类就必须科学、实用、简明、清晰,能涵盖全国所有博物馆的藏品,但要建立起全国统一的藏品分类标准,同样是一项耗时耗资的庞大工程,各地博物馆、纪念馆对此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

## 2. 藏品管理软件存在的不足。

就国家文物局文物信息咨询中心为我们提供的“博物馆藏品综合管理信息系统”来分析,其功能非常俱全,但是功能模块的划分有点紊乱,在功能上还缺少人性化的设计,比如在“藏品基本信息”这个模块,用户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查询,在查询结果这个界面的底下有共检索到多少条数据、用户已经选择了多少条数据的内容,但就没考虑到要显示出根据查询结果计算出实际数量的总和,这个功能对管理人员来讲非常重要,如图3所示。

界面设计不够人性化,界面不够友好,该管理系统使用时间长了会给用户有疲劳感,缺少活泼、宽松的色调和环境。该系统在功能设计方面给用户的感觉就是系统开发人员把全国所有的博物馆、纪念馆最常用到的功能都“捏”在了一起,但对这些功能没有经过认真的分析和加工,从而造成各模块间是没有衔接的,没有信息传递的,都是相对独立的,有时模块间还会出现功能冲突的现象等,给系统管理员为用户权限的设置带来了困难,如图4所示,在“藏品基本信息”这个模块有“选择导出”这个功能,这个功能既有文字信息导出又有图片信息导出,这两个信息的导出功能在权限设置里要么都关

闭，要么都打开，因为考虑到藏品图片的安全性，因此，如果系统管理员要打开导出文字信息即“界面选择数据”功能，关闭导出图片信息功能，这个权限就无法设置了。其实这里的文字信息导出即“界面选择数据”是将用户所看到的藏品的文字信息导出为Excel格式，这种格式的文档对用户很有用，这个功能设计得非常好，但是这里的“界面选择数据及相关信息”的导出实际上是对用户对所选记录的文字信息和图片信息的数据库备份，这个功能应该放在系统管理这个模块里，这样，模块的功能划分就比较合理了。类似这种各模块的功能的统筹和划分以及各模块间的信息传递等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提高和完善。

### 3. 藏品信息化建设工程缺乏保障。

笔者总结有以下几个因素直接影响到藏品数字化建设的质量，第一、

在藏品信息化建设中最突出的就是各博物馆、纪念馆内特别缺少既有计算机知识又具有文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第二、在藏品信息化建设中必须要有领导的重视和大力支持；第三、必须要有足够的经费保证。

文博信息化建设是一项有始无终的信息系

统工程，以藏品数字化管理工作促进博物馆、纪念馆各项工作的开展。古老的文物即将步入数字化时代。近期目标实现藏品信息化管理初具规模，远期目标实现全国文博行业的各项指标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实现藏品信息的资源共享、互联互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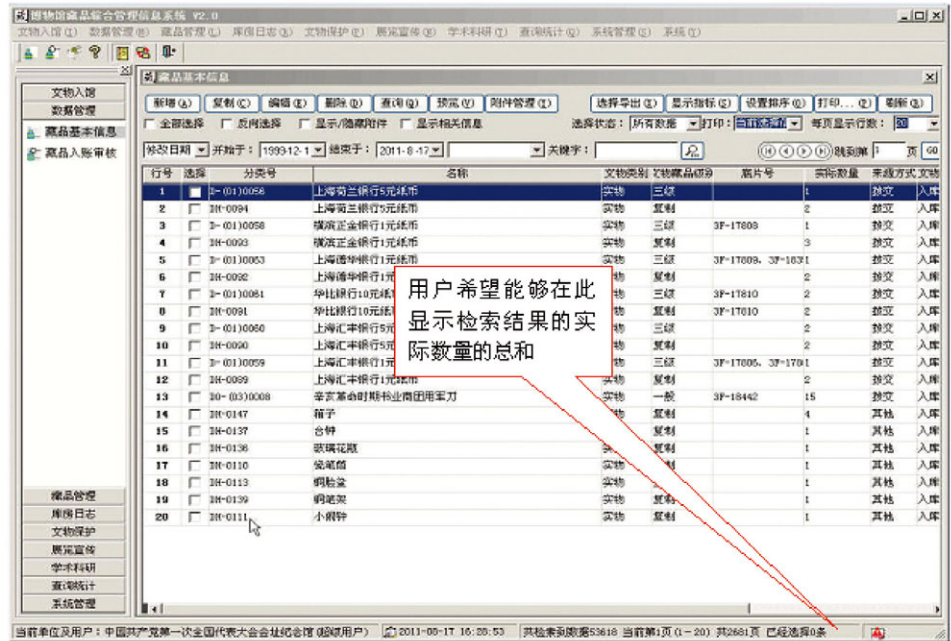


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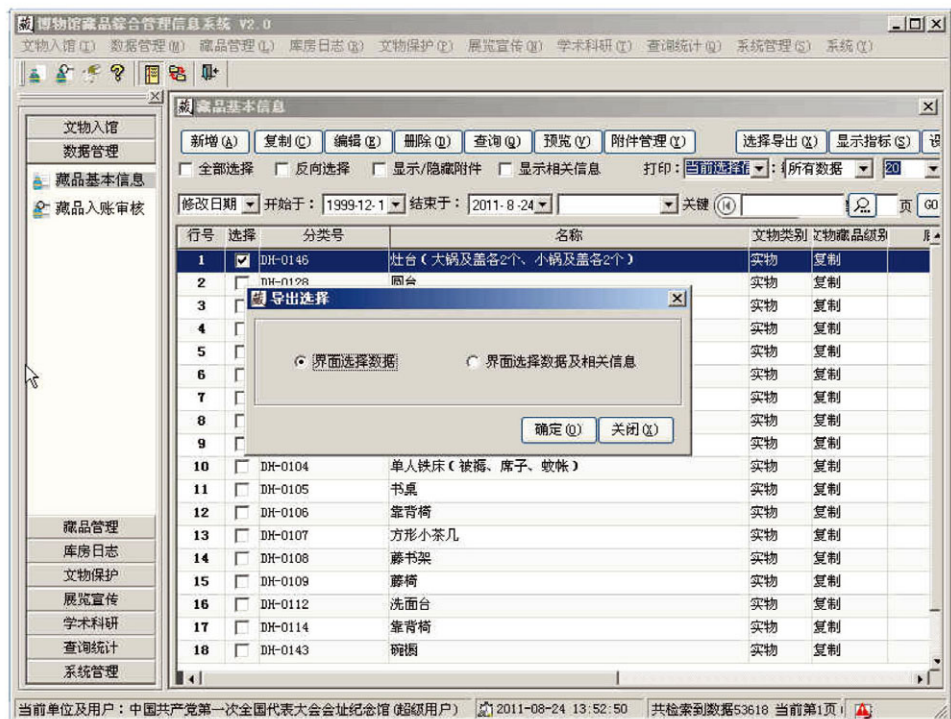


图4

# 红山与毛利玉器的比较

## ——跨越千年时空文化相似性的启示

### Revelations from the similarity between Hongshan jades and Maori jades

撰文 / 冯雷

新西兰群岛原来并无人居住，大约在公元1000—1200年，毛利人才定居于此。地理上，新西兰群岛分为南岛和北岛两大部分，其中南岛蕴含了丰富的玉石资源，毛利人定居后不久就开始利用这些玉料，玉器文化在毛利社会中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举足轻重的地位，所有毛利部落都将其视为珍宝。2011年上海博物馆举办的《毛利人的世界——新西兰奥塔哥博物馆珍藏文物》展，向国内学者和观众系统而全面地介绍了毛利人玉器文化，为环太平洋地区玉器文化圈的两个重要地区——中国和新西兰玉器文化的比较提供了有利条件。

令人惊叹的是，毛利玉器与中国北方红山系玉器在器类和形态上有许多相似之处：

吊坠：各式精美的吊坠是毛利人重要的装饰品，有针形、L形和鱼钩形等多种形态（图1）。从1784年西德尼·帕金森《毛利酋长像》中，这种吊坠是挂在耳垂下的耳坠（图2），也可当作颈部饰品。本次展出的吊坠长度大都在2厘米以内。在《中国出土玉器全集2》（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卷，内蒙古兴隆洼文化中出土的“玉匕形器”形态与毛利人吊坠相似，一个长6.5厘米（图3），另一个长14.9厘米，比毛利人吊坠长出许多，不适合挂在耳朵上，但可作为颈部吊坠。此类玉器在国内常被称为“玉匕形器”，在凌家滩文化中曾出土一件类似玉器是放在龟形玉版中，类似铃舍，是占卜用具。商周时期玉匕形器要比它厚许多，且多带有纹



图1 毛利人吊坠



图2 西德尼·帕金森《毛利酋长像》（1784年）



图3 兴隆洼文化玉器（内蒙古敖汉旗）

饰。此类玉器在国内以形态命名，其用途在中国古籍中也找不到对应名称，毛利人吊坠使用方法可作为此类玉器使用方式的借鉴。

**玉人颈饰：**玉人颈饰是毛利玉器文化的标志性器物，意思为“悬挂的人”，大头、大圆眼，眼圈内常镶嵌鲍贝，大嘴露齿，弯颈，双手、双脚张开，四肢饱满，神情调皮可爱（图4）。头部有孔，是男、女都可佩戴的珍贵装饰物，代代相传。在毛利酋长的画像中，玉人颈饰以绳索悬挂，绳索以骨栓扣住。玉人像可能代表了毛利人部落、氏族或家族的祖先。在毛利社会中存在一种先祖屋，是毛利人举行重大活动、进行重大决策的议事厅，由许多木雕柱子构成，正面山墙上的人像表现的是祖先的头部（图5），左右两边的板条是祖先张开的手臂，门窗分别代表了嘴和眼睛。走进议事厅就如同走进了祖先的身体。有时候议事厅内还有一个雕花立柱，它的基部雕刻祖先的雕像。这根柱子支撑着主梁，同时还象征祖先支撑整个家族或部落，可见毛利社会中有极强的祖先崇拜。在红山文化

牛河梁遗址中也出土了一件圆雕玉人，立姿，双臂紧绷，曲肘伏于胸前，双腿并拢，眯眼，神情

迷人，颈部弯曲的姿势与毛利玉人像相同，头后的牛鼻双钮表明其也可佩戴于胸前（图6）。国内学者认为此类玉人可能是巫师施法时的形象，毛利玉人像告诉我们此类玉人像在其它文化中也可能被当作祖先崇拜的物化形态。

在某些艺术品构图上，红山文化与毛利文化也有相似之处。如船形羽毛匣两端雕刻出人头像的构图（图7），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中也曾出现（图8）。此外，两地玉器在压边的加工工艺上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以上玉器文化的相似性当然不能以文化传播理论，简单解读为谁影响谁，在毛利文化的形成时期还没有与中国文化直接接触的证据。况且作为波利尼西亚的一个分支，毛利人属于南岛语族，国际上大多数学者认为南岛语族最初发源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与东北地区史前文化更没有多大关系。以上文化相似性可以看作是两地区独立形成，相似性可能是一种偶然。但作为有丰富图像资料的文化，毛利玉器对我们研究中国史前文化玉器还是有借鉴意义。另外，在研究国内物质文化时也要考虑到不同地区独立创造相似文化现象的可能性，这也是毛利与红山玉器两个跨越千年文化相似性给我们的启示。■



图4 毛利人玉颈饰



图5 毛利人议事厅木雕边柱



图6 红山文化玉人  
(辽宁牛河梁遗址)



图7 毛利人船形羽毛匣



图8 红山文化双人首三环玉器  
(辽宁牛河梁遗址)

# 从大英博物馆的筹款经验看 我国博物馆的筹款

## Found-raising by Chinese museums as compared to that of the British Museum

撰文 / 侯珂

大英博物馆创建于 1753 年，是由当时的一位英国医生 Hans Sloane 将自己的所有收藏（大约 8 万件）以 2 万英镑的代价卖给国会，并根据当时的议会法案设立的。开馆之初，大英博物馆的最主要藏品是书籍和手稿，因为那是知识的源泉。此外，来自世界各地的动植物标本也是馆藏中重要的部分。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和大英图书馆都是后来从大英博物馆分出去的。大英博物馆 1759 年 1 月 15 日首次对公众免费开放，对象是所谓“好学与好奇之士”，就是被定位为是一个向公众开放的地方，通过其藏品来满足并激发每一个人对世界人类文化的好奇心。

大英博物馆目前的藏品共有 700 多万件，2009 年的观众总量共有 600 万人，1500 万人登陆博物馆网站。藏品丰富多样，汇聚了世界各地区、各时代、各文化的遗存精华。经过 250 多年的发展，时至今日，大英博物馆发展了系统的博物馆理念和宗旨，那就是：博物馆是世界的，要为世界服务，为全世界的每一个人服务，把丰富的藏品尽可能地向公众展示，立足于国际学术中心的地位，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传播知识、教育公众。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包括馆内展览、馆藏出借、举办充满活力的讨论和研讨会、以及大量出版文章和书籍。

### 一、大英博物馆的筹款经验

大英博物馆的筹款渠道主要分为三类：一是从

大的公司、社会团体筹款；二是接受个人捐助；三是从各种信托基金会获得筹款。由于我国目前博物馆界对于从各种信托基金会处筹款还不是很成熟，因此以下主要介绍前两类，即从公司、法人团体和个人处的筹款，博物馆的回报条件，以资借鉴。

### （一）“全球合作伙伴”项目——向公司、团体筹款

面对社会的发展，公众对博物馆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顺应全球化的潮流，大英博物馆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全球文化机构，不再仅仅是一个收藏保管文物、艺术品的地方，更加注重的是让每一个走入博物馆的人能够满足其求知欲和好奇心。大英博物馆通过在英国和境外举办各种展览和文化交流活动，使走入博物馆的人与博物馆有更多的互动，能在博物馆休闲娱乐。博物馆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广大公众，就要想尽一切办法举办好的展览，举办各种专题展览，在展览中运用各种多媒体和科技手段，以最大限度将展品蕴含的信息呈现出来；博物馆不仅是孩子们寓教于乐的地方，还可以为社会团体、公司举办各种活动，将博物馆的商业价值挖掘并释放出来，对于博物馆和公司双方而言往往是双赢。

“全球合作伙伴”项目的开展为大英博物馆的学术研究、文物科技保护、社会教育与宣传及展览策划提供重要的资金支持。大英博物馆在以上各方面工作中需要资金时，会向社会的公司、法人团体筹款，

对于向大英博物馆捐助的公司、团体，博物馆视其为全球合作伙伴。秉承全球合作理念，大英博物馆成为世界各国公司的卓越合作伙伴，这些公司通过与大英博物馆的合作，获得的是共享人类优秀文化遗产资源的机会。向大英博物馆捐助的公司、团体成为博物馆的公司会员，可以得到很多博物馆的回报，博物馆发展与这些公司会员保持密切的关系，遵循长期合作的理念，确保公司会员们的合作目标能够实现，从博物馆获得的回报条件（利益）最大化。

大英博物馆目前的全球合作伙伴包括了汇丰控股有限公司（HSBC Holding plc）、三星集团（Samsung Electronics）、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BP 能源等在内的共 14 个全球知名企业。2010 年 4 月 22 日至 7 月 25 日举办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展（Fra Anjelico to Leonardo: Italian Renaissance Drawing）就是由 BP 能源赞助的一个重要展览。该展览首次将文艺复兴时期 100 幅杰出的绘画作品展出，展品来自于大英博物馆馆藏和意大利佛罗伦萨 Uffizi 博物馆，包括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等人的重要作品。

全球合作伙伴的会员费分为两种：每年捐助 35000 英镑或三年捐助 94500 英镑，大英博物馆给出的回报条件主要有以下几类：

#### 1. 在博物馆举办晚宴等活动，包括：

(1) 每年在博物馆的著名展厅或大英博物馆的大庭院（Great Court）举办 2 次晚宴和 1 次酒会，每一次晚宴或酒会还可通过博物馆的专业人员陪同参观主要展览。这个回报条件只给予公司会员，即全球合作伙伴。对于公司会员而言，这一回报条件是最有吸引力的，也是众多回报条件中最重要、最关键的，公司看重的是大英博物馆的全球文化机构的地位，能在这里举办活动无疑是一种荣誉。对于大英博物馆而言，与知名企业合作在博物馆举办文化活动是博物馆创收的一个好的渠道，同时也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这些活动的举办，将博物馆与社会的距离拉近，并与社会发展同步，使社会各界对博物馆的功能有了新的认识。

(2) 公司会员可以邀请最多 100 名客人每年在大庭院餐厅享用一次早餐，早餐结束后，博物馆正

式向观众开放前，会员和被邀请的客人们在游客尚未入馆前可以参观展览。大英博物馆每天的开放时间是上午 10 点至下午 5 点 30 分，大庭院餐厅的早餐时间一般是早 8 点至 9 点，用过早餐后，可以利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参观自己感兴趣的展览。

(3) 每年一次参观博物馆库房或科技保护部门。众所周知，博物馆的库房和文物科技保护部是不对公众开放的，大英博物馆向会员开放一部分库房区和文物保护部门，在参观这些区域时，还会有博物馆的专业人员陪同讲解并解答问题，一般每次允许 8 至 25 个人参观。公司会员们将这一回报条件称为“用钱买不到的机会”。大英博物馆的古埃及藏品库房，保存木乃伊的地方就曾经让公司会员们参观过。

(4) 由大英博物馆的策展人每年到公司会员的工作场所开展两次学术讲座活动，讨论的主题由公司会员自行选择。这一活动的开展，使公司员工受益颇多。

(5) 在大中庭的克罗尔教育中心（Clare Educaation Centre）举办会议、仪式能够享受 20% 的折扣优惠。克罗尔教育中心位于大中庭的地下处，会议设施完备，通往博物馆的展厅也非常方便。

#### 2. 公司会员被邀请参加博物馆举办的重要活动

(1) 展览开幕式酒会。全球合作伙伴的 CEO 将被邀请参加由博物馆馆长主持的重大展览的开幕式酒会。

(2) 全球合作伙伴酒会。全球合作伙伴可邀请 20 名客人参加博物馆为公司会员举办的酒会，并可以在没有观众的时候参观最近的主要展览。

(3) 参加博物馆年会。

(4) 参加博物馆在境外举办的国际展览的开幕式酒会。

#### 3. 员工可以享受到的回报

(1) 免费参观特展。博物馆内收费的特展，所有全球合作伙伴的员工都可以免费参观，除此之外，还可获得博物馆额外发放的 400 个名额的免费票，这一活动使得员工的家庭成员、朋友成为受益者。

(2) 购物折扣优惠。所有全球合作伙伴的员工在博物馆商店购买商品可以享受 10% 的折扣优惠。

(3) 就餐折扣优惠。所有全球合作伙伴的员工在博物馆大庭院餐厅和博物馆咖啡厅就餐可以享受10%的折扣优惠。

#### 4. 其他回报条件

(1) 为每一个全球合作伙伴提供10册大英博物馆开展某一合作项目的报告(the British Museum Review)。

(2) 为每一个全球合作伙伴提供2册大英博物馆杂志(British Museum magazine)。

(3) 为每一个全球合作伙伴提供50册最新展览信息(What's On Guide)。

5. 其它回报 :大英博物馆的网站每年有700万人登陆,在网站中对于全球合作伙伴都有提及,例如某一展览的赞助商、某一活动的赞助者观众都可以了解到;除此之外,大英博物馆开展每一个合作项目都会编写详细的活动报告,赞助商对于赞助的项目、赞助费的使用情况等非常关心,通过报告可以了解到资助款项的使用情况,也是对大英博物馆赞助费使用状况的监督。

#### (二) 向个人筹款

大英博物馆的个人资助者不仅是英国公民,包括来自世界各地对博物馆有浓厚兴趣的人,其中以美国资助者居多,美国人是通过大英博物馆的美国之友捐助的,他们向博物馆捐助后,按照美国法律的规定能享受到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个人会员资助大英博物馆开展藏品保护、藏品征集、学术研究、公众教育以及大英博物馆举办的国际文化交流项目。笔者参加的国际培训项目就是由个人资助项目承担一部分费用的。截止2010年,该培训项目已开展了五年,每年来自中国、印度、埃及、苏丹、伊拉克、肯尼亚、尼日利亚、巴勒斯坦等国家博物馆策展人、考古研究人员、博物馆从业人员共20多人齐聚大英博物馆接受为期40天的培训,大家利用这40天的时间接触到大英博物馆的研究、保管、文物保护、展览等部门,一同学习、分享经验,并且互相建立起关系,以便于日后的沟通和合作。

大英博物馆为个人资助建立个人会员制,通过一系列的回报条件,个人会员得以对文物藏品有更深层

次的认识和了解,并有机会参加在博物馆举办的活动。个人会员每年向大英博物馆捐助2000英镑,可以享受到的回报条件是:

1. 被邀请参加每年春季在大庭院或主要展厅举办的博物馆馆长晚宴,这一活动对个人会员很有吸引力。晚宴由博物馆馆长主持,馆长在晚宴中会向各位参加的会员介绍博物馆将要开展的活动、举办的展览,并且可以在博物馆专业人员的陪同下参观当前的主要展览。

2. 在某一个特展正式向观众开放前,由博物馆专业人员陪同先行参观。

3. 参加每年一度为个人会员举办的现场演讲,由博物馆的馆长、策展人或被邀请的特殊客人向大家演讲,这一活动往往是在博物馆闭馆后选取一个基本陈列的展厅开展,个人会员可以邀请6位客人参加。

4. 每周四早9点至10点博物馆正式开馆前,个人会员被邀请参观主要展览。

5. 免费参观所有收费的特展。

6. 定期收到博物馆印刷物(The British Museum Magazine, What's On, Quarterly Patrons' Calendar),被告知博物馆将要开展哪些活动、举办的展览等内容。

7. 在博物馆商店购物、咖啡厅和餐厅用餐可以享受10%的折扣优惠。

通过以上介绍可以看出来,大英博物馆本着其丰富的馆藏、专业的人员、古老与现代相结合的建筑,通过与知名企业、热爱并关注博物馆的人群的合作,将自己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文化传播机构,通过各种展览的举办、各项活动的开展,逐步与世界各地的政府与文化机构建立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将自己的博物馆理念与影响传播至世界各地,从而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人类文化的遗存精华,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

#### 二、我国博物馆筹款的启示——以国家博物馆为例

##### (一) 关于我国博物馆筹款的思考

近来,从故宫的“建福宫”到避暑山庄的“皇家

会馆”，博物馆经营活动受到了媒体和群众的特别关注。客观地说，对博物馆业务的关注，特别是对博物馆公益文化组织性质的质疑，反映了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反映了人们对博物馆事务的兴趣，也反映了人们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博物馆工作者面对这些质疑的同时，更需要思考的是当代博物馆的社会责任，国际博协对博物馆宗旨定义是：博物馆“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当代博物馆为管理文化遗产和传播知识的同时，也需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服务公众的广度和深度上有所创新。

近年来，由于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博物馆社会需求发生多样化扩展，博物馆努力为公众提供多种类、多层次的学习服务和休闲服务。当今的博物馆已不再只是单纯的文物、标本、艺术品的收藏、研究和教育单位，而成为一个争取更广泛社会资源、提供多元化公益性文化服务的社会组织。

而博物馆举办的各类商业活动，国内外博物馆无不有过先例。数年前，美国古根海姆美术馆举办了德国宝马公司的摩托车展、意大利时装设计师乔治·阿玛尼服装回顾展，阿玛尼给博物馆捐赠了1500万美元。批评者对其“租借”场地的作法颇为不屑。支持者则认为只要将博物馆的学术性展览与这些商业活动区分开就行，好比报纸的新闻版与广告的区别。卢浮宫的商业化改革思路是遵循以艺术展览为依托、开拓商业经营的思路。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新建的“玻璃金字塔”下明亮的地下大厅和“卡鲁塞尔”大厅成为接待游客的主要场所。游客进入后仿佛到了一个豪华的商务中心，旅游纪念品商店、书店、时装店、首饰店、咖啡店、酒吧、旅行社、银行等鳞次栉比。

长期以来，我国国立博物馆长期习惯于主要靠财政拨款。政府拨款一般占到总运营费用的三分之二，近年来，欧美国家博物馆自身“创收”所占的比例却在增加，以美国博物馆为例，美国博物馆的资金来源与收入主要包括三个组成部分：政府赞助、私人捐赠和博物馆自身的创收。根据美国博物馆协会的数据调查，美国博物馆收入的33%来自私人赞助，28%来自政府赞助，博物馆自身创收占28%，

博物馆基金投资收益占11%。

向社会募款是各国博物馆在发展中面临的硬任务，笔者认为，我国的博物馆在运营管理中，在筹集资金的过程中，应当在坚定捍卫当代博物馆“非营利性”和公益性社会文化组织的名誉和尊严的前提下，摸索创新筹资的新路径，同时也需要政府部门在政策上给予必要的支持；博物馆工作者也亟需集思广益，在充分认识并理解博物馆是公共文化机构，公众有权利利用博物馆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设施，更有权利知道博物馆是否认真履行了公共责任，是否管理好公共资源，是否是一个负责的公共组织，在不偏离其为社会服务的文化公益性本质，不降低学术品味的基础上，为自己的发展拓展出合法合理的渠道。我国的博物馆目前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可以多多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借鉴大英博物馆的经验，将博物馆建筑、藏品、博物馆专家等独特的资源与筹款这一任务相联结，满足个人和商业团体的文化消费愿望。

## （二）对国家博物馆筹款工作的启示

中国国家博物馆经过三年多改扩建工程以后于2011年3月份向广大公众重新开放。相较于原来的历史博物和革命博物馆的展览内容，新国博已经重新定位：与世界接轨，成为综合性的国家博物馆，不仅展现中国古代文明，而且展示近现代文明和世界文明，在展览组成上力求多元，既展示中华古代文明，又要展示近现代文明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还要展示世界文明的成果。既有基本陈列、专题陈列，也有临时性展览；既有历史类展览，也有艺术类展览，既有本馆的藏品展览，也有对外合作的展览；既有侧重于学术的展览，也有配合时政的展览；既有反映传统的展览，也有反映当代艺术成就的展览。

作为国家的博物馆，新国博在重新开放以后彰显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和文化软实力。在功能上，新国博增加了为观众服务和举办国务活动的功能，内部还有专门的剧场和学术报告厅（兼做数码影院），世界博物馆的传统功能在这里得到了新的拓展和延伸，体现的是一种兼容并包的大馆气质，同时也为新国

博的筹款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具体而言,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式进行筹款:

#### 1. 社会赞助—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

在英国,素有社会向博物馆等公益事业捐赠的传统,该传统与博物馆的诞生和发展密不可分,并被保留至今。我国的博物馆可以借鉴英国的经验,在博物馆内成立一个专门的部门负责与提供赞助的机构和个人联系,一方面,它为博物馆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另一方面,它向博物馆已有的赞助人和机构提供信息和服务,让他们积极参与到博物馆的工作中来。在赞助的种类上,可以设计定期赞助和一次性项目赞助。定期赞助采用会员制形式,按照赞助额度设置几个档次,相应给与赞助者不同的回报条件。有关会员对博物馆的事务有较多的参与机会,同时也享有一些优惠待遇,如优惠租用博物馆场地举办活动、得到博物馆邀请参加其举办的活动和展览等。一次性项目赞助往往可以是对举办某个临时展览的捐赠。通过与知名商业企业合作,利用博物馆展览场地这一独有的平台优势,展现企业和品牌文化,使广大公众深刻了解品牌背后的故事,不仅提升品牌声誉,也是一场独特的文化盛宴,对于博物馆、商业企业和公众来说是共赢的局面。

#### 2. 博物馆之友——众人拾柴火焰高

博物馆之友就好似星星之火,是博物馆的群众基础,也应当是博物馆经费来源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博物馆之友的经年发展可以壮大到超越本国国境,如前述大英博物馆就在美国设立了大英博物馆美国之友。博物馆之友往往聚集了真正热爱博物馆事业的人,他们能将博物馆的兴衰视为自己的事业,他们的活动十分活跃,博物馆在征集某一件文物时,他们能够捐助资金帮助博物馆实现自己的愿望,英国博物馆的经验告诉我们,每当博物馆急需资金时,博物馆之友们总是最先站出来帮忙的人。

#### 3. 举办各种展览——博物馆最好的宣传广告

大英博物馆每逢举办临时展览的时候,前来参观的人数就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展览的质量越高,则参观的人数越多,这些临时展览一般是收费的,所以博物馆的收入也就增多了。举办展览好比为博

物馆做广告,几乎所有好的博物馆每隔一段时间都要举办临时展览,往往能够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中国国家博物馆新馆开放后举办的LV设计展、宝格丽珠宝展也说明博物馆举办高质量的临时展览是深受广大公众喜爱的。同时,博物馆还应当积极推出根据自身藏品设计的境内外巡回展览,依托于本馆的丰富馆藏是设计制作出好展览的优越条件,在广泛传播悠久的中华文化的同时,也取得可观的经济收入。

#### 4. 依托于馆内资源积极开拓生财之道

博物馆的资源可以归纳为:物(文物藏品)、人(专家学者)和博物馆建筑。依托于丰富的藏品资源,博物馆可以设计制作出各种礼品、画册、生活用品等。尤其是博物馆收藏的大量文物和艺术品,可以为博物馆进行各种设计提供丰富的资源库,与专业机构开展合作,将馆藏资源与博物馆品牌进行授权,共同开发出独一无二的博物馆品牌的文化产品。将博物馆场地出租给个人或社会机构,让他们在博物馆内举办各种活动,包括年会、酒会、音乐会、宴会等是博物馆利用场地资源的有效方式;博物馆专家则可以为各种博物馆的出版物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编辑出版种类繁多的出版物,满足不同群体的需要,博物馆专家学者编写的专业的文物、考古书籍、每一个展览的精美图录、以及为少年儿童和普通非专业人士编写的通俗易懂的读物、制作的影视光盘是博物馆长期的收入来源。在电子商务大行其道的今天,博物馆还需积极探索网上购物、邮寄的渠道,为不能前来博物馆参观的人提供网络浏览服务,将博物馆的专有产品和各类出版物上传至博物馆网站,并为其提供邮购服务。■

#### 参考文献

- 范中汇:《英国文化管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宋向光:博物馆如何直面公众质疑,中国文物报 2007年9月7日(5)。  
林明杰:世博园新博物馆如何‘财源滚滚’,新民晚报 2011年8月23日(A20)。  
马爱民:“博物馆产业化发展趋势研究”,社科纵横 2011年第3期。

# 浅谈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的 社会教育课程

## The social education courses held by the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撰文 / 王绚

中国山河壮丽，文化灿烂，文化和自然遗产极其丰富，发展博物馆事业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但是，博物馆文化必须形成一种大众普遍认同，并具有吸引力的整体力量，才能够成为推动历史进程的积极因素。没有吸引力的文化只可能成为一种传统，却不能够成为一种力量。要使博物馆文化成为推动历史进程的整体力量，就必须让博物馆文化具有更加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这就对博物馆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与期待，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今天，博物馆的功能与职能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范畴，博物馆的形式与空间也突破了以往的馆舍建筑和固定的空间模式。博物馆文化的研究和实践领域，随着时代而横向拓展、纵向深化，原有的理念一旦落后于实践，新的理念就会诞生。

不久前国际博物馆协会第22届大会在中国成功举行，既是国际博物馆界对中国博物馆事业的信任与支持，也是中国博物馆界对自己综合实力的凝聚与展现，使我们更加自信，敢于、勇于、善于发出中国强有力的声音。<sup>(1)</sup>在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大环境下，我们更有必要考察和借鉴国外博物馆的有关博物

馆的实践经验，从中得到启示，吸收借鉴“他山之石”，以推动我国博物馆事业的持续发展。

韩国和日本作为亚洲地区博物馆事业较为发达的国家，无论在理论博物馆学研究还是在博物馆运营、管理等应用博物馆学领域，基本上代表了亚洲博物馆的最高水平。在国际博物馆界，人们也逐渐形成了一种观点：日、韩、中、印四国共同构成了亚洲博物馆发展的中心。所以，对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的个案分析，不仅有益于认识当代亚洲博物馆社会教育的基本现状，而且对于从整体上探索具有亚洲特点的博物馆教育理论和实践取向有所帮助，同时又可以为中国博物馆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 一、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的社会 教育课程的形式及典型做法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已有60多年的历史。占地面积为4.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3.4万多平方米，其前身是朝鲜总督府博物馆，1954年6月迁移到韩国最早的西洋式建筑——石造殿内，1972年在朝鲜时代皇宫——景福宫新建馆舍，命名为国立中央博物馆。2005年迁至现在的首尔市

(1) 单霁翔《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关于广义博物馆的思考》，国际博物馆，2010年第3期。

汉江江畔龙山区。

馆内除常设展览<sup>(2)</sup>、企划展览、专题展览<sup>(3)</sup>和学术活动外，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还设有“博物馆特别讲座”来开展教育普及工作，每年招收学员，为他们讲授考古学、工艺、民俗、绘画、佛教艺术、科学保护等方面的知识，并且定期举办学术讲座和发表调查报告。该馆的博物馆之友还每月进行一次史迹调查活动。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针对不同的教育课程参与者，运用多元化的阐释及解说方法，构建出多样的社教课程，为观众提供了相应的体验场所和学习空间。

### 1. 知识共享性课程

知识共享性课程是通过韩国人文学各类专家学者的讲义对与博物馆相关联的历史、文化和艺术等各项进行的知识共享。

以2011年4月为例，该馆开设了以成人为主，包含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成人和残疾人为对象的知识共享型课程。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的知识共享性讲座“银河博物馆学校”和“博物馆文化学院”讲座于2011年4月开设与2010年开设的反响强烈的“银河文化学校”讲座不同，是在“银河文化学校”讲座的基础上进行的细化，分别设立了以60岁以上老人为对象的“银河博物馆学校”讲座和60岁以下成年人为对象的“博物馆文化学院”讲座。

两个讲座均以“今年的特展之旅”为主题，针对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2011年度进行的特展，包括主题展、特别展、规划展等为中心展开。“银河博物馆学校”讲座是4月13日至11月30日每周的周三14 00-17 00进行，“博物馆文化学院”讲座是4月14日至12月1日每周的周四14 00-17 00进行。两讲座均采用了会员定员管理制，每个讲座定员200名会员。自4月6日

开始就可以从网站上申请报名参加（参见表1）。

除此之外，2012年，该馆还增设了以下知识共享型课程：

“博物馆之主妇学院”课程，以三四十岁的主妇为对象，通过对博物馆的常设展览的介绍来正确理解韩国历史和韩国的文化遗产。

“创造型经营指导者CEO高端课程”，以CEO为对象，通过对东西方绘画的解读来理解东西方的历史和艺术，并提升文化欣赏涵养。

“K-Arts研究院深化课程”，以作家等为对象，通过对考古学、美术学的理解来提高资讯制作者的文化欣赏涵养。

“公务员博物馆文化研修”课程，以公务员为对象，通过对该馆今年的特别展览的介绍来提升公务员的文化欣赏涵养。

“博物馆讲解专业培训”课程，以博物馆志愿者为对象，从强化分析展览的角度对常设展览进行深入研究。

“观光翻译讲解员博物馆研修”课程，以观光翻译讲解员为对象，通过博物馆常设展览对观光翻译讲解要领的强化课程。

### 2. 学习体验型课程

学习体验型课程是将参与者按群体别分开，以展品或者教科书上的文物为素材，通过形形色色的体验活动既简单又有趣的使观众了解韩国的历史和文化。以2011年4月为例，该馆开设了“青少年文化财体验学校”课程和“五感感知的博物馆文化财”两大体验型课程。文化财即文化遗产<sup>(4)</sup>。

#### (1)“青少年文化财体验学校”课程

该课程以小学、初中、高中的学生为对象，通过各种体验活动向儿童和青少年介绍了韩国文化财，使他们了解祖先的智慧和聪颖，正确理解

(2) 陈列室面积4600平方米，展出韩国历史文化遗产。基本陈列分成史前时代、高句丽·百济·三国时代、统一新罗时代艺术，高丽·李朝陶瓷器，李朝绘画、佛像，高丽金属工艺以及朴乘来、李东垣捐献文物等部分。藏品约10万件。

(3) 每年举办1~2次，展出馆藏文物或向全国各地借用的文物。

(4) 上世纪60年代，随着韩国现代化进程加快，西方文化来势迅猛，严重冲击了韩国的民间文化。1960年，在一大批民俗文化学者的倡导和参与下，韩国《文化财保护法》于1962年1月出台。经过40多年的努力，韩国的传统民间文化得到全面保护、振兴和传承。

表 1 :

编号	银河 (周三)	博物馆 (周四)	讲座主题
1	2011.4.13	2011.4.14	朝鲜时代墓地及墓地名
2	2011.4.20	2011.4.21	韩国的青瓷 - 以扶安柳川里瓷器为中心
3	2011.4.27	2011.4.28	中国的青瓷 - 以龙泉瓷器为中心
4	2011.5.4	2011.5.4	大东舆地图 <sup>(5)</sup> 和韩国地图的传统
5	2011.5.11	2011.5.12	传统国乐的世界
6	2011.5.18	2011.5.19	巴洛克洛可可时期的宫殿艺术 (1)
7	2011.5.25	2011.5.26	巴洛克洛可可时期的宫殿艺术 (2)
8	2011.6.1	2011.6.2	巴洛克洛可可时期的宫殿艺术 (3)
9	2011.6.8	2011.6.9	巴洛克洛可可时期的宫殿艺术 (4)
10	2011.6.15	2011.6.16	巴洛克洛可可时期的宫殿艺术 (5)
11	2011.6.22	2011.6.23	巴洛克洛可可时期的宫殿艺术 (6)
12	2011.6.29	2011.6.30	巴洛克洛可可时期的宫殿艺术 (7)
13	2011.7.13	2011.7.14	巴洛克洛可可时期的宫殿艺术 (8)
14	2011.7.20	2011.7.21	巴洛克洛可可时期的宫殿艺术 (9)
15	2011.8.17	2011.8.18	外奎章阁仪轨 <sup>(6)</sup> 的价值和归还的意义
16	2011.8.24	2011.8.25	外奎章阁仪轨和朝鲜时代记录文化的传统
17	2011.8.31	2011.9.1	外奎章阁仪轨的艺术史方面的价值
18	2011.9.7	2011.9.8	印度佛教美术 (1)
19	2011.9.14	2011.9.15	印度佛教美术 (2)
20	2011.9.21	2011.9.22	中国的吉祥
21	2011.9.28	2011.9.29	朝鲜时代肖像画的潮流
22	2011.10.5	2011.10.6	现实主义和传神写照的传统
23	2011.10.12	2011.10.13	肖像画制作的新变化
24	2011.10.19	2011.10.20	御照的制作和供奉
25	2011.10.26	2011.10.27	自画像和丽人肖像
26	2011.11.2	2011.11.3	由文字来解读古人的生活 (1)
27	2011.11.9	2011.11.10	由文字来解读古人的生活 (2)
28	2011.11.16	2011.11.17	由文字来解读古人的生活 (3)
29	2011.11.23	2011.11.24	由文字来解读古人的生活 (4)
30	2011.11.30	2011.12.1	乐浪的古墓文化 <sup>(7)</sup>

(5) 《大东舆地图》为朝鲜地理学家金正浩绘制于 1861 年。此图不但证明现在的延边地区是中国的，还证明长白山天池在勘界中也在我国境内。

(6) 外奎章阁是奎章阁的分阁。奎章阁相当于朝鲜时代的王宫图书馆。1776 年正祖即位后于王宫开设了奎章阁，在奎章阁里收藏了历代国王的亲笔字画、手谕和遗教等。1781 年，朝廷又在江华设立了江华史库，称之为“江都外阁”，也就是外奎章阁。江华地处险要，高丽时期遭受蒙古侵略，朝廷就曾迁移此处避难。在江华设立外奎章阁是为了更安全的保管重要文件，因此收藏了需要特别管理的重要书籍以及王朝的家谱、字画、玉玺和琴谱等。在 1866 年发生“丙寅洋扰”之前，外奎章阁的图书共有 1042 种 6130 册。所谓“丙寅洋扰”是指朝鲜迫害天主教，杀害了法国神父，法国派遣军舰攻打朝鲜的事件。经过 40 多天的战斗，法军撤退。法军攻打朝鲜时，发现了外奎章阁图书，并对精巧的纸张和高超的装订技术感到惊奇。法军撤退时，带走了 345 册图书，并放火烧毁外奎章阁，珍贵的图书全被焚毁。现在所谓“外奎章阁图书”是指当时法国掠夺的 345 册书籍。外奎章阁图书是“御览”的“仪轨”纪录，所谓“御览”是指专为国王看的图书，而“仪轨”是指“仪式”和“轨范”，是用文字和图片记录朝鲜王室主要活动的记录性文化财产，可见外奎章阁图书的重要。“仪轨”可分为王宫使用的和官厅使用的，“御览仪轨”的价值最高。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于 2011 年 7 月 19 日起举行特别展，将时隔 145 年从法国回归的外奎章阁仪轨向大众开放。展示分 6 个领域展示了 71 册回归的仪轨，其中包括国家统治纪录和王室婚礼葬礼等。展示品中，在纪录王室婚礼的仪轨中首次有君王骑马登场的《英祖贞纯王后嘉礼都监仪轨》和注有韩文解释的《保社录勋都监仪轨》的史料价值相当高。

(7) 乐浪郡(公元前 108 年~公元 313 年)是西汉武帝于公元前 108 年在朝鲜半岛设置的汉四郡之一。治所在朝鲜县(故卫氏朝鲜都城王险城，今平壤大同江南岸)，管辖朝鲜半岛北部，对朝鲜、日本诸部落有很大的影响力。东汉、西晋时辖境有所变化。西晋八王之乱后，中原大乱，高句丽开始南下压迫乐浪郡。公元 313 年，被高句丽吞并。“乐浪文化”：汉朝在朝鲜半岛北部地区进行郡县统治，客观上大大促进了汉与朝鲜半岛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助于汉朝先进文化在朝鲜半岛汉郡县地区的传播。当时不仅有汉人官吏到朝鲜四郡去任职，更有很多富商大贾与农民前往经商、垦荒，朝鲜四郡已是一派汉文化景象。这一点从考古发掘也可证明。近年来，在汉四郡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汉朝的官印和各种质地不同、形状各异的器皿，考古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作“乐浪文化”，其实也就是汉文化。“乐浪汉墓”：在“乐浪文化”的考古发现中，最具代表性的还是地处今朝鲜平壤市乐浪区土城南面，总数达 2000 余座的乐浪墓葬群。“乐浪汉墓”主要分布在平壤市、平安南道、黄海北道和黄海南道，在平安北道和咸镜北道亦有零散发现。这些外形多为方形封土的坟丘墓，其墓葬结构主要有木椁墓和砖室墓两种，其具体造法、式样，乃至细微到砖上花纹，都与中国的中原汉墓没有差异。墓中随葬品非常丰富，为清一色的汉文化特色。在该遗迹中出土的漆器十分精美，称“乐浪漆器”。乐浪墓葬群可以被看作是朝鲜北部受汉文化强烈影响的一个具体见证。



在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聆听“博物馆文化学院”讲座的观众。  
来源：(photo:korea.net)

文化遗产。该课程不但把博物馆作为了学习文化的基地，更为孩子们提供了有趣而又不失亲切感的转换认知的机会。

参与者参观完史前、古代馆展厅后试着尝试自己制作铜镜和岩刻画；参观完中世馆、近代馆展厅后正确理解训民正音<sup>(8)</sup>，并试着尝试制作古书籍和写信。每周二开课，也通过网上报名参加。

## (2) 五感感知的博物馆文化财

这是专门为残障人士设置的通过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五感来体验博物馆文化财的一个课程，比如说通过触摸来感知文化财，直接通过身体来表现文化财，通过花纹来认知陶瓷等，内容丰富多彩，为残障人士提供了很好的近距离接触文物的机会，每周的周五进行，也是网上报名参加。今年，还新增设了以下体验型社教课程：

“少儿(青少年)文化财体验教室”，以小学、初、高中学生为对象，针对该馆常设展览让孩子们进行有关体验活动“我来表现的博物馆文化财”。

“成人文化财体验教室”，以成人为对象，针对该馆的常设、临展、特展来展开的相关体验活

动，使用韩国国画技法来制作屏风，使用传统瓷器制作技法来自己动手制作生活瓷器等。

“多元文化文化财体验教室”，以外国人和多元文化<sup>(9)</sup>家庭为对象，针对该馆国外特展和临展开展的世界各国文化财体验活动。

“文化财周末体验教室”，以家庭和儿童青少年等为对象，题为“与高丽·朝鲜时代的文物的对话”，分为四个主题：“制作装载着梦想和希望的瓷器”，“制作装载着梦想和希望的龙纹样的装饰物”，“制作装载着梦想和希望的高丽·朝鲜时代花纹图案的装饰物”，“试着绘出装载着梦想和希望的韩国国画”。

“文化财特殊体验教室”，以韩国特定纪念日相关机关工作者和家属为对象，开展与该馆常设、特展相关的体验活动。

## 二、国立中央博物馆的社会教育课程对我们青少年教育的启示

群众教育与服务一直是博物馆的主要社会职能之一。为广大观众，尤其是青少年提高思想品德、文化素养和陶冶情操是一切博物馆的共同任务。博物馆在提高青少年觉悟、激发青少年的兴趣、拓展青少年的视野和提高青少年道德品质素养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是独特且巨大的，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根据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教育课程中青少年儿童教育的经验以及我国的教育现状，我们可以从如下几方面借鉴学习：

第一、始终把激发青少年对博物馆的兴趣和好奇心摆在重要位置。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工作大多以培养青少年对博物馆的兴趣和好奇心为首要目的，因为兴趣和好奇心是促使青少年能动地学习历史事件和探究民族灿烂文明的

(8) 为1444年李氏朝鲜的第四代国王——世宗大王李命学者郑麟趾等创制。又称谚文，今多称韩文。原有28字，其中元音字母17个，子音字母11个。古时的训民正音有28个字母；而现代朝鲜语一共有24个字母，14个为子音（声母）字母和10个为母音（韵母）字母。朝鲜语的语音结构比欧语简单，每个朝鲜文字代表一个音节，每音节最多有四个音素，而每字的结构最多由五个字母来组成，拼成方块字的模样，以便于与汉字同时一起使用。

(9) 韩国曾经是单一民族国家，但随着该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受国际移民潮的影响，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众多的外籍人口，韩国日益走向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社会。



在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时隔145年回归祖国的外奎章阁仪轨》特别展上欣赏仪轨的观众。来源：(photo:korea.net)

驱动力，是创新人才首先要具备的素质。我国青少年学生属于读书型学生，书本知识非常的强硬，但是真正对探索知识感兴趣的学生还不是太多，所以有好奇心而主动去探究民族文化和革命传统的就更少了。韩国的实践表明，在培养青少年对博物馆兴趣以及增强民族自信心方面，博物馆的功效比学校教育远为突出。所以，这需要我们吧博物馆的教育活动本身首先做到有趣味性。

第二、培养团队精神。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许多工作都越来越有赖于小组成员的精诚协作，因此需要作为社会的一员，需要具备“团队精神”这一人文素质。而实际上，现在越来越多的工作都需要劳动者具备协作能力。目前我国的青少年学生中，独生子女很多，学校教育又忽视了对学生的这方面素质的培养，来博物馆的学生以与自己父母以家庭为单位来参加活动的居多，所以我国的博物馆教育也有必要专门组织开展一些需要青少年组成小组来完成的活动，来培养学生的团队工作素质。

第三、爱国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态度的培养。国内的学校爱国主义教育因强调传授知识，往往忽视了对青少年学生爱国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态度的培养。我国的应试教育使学生习惯于无批判地接受老师和教科书灌输的知识，这种教育给学生一种错觉，似乎将书本上的知识学到手就万事大吉了。青少年博物馆教育应弥补在这方面的漏缺，我们可以把小至一件小文物，与文物遗迹有关的小故事，大至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产生过程告诉学生，让学生明白，爱国主义是一个不断完

善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始终不会结束，还要继续不断地探索下去。

第四、要特别注意培养青少年的独立思考及动手能力。我国的青少年学生不但聪明，而且学习也很用功，但独立思考及动手的能力却略显逊色，这大概是与我国的应试教育制度有关系。而我们也应该注重动手体验型教育活动，使学生自我发现问题，自我思考，主动作出判断和行动，是培养青少年独立思考和动手能力的绝好方式。

总之，我国的博物馆，以丰富的文物资源为背景，以政府的支持为保障，以重要文化标志建筑为依托，在加强博物馆自身业务建设的同时，借鉴国内和国外博物馆的成功经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中国的博物馆也将会成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际著名博物馆。📖

#### 参考文献

##### 一、著作

- 李文儒：《全球化下的中国博物馆》，文物出版社，2002。  
 苏东海：《博物馆的沉思》，文物出版社，2006。  
 山东省博物馆学会：《山东省博物馆学会会刊》，1983。  
 蒋英炬、周昌富：《山东博物馆通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关世杰等译：《世界文化报告 - 文化的多样性、冲突性与多元共存(2000)》，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段勇：《美国博物馆的公共教育和公共服务》，中国博物馆，2004。  
 曹兵武、李文昌：《博物馆观察 - 博物馆展示宣传与社会服务工作调查研究》，学苑出版社，2005。  
 阎宏斌，郑智：《社会化视野下的博物馆教育》，文物出版社，2006。  
 严建强：《博物馆的理论与实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卢红月：《学校美术教育与博物馆教育合作的研究》，华南师范大学，2005。  
 吕建昌：《博物馆与当代社会若干问题的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郝国胜、黄琛：《博物馆社会服务功能研究》，知识出版社，2005。  
 王宏钧：《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杨丹丹、阎宏斌：《博物馆教育新视阈》，文物出版社，2009。  
 走进世界著名博物馆编委：《走进世界著名博物馆》，广东世界图书出版社，2009。

##### 二、期刊及年鉴

- 《中国文物报》，国家文物局主办。  
 《中国博物馆》，中国博物馆学会主办。  
 《国际博物馆》全球中文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  
 《上海文博》，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办。

##### 三、网络部分：

-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网站 <http://www.museum.go.kr/>  
 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 <http://www.nfm.go.kr/>  
 首尔大学博物馆 <http://museum.snu.ac.kr/>  
 韩国国立现代美术馆 <http://www.moca.go.kr/>

# 书苑猎真

##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some books

撰文 / 丁辑、吴伟

### 《金玉华年：陕西韩城出土周代芮国文物珍品》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上海博物馆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2年4月第一版

韩城市位于陕西省东部，地处渭河平原与陕北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梁带村隶属韩城市咎村镇，位于韩城市市区东北约7公里处的黄河西岸台地上，遗址紧邻黄河，与山西隔河相望。

2004年8月，韩城市文物旅游局在梁带村东北冲沟的断崖发现了古代遗存。2005年4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和韩城市文物旅游局联合组成了梁带村考古工作队，展开了全面的墓地调查勘探和科学发掘工作，至2009年底告一段落。经过几次大规模的勘探和发掘，共探明两周墓葬一千三百余座，车马坑六十四座，出土各类文物三万六千余件（组），其中金器四十八件、铁器两件、青铜器六千一百七十七件，玉石器一千三百余件，对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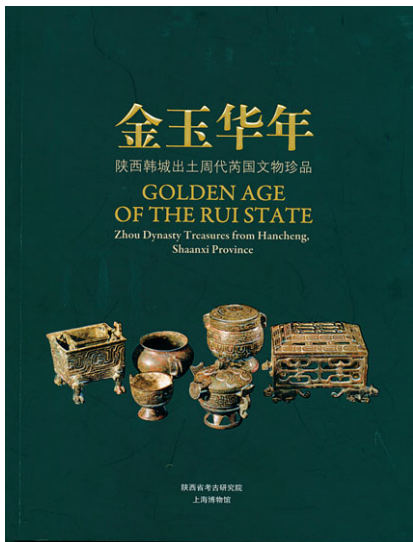
研究两周历史、礼乐制度、物质文化，乃至对周代芮国文化的认识等，均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梁带村墓葬遗址是两周之际芮国的大型墓地，沿用时间比较长，大约经历了西周中晚期之际、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前段、春秋早期后段，前后约二百年的时间。

墓葬遗址面积约为三十三万平方米，是一处范围大、等级高、保存好的两周时期贵族墓地，为近年来国内最重要的周代考古发现之一。2005年发掘当年即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芮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商末即已存在。芮国的青铜礼器在宋代已有出现，但是两周时期芮国的地望一直难以廓清。梁带村墓葬遗址的发现，从墓地规模、墓葬形制、随葬物品如成套青铜礼器和成组礼仪玉器的出土，说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芮国的政治中心就在韩城，使得“文献零星涉及的较虚幻古芮国历史，由此而被初步激活，并证实了周代这一重要封国的存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王炜林《序二》语）。

为庆祝上海博物馆成立60周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韩城市人民政府和上海博物馆共同主办了“金玉华年：陕西韩城出土周代芮国文物珍品”展览，本书即为同名展览的载体。卷首张天恩、孙秉君先生的《梁带村芮国墓地的基本认识》一文，介绍了梁带村遗存的发现、考古发掘的基本情况，包括“墓地的年代及性质”、“埋葬者身份的推论”、“墓地反映的芮国社交关系”和“芮国物质文化的观察”等内容。刘云辉先生的《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出土金玉器评述》一文，内容包括“梁带村M27出土的金器特征简述”、“梁带村芮国墓中出土的特色玉器简述”和“梁带村芮国墓出土金玉器的价值与启示”等内容。

图版部分按展览的顺序，以墓葬为单位铺开，让观者有完整的体验，让历史展示出原貌。“《金玉华年》”特展是梁带村文物发现以来面向社会最



大规模的一次集中展示，其中有许多展品还是首次与公众见面”。143件(组)展品，不仅反映了芮国青铜礼器组合、金玉器配饰的规制；而且也反映了芮国的墓葬规制、丧葬习俗等社会生活。既是芮国多姿多彩的政治、宗教、礼仪、社会生活、文化艺术的真实写照，同时为进一步揭开两周时期芮国的神秘面纱提供了直观生动的第一手资料。其中，芮国墓地300号墓、560号墓、33号墓的正式发掘报告尚未发表，承蒙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慨然应允，本图录以小图版加品名的形式予以刊布此三座墓葬的部分器物，正式资料当以发掘报告为准。

### 《东风西渐：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欧洲瓷器》

深圳博物馆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编 叶扬、张岚主编 郭学雷、顾音海副主编 文物出版社  
2010年4月第一版

马可·波罗等欧洲人来过中国后，将自己的亲身经历以游记的形式发表后，使得欧洲人对中国的认知大大拓展了。中国除了有美丽的风光和遍地的财富，而且还有令人难以忘怀的奇风异俗，构成了欧洲人心中梦幻中国的图像。

15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的海洋贸易时代。世纪之初的1405年，郑和开始七下西洋，振兴了唐宋以来的“海上丝绸之路”，揭开了人类大规模海洋活动的序幕；世纪之末的1498年，葡萄牙的达·伽马驾船绕过好望角，开辟了里斯本到印度的新航路，迎来了东西交往的新纪元。东西航线的开通，真切地展现了梦幻中国的诱惑，大批欧洲人搭乘商船来到中国，就是为了实现梦想。东西航线的开通，逐渐实现了欧洲人寻宝的愿望，中国商品大量地输入到欧洲，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17世纪始，荷兰取代葡萄牙、西班牙成为“海上马车夫”后，掌握了与远东贸易的垄断权，“海上丝绸之路”得到了极大扩展，输入了大量以时尚生活用品为主的中国瓷器、漆器、丝织品等工艺美术品，仅在1602-1682年间，荷兰就向欧洲输入了一千六百万件以上的中国瓷器，荷兰也随

之成了传播远东文化艺术最重要的窗口之一。如石似玉的中国瓷器输入欧洲后，立即引起了欧洲社会的爱慕珍视。不仅被充作室内陈设和装饰物，而且还是炫耀财富的一种手段。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欧洲人的社会生活，影响了欧洲人的审美意识，随

之掀起了学习、仿制、创作中国风格的产品。对中国瓷器心驰神往、对中国瓷器烧制工艺技术充满神秘感的欧洲陶工，竭尽所能地努力摹制，一心一意想烧制成类似中国瓷器的真正瓷器。

17世纪50年代的荷兰代尔夫特，首先烧成了仿制中国明代外销青花瓷器风格的釉陶产品，在代尔夫特釉陶的影响下，欧洲各地的窑场纷纷开始生产蓝白两色的中国风格釉陶制品。18世纪初，即1709年，欧洲第一件真正的硬质瓷器诞生于德国的萨克森公国首府德累斯顿，发明人是炼金师约翰·弗里德里·伯特格(Johann Friedrich Bottger, 1682—1719)。1910年，德累斯顿成立了皇家瓷厂，随后迁往迈森(Meissen)，从此迈森瓷器享誉全欧洲。法国是在18世纪60年代才由皇家塞夫勒瓷厂烧制成功真正的瓷器，并后来居上取代德国迈森瓷厂而成为18世纪欧洲的制瓷中心。18世纪是欧洲陶瓷工艺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

欧洲仿制中国瓷器，有一个从大量输入到爱慕倾倒，从纯粹模仿到中西结合，从分析试验到开发创造，充分发挥了创造力与想象力，不断融入欧洲对中国的理解，最终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欧洲制瓷工艺的过程，具有二次发明的特点。

“本书是为配合由深圳博物馆和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联袂推出的‘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欧洲瓷器展’而编撰”(本书《前言》)“此次展出的176件欧洲古瓷是加拿大收藏家拉斯洛·帕拉克维茨(Laszlo Parakovits)、孙建伟夫妇捐赠给上海市历



史博物馆的珍品。展览以欧洲瓷器发展史为主线，展示了欧洲瓷器从最初仿造中国瓷器到逐渐融合西方文化元素、革新生产技术、不断研发新产品的历史。展品包括 18、19 世纪德国迈森、德累斯顿和英国韦奇伍德、法国塞夫勒等欧洲主要瓷器产地出产的绚丽多彩的精美瓷器，如 19 世纪人物造型精细新瓷、德累斯顿小天使造型瓷碗、特色瓷鞋等，使观众充分领略具有浓厚异国情调的西方瓷器的艺术魅力”（深圳博物馆馆长叶扬致辞）。

### 《辽代玉器研究》

许晓东著 紫禁城出版社 2003 年第一版

公元 916 年，契丹族迭剌部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契丹族各部，联合汉族、渤海族、奚族、女真族、蒙古族等民族上层，仿照中原王朝体制，建立了以契丹族为核心的多民族联合政权，国号“契丹”，（曾改为“大辽”、再改为“辽”），耶律阿保机正式称帝，历史上称为辽太祖。建都于上京（即今内蒙古赤峰巴林左旗林东镇）。1125 年为金所灭，传九世，历时二百一十年，先后与五代中原各政权及北宋南北鼎立对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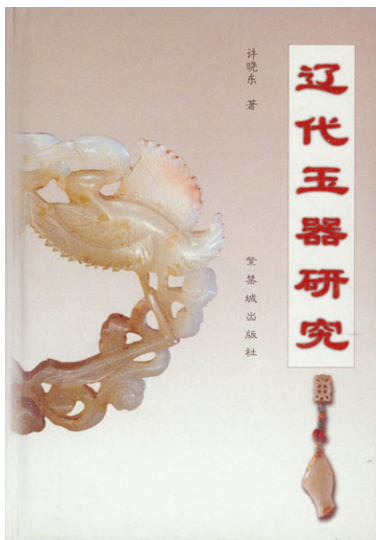
契丹族源于鲜卑族的宇文部，其族名北魏时已见诸史籍。契丹族由“草居野次，靡有定所”的游牧生活，到“始制部族，各有分地”的半游牧生活；再由依附中原的附属族国，到联合各族而建立辽王朝；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辽建国

后，全方位地效仿、学习中原汉制，无所不包。在政治体制上，辽王朝采取“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基本政策，实行双轨官制，设置北面官和南面官，采用蕃汉分治而又一体的体制。在思想文化上，辽王朝崇儒奉佛，推崇儒家学说，提倡弘

扬佛教，仿照中原王朝实行科举制，境内广建寺庙和佛塔，创制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在社会经济上，辽王朝始终保持着传统的畜牧渔猎业为主业，大力发展农耕地，并且手工商业并举，使社会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有效发展。在日常生活上，辽王朝的贵族统治者们以中原王朝统治者榜样，从游艺、饮食、车马仪仗、日常用具，乃至墓葬的规范、葬俗、葬具等方面。辽王朝的各民族人民之间，虽有相互影响和相互学习，但没有融合为一个单一的民族，也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文化，各自仍保持着民族的传统，各自仍保持着独特的文化。

20 世纪 30 年代前，辽代玉器基本未见；20 世纪 30 年代后，日本人盗掘了庆陵，始有辽代玉器的出现；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在发掘的辽代墓葬中陆续有辽代玉器的出土。1986 年 6 月发现并发掘的陈国公主与驸马的合葬墓，是目前所知保存最完整、出土玉器最多的契丹贵族墓葬，所出土的近 300 件玉器是研究辽代玉器极为重要的资料。辽代玉器大多出土于墓葬、佛塔、窖藏以及城址、遗址之中，墓主几乎都是契丹贵族，或有个别汉族高官墓葬。据考古发掘可知，辽代的契丹贵族大墓，主要集中在五京地区，尤其是上京和中京，即今辽河流域的赤峰、通辽、朝阳、阜新一带，因为契丹人有死后归葬故里的风俗，类似于汉族人叶落归根的风俗习惯。因此，所谓的辽代玉器，或所见的辽代玉器，即是指契丹贵族所崇尚、所拥有、所使用的玉器。

本文是作者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全文选取了历年出土自有明确纪年或年代相对确定的墓葬之中的 90 余件（组）玉器，从契丹社会的发展进程出发，参考辽代陶瓷器、金银器、纺织业等的生产，探讨了辽代玉器的制作与使用。通过对辽代玉器形制的分析，将辽代玉器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通过将辽代玉器与唐宋金玉器的比较，探讨了辽代玉器的特色，找出了辽代玉器与唐宋金玉器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以及相互之间的差别和影响。最后分析了辽代玉器的多元文化



因素的融合与契丹民族文化的特色，对辽代玉器的历史定位及研究前景进行了展望。卷末附录“出土辽代玉器一览表”，起自辽建国前，终于辽末金初，资料收集截止于2001年，可谓翔实且丰富。

### 《中国木版水印概说》

冯鹏生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

雕版印刷，始于何时，众说纷纭，有隋代说，有唐代说。隋代说以明代陆深为代表，在其所著《俨山外集 卷三》中有云：“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49）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此印书之始又在冯瀛王先矣。”但无实物为证。唐代说是因为有实物为证，有1899年斯坦因在敦煌所发现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首扉页的《树给孤独园》图，有1944年在四川成都唐墓中发现的《陀罗尼经咒》，均因刊有确切纪年而成为实证。以后在西安、安徽等地的墓葬中都有《陀罗尼经咒》随葬的发现，唐代因为佛教的兴盛和普及，为满足信徒的实际需要，大量印制佛经佛像，可见其普及性。也与后唐冯贽著《云仙散录》所载：“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的情况基本相符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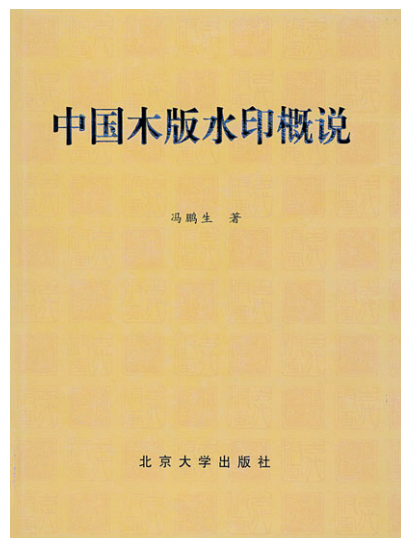
宋辽金元的近四百年间，雕版印刷得到快速发展。题材的变化表现在：从文字、图像到图文并茂，从佛经、佛像到民间世俗，内涵形式丰富多彩。技术水平的发展表现在：先后出现过活字、墨线填彩、漏彩、朱墨套印等技术，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为明代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既积累了经验也奠定了基础。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中国木刻图画，从唐到明，曾经有过很体面的历史”（见《木刻纪程·小引》）。

明代晚期，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商品竞争也日趋激烈；随着市民素质的不断提升，文化需求的扩大。印刷出版业，由于文人与文人画家的参与，扩大了题材的选择范围；随着雕版印刷术的不断创新，形成了风格各异的流派。版技术和拱花技术的完善和精炼，使之

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更多的需要，更广泛、更复杂的创作内容，迫使他们不能不继续地前进，不能不创出些更新的、更精致的、更好更美的作品来，是带有些竞争性的”（郑振铎：《中国古代版画史略》）。目前所见集版技术和拱花技术大成的作品，是天启六年（1626）吴发祥印制的《萝轩变古笈谱》，而胡正言于天启七年（1627）印制的《十竹斋书画谱》和于崇祯十七年（1644）刻印的《十竹斋笈谱》，则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本书立足于史料兼及雕版技艺，评述版画发展梗要的学术著作。书分三篇：一、“沿革篇：中国版画概说”，概述了隋唐以降至近现代一千三百多年来历代版画技艺的成就与发展，以翔实的资料阐述了中国版画发展史的研究，提出了雕版印刷始于隋、拱花技艺行于唐、版肇始自宋代的见解。还利用参加应县木塔辽代秘藏的整理，论述了辽代的雕版印刷技术，填补了辽代雕版印刷技术研究的空白。最末一章，

介绍了荣宝斋的简史、荣宝斋对木版水印技术的贡献和成就。二、“技艺篇：木版水印工艺流程”，作者首次就木版水印工艺流程，从勾描分版、雕刻版面、制色印刷、装裱画幅等技术方面，作了全面的总结。三、“图录篇：中国历代版画图谱”，从上万幅古代版画和五千多幅近现代木版水印作品中，精选三百多幅具有代表性的图谱，附图所示以文字说明。“此书的特点不同于一般的美术史，他在论述中国版画史的同时又深入地研究了中国古代版及拱花技艺。像这样将版画艺术与技法溶为一体的美术史书，过去还未曾见过”（王子野《序二》）。



# 《中国南方青铜器研究》 出版价值初探

## On the publishing value of the book Study of Southern China Bronzes

撰文 / 余岚

近年来，中国南方青铜文化已成为一个越来越受关注的研究课题，不断增多的考古资料表明，中国南方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具有产生文明的条件和基础，因此，探索中国南方的文明对研究中国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南方青铜器的发现，改变了我们过去对中国南方、长江流域乃至对整个商周文明图景的认识。但目前对这些青铜器还缺乏全面、系统的考察。同时，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差异也导致了对中国南方青铜器和青铜文化面貌的不同认识。

1989年的秋天，赣江沿岸的新干大洋洲发现商代大墓，很快轰动了整个考古学术界。其时，彭适凡先生主持了对大墓的发掘清理和研究，对大墓的诸多问题作出了深入的探索、详尽的讨论，这些成为了《中国南方青铜器研究》的主要内容。《中国南方青铜器研究》以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的发现与研究为基础，以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为背景，归纳和总结了中国南方青铜器的特点和由此反映出的长江流域青铜文化所具有的一些传统与特色，初步提出了长江流域青铜器之间和长江流域与中原青铜器之间的异同，以及中国南方青铜器与殷商文明的相互关系。

正如该书作者彭适凡先生在书中写到：随

着我国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在商王朝中心区以外的地区，特别是长江流域，不断有新的重要考古发现，这些发现不仅大大提高了我们对殷商文化的认识，而且给“中原中心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事实告诉我们，殷商文明史的研究，除需要继续深入纵向的对殷商文化本身研究外，当前更需要加强横向的对殷商王朝周边地区青铜文化的研究。《中国南方青铜研究》一书的出版，无疑能够帮助推动中国青铜器研究，推动中国南方青铜器研究向更深层次发展。

较长一个时期以来，海内外对中国青铜器的研究主要限于中原青铜器，而对于中原以外的周边地区的青铜器却甚少综合性的研究。而过去中国南方地区出土青铜器又比较少，且多零星分散出土，加之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即使是南方出土的器物，也往往被认为是中原器物的南流，因此过去对于中国南方青铜器的研究空白很多。随着南方地区大量考古新发现，特别是长江流域，不仅商周文化遗址不断发现，青铜器出土也日趋增多，不少学者开始着手对长江流域出土青铜器进行综合研究，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然而，正如李学勤先生在为《中国南方青铜器研究》一书所做序言中所说，在万里长江的中下游之间，有一块形势非常冲要的地方，在传世文献材料内却最缺乏

可资征引的记述，这便是号称“吴头楚尾”的江西赣江地区。这个地区夹处于吴越、荆楚之间，理应在历史上起重要的作用，然而直到春秋时期，史书间才只见个别地名，成为古史的空白点。至于西周之前，就更不用说起。然而，事情每每是双向的，这一地区的考古工作也正因此而更显得必要。彭适凡先生从考古入手，对南方青铜器和青铜文化的研究，正是填补了这一地区长期以来研究的空白。因此从这一层面来说，《中国南方青铜器研究》是一部填补中国南方青铜器研究空白的创新之作。

本书由上、中、下三编构成。上编从南方青铜器特色和与殷商文明的关系方面着手，全面展开了对南方青铜器研究的思考；中编以江西新干商代大墓发掘带动对南方青铜礼器、兵器和青铜器群的艺术研究；下编结合邻近南方其他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研究，把江西新干大洋洲放到广袤的南方地区这一空间范围内予以审视和研究。这是作者二十余年来有关中国南方出土古代青铜器，特别是江西新干大洋洲青铜器群研究的结集。全书三编的框架结构看似简单，但却匠心独运，以对中国南方青铜器研究的思考作为全书引领，以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作为基础，结合湖南、浙江、岭南地区青铜的研究，以“重述”作为整合南方青铜器研究前沿、知识、经验的方式，以“出土青铜器”作为研究的抓手。在多篇论文中，体现出商代后期当地青铜器不亚于殷墟的高度水准，显示出殷墟为代表的商王朝核心地区对当地文化的深刻影响，说明在青铜器的某些方面，例如农具，甚至超过了商王朝的核心地区，富有创新意义。这种创新模式把个案的实际审视与文物考古理论研究的内容密切结合在一起，加强了考古学界与文物学界的有机联动，同时也推动了学术著作出版的创新发展。

就文物考古类图书市场而言，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图书往往是具有长期的市场生命力的。彭适凡主持了江西新干大洋洲大墓的发掘清理和

研究，对大墓，乃至整个中国南方青铜器的诸多问题有深入的探索和详尽的讨论，这决定了《中国南方青铜器研究》一书代表了目前南方青铜器研究的较高水平，以及在具体实践操作中的丰富经验和学术见解，丰富和提升了书稿的内在品质和使用价值。书中“南方青铜器及其特色”、“青铜王国的青铜艺术——江西新干出土青铜礼器的造型与装饰”等文章具有教科书的范式，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史实：古代南方（江南）地区的青铜文化，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曾受到中原地区高度发展的青铜文化的强烈影响，很多地方就是在中原青铜文化大力推动下而进入青铜时代的。到了西周时期，南方青铜文化仍受到中原很大影响，但已出现了很多具有地方特色的青铜礼器和乐器等，表明西周时期南方青铜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在多数情况下，南方青铜器在继承传统的当地土著文化的基础上，渗进外来文化的先进因素，而绝不可能完全代替固有文化。这些对青铜器型的个别判断和器群的整体研究和判定，对今后的保护、管理和鉴定收藏，提供一个颇具使用价值的参考标识，同时也会对普及文物知识，提高群众对文物的审美和鉴赏能力产生积极影响。■



# 上海的井

## The well culture in Shanghai

撰文、摄影 / 罗泽国

井，在我们的生活中，渐渐的远去，但并未消失。作为一种文化，它已存在了几千年，只是没有像建筑物那样，受人重视。

上海有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约 6000 年前。青浦崧泽文化遗址，就曾发现两口马家浜文化时期的水井。这是上海掘井史上最早的水井。1990 年，青浦朱家角的渔民在清理承包鱼塘时，发现了良渚文化的古井。这种井呈圆筒形，是用一棵对剖开的大木，中间挖空后合作，用作井壁，出土时，木质已炭化朽蚀。1981 年，松江天马公社发现南朝古井。1985 年，安亭双墩庙附近发现元代古井。井身由九节泥质灰陶井圈叠置而成的。1982 年，安亭新泾大队发现元代石井。该井井底出土了元代釉陶壶等物。又如川沙出土了王港古井；松江姚家圈遗址发现了唐宋古井；奉贤发现了宋代古井。这些古井的发现都是上海先民使用水井的见证。

### 一、寺庙的古井

#### 黄浦区淡井庙的古井

淡井庙，位于今永嘉路 12 弄。原建筑已拆。该庙建于北宋初时，占地面积 4.6 亩，建筑面积 1778 平方米。其时上海地区井水皆咸，唯此井水清澈味淡，所以建庙。庙以该井命名。

淡井庙，宋时为华亭县属。13 世纪末，上海镇及四乡人口逐渐繁衍。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从华亭县东北划出五个乡，设立上海县，仍奉神于淡井庙。上海通社 1936 年所编的《上海研究资料》，对上海的城隍庙作了如下记载：“上海有城隍庙，当数宋朝开始。不过那时的庙是在淡井庙，

不是现在的地方；并且那时候上海仅仅是个镇市，似乎还不配设立一个专管上海的城隍。所以淡井庙供奉的城隍，实是华亭县的城隍。因此淡井庙也就称为华亭城隍行殿。到了 1292 年后，上海由镇升县，当然要立正式的海城隍了，可是他的庙还没有离开淡井庙。”清咸丰年间，淡井庙被毁。光绪二十年（1894），僧正生于淡井之北，重建前殿。1927 年慧德老和尚筹款兴建后殿，1939 年竣工。1942 年又利用建造后殿剩余木料，加高前殿屋面，1942 年完成。淞沪战争爆发后，淡井庙曾被宗教慈善团体用作难民收容所，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曾亲临收容所视察。1943 年，住持谷声圆寂，委托皈依徒弟程海根经营庙务。1947 年，由谷声徒弟道澄作淡井庙住持，香火兴旺。

1958 年，政府为普及小学义务教育，将淡井庙后殿改为瑞南小学，共开发出了 12 个教室，学校实行过两部制上课，解决当时入学的困难。1983 年后，瑞南小学并入周边学校，淡井庙又成为淮海少年之家。1963 年，庙门口那棵高大的古银杏因虫蛀空被拔掉。1966 年，“文革”开始后，庙门口的“宋建淡井庙”横匾，被水泥覆盖，关羽铜像，古铜器等被一扫而光。1975 年，庙前殿被华侨胶木厂使用。还有一部分房屋，被居民使用。原淡水井 1990 年时，仍存在于永嘉路 12 弄某居民灶间。1999 年时，市文管会组织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还有一小部分泥塑的佛像存在。淡井庙遗址上今建有上海城投公司（图 1、2）。

#### 黄浦区老城隍庙的古井

城隍庙是 15 世纪初年知县张守约，就金山庙而改建的。它的井，应该也是此时打成。听老



图1 黄浦区瑞金一路118号瑞金宾馆内留存的原淡井庙凉亭



图2 位于黄浦区瑞金一路118号瑞金宾馆路内的原淡井庙所立的碑



图3 老城隍庙的古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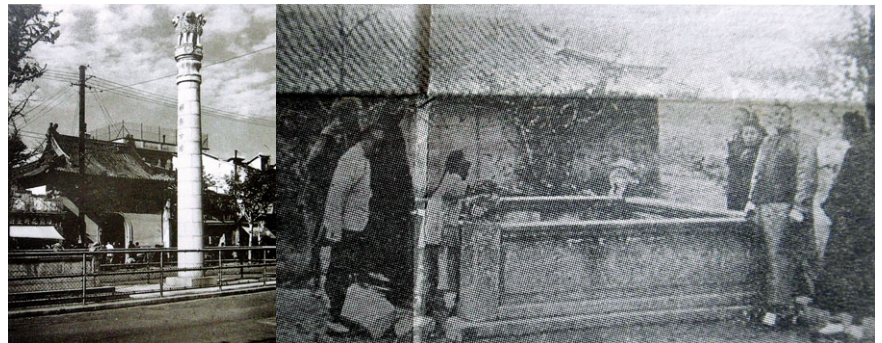


图5 清末静安古寺外景、静安古寺前“天下第六泉”旁竖阿育王柱、静安古寺沸井



图4 老城隍庙的古井现状



图6 静安寺的古井现状

人讲：老城隍庙大门口有口阴阳八卦井，旧时周围的居民都用此井水。那时海上闻人黄金荣刚刚出道，在此地萃华堂学裱画，他师傅就对黄讲，老城隍庙的那口井，每天第一桶水虽不能吃，但用作裱画，效果奇佳。于是，黄就每天早起，天不亮就起床争第一，打回这第一桶水。今年3月在老城隍庙见到了这口井，井口已封，用铁锁锁住了(图3、4)。

#### 静安区静安寺的古井

位于南京西路，华山路口的静安古寺，始建于吴淞江滨，南宋嘉定九年（1216），迁至沸井浜畔。寺前原有一泉，名“涌泉”，又有“天

下第六泉”之称，为“静安八景”之一。另据南宋绍熙《云间志》记载：“在沪淞东，西有芦浦，中间一水相通，有数尺许，特深如井，然水腾涌，昼夜不息”，故称“沸井”。在静安寺请教寺内的工作人员，他们说，此井原在山门前马路（南京西路）中间，因道路扩建，迁到了现址（图5、6）。

#### 徐汇区龙华寺的古井

龙华寺为上海地区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古刹之一，迄今已有1700多年。清代，一些文人列出上海八大名胜：凤楼远眺、海天旭日、黄浦秋涛、龙华晚钟、吴淞烟雨、石梁夜月、野渡蒹葭和江皋霁月，合称“沪城八景”。在这八景中，尤以“龙

华晚钟”最负盛名。

龙华寺周边古迹甚多，早年就有龙井，在山门左右，一清一浊，非常奇异，俗称阴阳井。时有金鳗出入，大旱不涸。至清康熙年间，龙华地区富庶，一些文人钟情于本地的名胜古迹，多有歌咏。张宸倡题“龙华六景”为：杰阁鲸音，月明双井，回塘拱刹，广渚浮珠，秋江塔影，夜浦涛声。在龙华古寺一位热心的工作人员指引下，虽没有在山门两边找到双井，可在寺院的牡丹园边找到了一口古井。这口井虽然井口已封多年，但保存很好（图7）。



图7 龙华寺的古井

## 二、现在还在使用的古井

### 黄浦区海会寺的古井

海会寺位于黄浦区丽园路650号，后门在局门后路上。该寺建于1942年抗战期间，是位于吉安路上的法藏讲寺的分院。1944年，住持慧开自行设计筹款建造大雄宝殿一座，1946年造新厅楼房一幢，1947年造客房9间，寺宇总共有房屋60余间，占地面积5.9亩，建筑面积4411平方米。大雄宝殿供奉释迦牟尼佛像，东首有观音坐像，西首为文殊佛像，后殿为韦驮殿。该寺兴旺时有僧众百余人。

在该寺的后殿，有一口据传是宋时的古井。这口井的井栏呈六角形，因世代使用，井栏边已给打水的井绳磨出了深沟。井盖呈圆形，是用一整块石头雕刻而成的，在井盖上，还刻有五角星图案。现在这口井还被在此工作的单

位和居民使用，水清，而且非常甘甜，天热时，单位的职工和居民还会把买来的西瓜放下去“冰镇”，比冰箱冰出来的好吃。可以讲，这口井是现在上海还在使用的最古老的井（图8）。

### 黄浦区吉安路上的路边老井

吉安路，1902年筑。初名梅林山路。1906年以法租界公董局董事茄勒名命名，称茄勒路。1946年以吉安县名改称吉安路。路址原系农田，间有村落，初筑时为泥土碎砖路。1927年至1929年分段铺弹街路。上世纪70年代铺柏油路面。从筑路的年代，可以看出这口路边井，已存在了一个多世纪。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这口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为是在马路边，附近的居民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来打水、用水。路过的行人，也可以拿起放在井架边的水桶，打桶水解渴、洗手、冲凉。这口井现在还在为居民服务，附近的居民用它来浇花、洗衣服、洗拖把等等。这口井，它还创造了上海的一个唯一，那就是，它是上海唯一的一口在马路边的井（图9）。

### 黄浦区龙华东路居民家中的古井

2009年10月，为拍原卢湾区城区记忆，在



图8 黄浦区丽园路海会寺老井，是上海目前还在使用最古老的井



图9 黄浦区吉安路上位于路边的井

龙华东路雪龙新村进行拍摄工作，当我拍到龙华东路 565 弄 9 号时，忽然眼前一亮，看到了这家私房建筑与众不同，房屋建在一棵高大的梧桐树边，是一所老房子，听屋主介绍，他们家已在此住了几代了。他 90 多岁的老母亲还健在，但不愿与人多讲话，也不许人家拍照。我经屋主的同意，进门拍了几张照。当走到屋左边时，发现了一口井，屋主告知这口井已存在了好多年了，房子造好了就打了此井。后来，安装了自来水，主人还是喜欢用这井水。

雪龙新村，因位于世博会红线内，早已全部拆除，用作世博会停车场，但那棵高大的梧桐树却保留了下来，树边上的那口井，已给水泥覆盖。最近几年，每当乘车经过卢浦大桥时，都会看看那棵高大的梧桐树还在不在，脑海中又会浮现出房主手拿水桶从井中打水的情景（图 10）。



图10 黄浦区龙华东路565弄9号的井

市区边缘、郊县的灶边井和墙边井

虽然现在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自来水，但灶边井和墙边井依然存在。灶边井，就是在农家厨房里，靠近灶头边挖一口水井，这井并不大，深约 3 至 4 米，井壁用砖块砌起来，井口用水泥浇制成的井栏，上面再用木质或铁皮制作的井盖，这就是上世纪 80 年代的农家灶边井。

进入 21 世纪，新的农家又打起了机井。机井的井壁和井口一样粗，是用铁的圆桶做成的，井口装一挤压的把手，只要用手一按，井水就会被挤压出来，如同自来水一样方便。而且这

机井就在灶边，非常省力，水质也非常好。

墙边井，在现在的闵行区的农家小院，你只要用心地观察一下，就能见到。今年 3 月在闵行区七宝地区新龙村观音堂 96 号，就见到了这样一口墙边井（图 11）。



图11 闵行区七宝地区新龙村观音堂96号的井

### 三、优秀历史建筑的井

#### 黄浦区孙中山故居的井

孙中山故居，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黄浦区香山路 7 号（原莫利哀路 29 号），两层花园住宅，占地面积 1.55 亩，建筑面积 250 平方米。该故居的井，保护很好。井口有木盖，外加锁。现在，故居的工作人员有时还用井水浇花草（图 12）。

#### 黄浦区豫园的古井

豫园位于黄浦区安仁街 218 号，全国重点



图12 黄浦区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内的井



图13 豫园古井亭的井



图14 豫园另一口古井栏



图16 陕西南路287弄步高里的井



图15 黄浦区乔家路书隐楼的古井栏



文物保护单位，著名的江南古典园林。始建于明代嘉靖年间（1559），原是四川布政使潘允端的私人花园。它以设计精巧、布局细腻、清幽秀丽、玲珑剔透见长，具有小中见大的特点，被古人誉之为“东南名园冠”。豫园今占地30余亩，有点春堂、得月楼、古戏台、内园和古井亭等景点（图13、14）。

#### 黄浦区书隐楼的古井

书隐楼，为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楼主之一的郭誉文女士告知，其家有两口井，都是宋代的。“文革”期间，家里搬进了几家小工厂，把井填了。因井栏是用一块大石头雕成的，非常重，要三、四个人才能搬得动，故没有运出去，就放在房子的边上了，一直到现在（图15）。

#### 黄浦区步高里的老井

步高里，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位于黄浦区陕西南路287弄，建于上世纪30年代，旧式里弄，有砖木结构石库门两层楼房78幢，占地面积10.41亩，建筑面积10004平方米。从陕西南路大门口进去，就有一口非常大的井，加了木盖和锁。当年，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这口大井承载了350多户，1000多人的用水。现在，人们看到这口井的存在，就觉得这保护建筑非

常完美，有一定的文化底蕴（图16）。

#### 四、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时代的井

上世纪70年代初，全国人民响应党中央号召，开展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运动。特别是在大城市，就当时的卢湾区来说，在影剧院的地下、在学校的操场下、在医院开阔地（图17）等等。

与此同时，在地面上以黄浦区瑞金街道和淮海街道为例，就打出了许多水井。如香山路



图17 上海市中医文献研究馆内的井遗址

6号(图18)、8号(图19),皋兰路26号(图20),合肥路376号(图21),绍兴路36弄(图22),绍兴路52弄(图23)等里弄,现在还能看到井的影子。有的井口虽已封,但看上去还是一口井。有的井口上方摆放着一块圆形石板,四周配上石椅,以作休闲之用。香山路6号、8号的两口井,看上去就不像井,而像有意安排的休闲之地。若没有知情人员的指引,你很难想象原来此地是一口井,是由井口改建而成的,设计之巧妙,令人钦佩。

### 五、市区里弄的井

#### 黄浦区田子坊的井

田子坊位于黄浦区瑞金二路东面,泰康路北面,思南路西面,建国中路南面这块风水宝地上。这里绝大多数的建筑都建于1912-1936年,属旧式里弄住宅。有井五口,像保护优秀建筑一样,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走进田子坊,看到老井,给人一种人文气息非常厚重的感觉(图24)。

#### 黄浦区乐安坊的井

乐安坊位于黄浦区淮海中路613弄,建于1912-1936年。新式里弄,有砖木结构三层楼房84幢,占地面积10.92亩,建筑面积11337平方米。该弄的井,位于弄底,也加了木盖和锁。居民说,早年没有冰箱,天热就把西瓜吊在井水里,这口井帮了我们大忙,有时候断水,就用它洗菜。

最近几年,这口井才不用了(图25)。

#### 黄浦区花园坊的井

花园坊位于黄浦区瑞金二路129弄,建于1928年。新式里弄,有砖木结构三层楼房132幢,占地面积17.23亩,建筑面积21173平方米,有井两口(图26、27)。

#### 黄浦区鸿泉里的井

鸿泉里位于黄浦区淡水路256弄,建于1912-1936年,旧式里弄,有砖木结构两层楼房15幢,占地面积1.71亩,建筑面积1360平方米。弄内有井一口,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这口井就是这条弄堂200多人唯一的水源(图28)。

#### 黄浦区陶村的井

陶村位于黄浦区南昌路50弄,建于1912-1936年。新式里弄,有砖木混合结构楼房3幢,



图18 黄浦区香山路6号的井



图21 黄浦区合肥路376号的井



图19 黄浦区香山路8号被封起来的井



图22 黄浦区绍兴路36弄的井



图20 黄浦区皋兰路26号的井



图23 黄浦区绍兴路52弄的井



图24 泰康路田子坊里面的井



图25 黄浦区淮海中路613弄乐安坊里的井



图27 黄浦区瑞金二路129弄103号门前的井



图26 黄浦区瑞金二路129弄59号门前的井



图28 黄浦区淡水路256弄的井

占地面积 0.82 亩，建筑面积 400 平方米。在弄堂西面有一口老井，是专供本弄 13 户人家，30 多人用的。此井现在还在用，居民们用此井水洗衣服、浇花、冲地（图 29）。

闵行区七宝吴中路的古井亭

七宝的古井亭，坐落在吴中路、金雨路和金汇路之间，上世纪 90 年代因吴中路拓宽而重建。该井亭有井一口，正门有井字门，井亭旁边有雕塑和重修井亭记，还种植了银杏等树木和花草，称为井亭绿地（图 30）。

中国人与井息息相关，可以讲，没有井就没有中国人。我们的先人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关井的文章和诗词。如先秦的《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诗圣杜甫曾在《饮中八仙歌》中说：“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可见，唐时的井已经很普遍，随处可见。皇宫深宅大院里更是少不了井，王昌龄的名句：“昨夜风开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轮高。”此句描写了没有井亭覆盖的“露井”旁边的桃树，在春风的吹拂下绽开了花朵。王昌龄的另一名句：“金井梧桐秋叶黄，珠帘不卷夜来霜。”井边的梧桐，秋深叶黄，渲染了色彩，烘托了气氛，把人引入到一个萧瑟冷寂的环境之中。真是写景之最。

清康熙年间的瞿谷曾写了一首咏龙华寺双井的诗，诗的题目是《月明双井》：“两两寒泉古刹边，夜阑汲静自泓然。离魂蟾兔光难晦，分界星河影共

圆。清浊漫争咫尺地，东西转尽辄辕天。剧怜本性何曾别，一到人间泾渭悬。”

生于清光绪年间的秦荣光，他在《上海县竹枝词》中，就有两首关于淡井庙中淡井的竹枝词。其一：“诰敕奉携图谱备，墓遗淡井迹千秋。”其二：“老城隍庙后荒坟，阡石当年误刻文；我念渡江始迁祖，拟碑淡井表先芬。”

井，作为一种文化遗产，演绎着历史的兴衰，演绎着上海的不老传奇，并留下了深深的足迹。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时代的变迁，井、井水，作为一种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必需品，已慢慢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淡出了人们的生活。但它作为一种文化，却根植于人们的心中。只可惜，在上海那么多井中，还没有一口井被作为区级或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而被保护。井，在人们的视线中，正在慢慢地消失……



图29 黄浦区南昌路50弄的井



图30 闵行区七宝的井亭

### 相关链接

**淘井**：又叫浚井，淘井人先用桶把井水吊干，再下到井底，把井底的污泥、杂物等清除干净，使井水更干净、清洁。淘井，一般每年进行一次。

**枯井**：无水之井，又称为盲井、空井，民间有“塞井损目”之说，所以，自古以来人们不敢轻易填埋井。

**义井**：大多数情况是旧时地方名人、财主、义士捐款所打之井，惠及邻里。

**封井**：旧时沪上风俗之一，每至除夕，有井的人家先把大小水缸装满水，讨个口彩叫作有财有势，夜晚在井栏旁边点上香烛，供上水果酒水等，大人小孩齐拜“井神”，感谢一年来的恩惠，然后盖上井盖，再用大红纸条封贴。

**井铭**：井栏上的刻字，称为井铭。

**八角井栏**：《易经》中有八卦，故，绝大多数古井栏都做成八角形或刻有八卦纹饰。

## Cultural Heritage Forum

Highbrow idea, wide perspective and good effec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ermanent display in Nanhu Revolutionary

Memorial (By Zhang Zhisong)

How to guide tours in a curatorial way (By He Mo)

Tell the stories of traditional festivals and activate cultural atmosphere (By Zhu Zhen)

## Science and Techonolgy

On managing information in museums and memorials (By Zhu Zhongyi)

## News from Overseas

Revelations from the similarity between Hongshan jades and Maori jades (By Feng Lei)

Found-raising by Chinese museums as compared to that of the British Museum (By Hou Ke)

The social education courses held by the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By Wang Xuan)

## Book Review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some books (By Ding Ji and Wu Wei)

On the publishing value of the book *Study of Southern China Bronzes* (By Yu Lan)

## Local Cultural Heritage

The well culture in Shanghai (Written and photography by Luo Zeguo)

The first well in Shanghai can be dated early as 6,000 year ago. As a form of cultural heritage, wells witness the vicissitudes of our history, and carry deep historic marks in them. With the time going, wells and well water, a necessity previously tied to people's life, has faded in the stage of human history. As a culture, however, wells root in people's heart. In this article, the writer introduces wells both extant and no longer seen.

## Updates

The launch of Shanghai Center for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and Research (By Chu Fei)

A conference held for the 450th Birth of Xu Guangqi in Xujiahui District (By Ding Yongkun)

The China Cultural Heritage Day in 2012 and Guangfulin Site open for the public (By Chu Fei)

Map of Cultural Shanghai is free for the public (By Wenguang)

The Impression of Suchow Creek has been co-organized by Changning and Putuo local bodies (By Shi Tong)

Foreign friend visiting modern architecture Shanghai has been organized for a second time (By Wenguang)

Launch of joint law enforcement for the culture heritage in the waters of Shanghai jurisdiction (By Shi Tong)

An exhibi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musical instruments travelled in Thailand (By Gong Dan)

## 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揭牌

2012年6月6日下午，“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揭牌暨上海市不可移动文物地理信息系统项目签约仪式”在上海市文物局举行，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董明康出席并为该中心揭牌。

上海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文物大市”，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日前，经上海市编制委员会同意，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上海市文物局成立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有效实现“政事分开，管办分离”，进一步理顺上海市文物管理工作的体制和机制。

董明康副局长在揭牌仪式上，对上海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要求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在建设过程中，要努力提升文物保护科研水平，优化社会资源配置



置，抓好队伍建设，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将文保中心逐步发展成为上海市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核心保护、研究机构和信息资料中心。 (撰文/褚菲)

## 忆上海先贤 明爱国之志——徐汇区举行徐光启诞辰450周年纪念会

2012年4月正逢明末爱国科学家徐光启诞辰450周年。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学习弘扬徐光启的光辉业绩，传承祖国优秀传统文化遗产，增强广大市民的文化自觉和自信，23日，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市文物局、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徐汇区人民政府、徐汇区政协等部门在徐汇区光启公园（南丹路17号），共同举行“忆上海先贤，明爱国之志”——明末爱国科学家徐光启诞辰450周年纪念会。纪念会由徐汇区副区长王珏主持，会上，徐汇区领导致辞，南洋模范中学交响乐队演奏《徐光启缅怀曲》；诗歌朗诵《徐家汇，走过一个历史的巨人》；上海市领导讲话；市政协、市有关部门和徐汇区领导为徐光启石碑揭幕、向徐光启墓敬献花篮；全体嘉宾以及社区居民、学生、徐光启后裔代表等与会人员向徐光启墓敬献鲜花；纪念会结束后，来宾参观徐光启纪念馆。

徐光启在中国科学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篇，他的科学思想和中西文化会通的精神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值得人们代代铭记，代代传承。活动主办方组织明末爱国科学家徐光启诞辰450周年纪念会，其目的在于：一是要学习徐光启昌言经世、忧国爱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徐光启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从小就胸怀救国之

志，每学有余力则学习兵法、研究军事。为抗击后金，保卫京城，徐光启终日奔波操劳，巩固城防，一面监制大炮，布置生产与分配火药、火器，“一面教练，昼夜在城，饥渴俱忘，风雨不避”。徐光启忧国爱民的爱国精神还体现在他的治国理想上，一方面他在政治上主张“富国强兵”，提出“富国必以本业，强国必以正兵”，并将他的军事理论和实践经验编成《徐氏庖言》。另一方面他在经济上主张“以民为本，以食为天”，努力从事“农政”。徐光启在上海桑园成功试种甘薯，并在江南大规模推广传播，解救了大批灾民。二是要学习徐光启坚持实践、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徐光启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一生崇尚实用之学，在科学研究中对客观事物无不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绝不凭主观想象，轻信盲从。他一面专研我国古代传统科学，一面吸收西方传入的科学技术中符合我国实际的东西，通过自己亲身的实验，加以证实、总结和提高，达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徐光启亲自指导观测天象，修订历法，借鉴西方天文学和数学思想，编成《崇祯历书》，奠定了中国近300年天文历法的基础，极大地发展了中国古代天文学，在中国天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正需要这种工作态度，尤其在引进国外科学技术方面，更需有这种精神。三是要学习徐光启会通中西、“欲求超胜”的创新精神。徐光启能突破时代和地域的局限，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需翻译”的学习、赶超西方的主张。他积极宣传、介绍“西学”，并翻译了大量西方先进科学著作，对中西文化交流和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极

大的推动作用。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了西方数学巨著《几何原本》，译本中的许多译名不但在我国一直沿用至今，还影响到日本、朝鲜等国。徐光启虽然相信“西法至为详备”，但没有盲目崇拜，而是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他深信“后之人必胜于今”，坚信我国的科学技术必将后来居上。深刻领会徐光启会通超胜的精髓，以海纳百川的胸襟与气魄，借鉴和汲取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四是要学习徐光启勤俭治国、清正廉洁的高尚情操。徐光启一生廉洁，自奉菲薄，在他死后，所存仅数箱手稿、旧衣几件，《明史》称他为“盖棺之日，囊无余资”，但他留给中国人民的是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艰苦奋斗与勤俭节约历来是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也是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必不可少的。学习和发扬徐光启不追求个人富贵荣禄，为祖国、为人民、为科学事业奋斗终生的献身精神和廉洁自律的高贵品质，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满怀信心地展望新的未来。

徐光启是我国明末爱国科学家、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对于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在数学、天文、历法、军事、测量、农业和水利等方面都有重要贡献。在中国古代，徐光启是以成就卓著的科学家名垂史册的，因而得到后代人民群众的敬佩和爱戴。回顾近百余年历史，国人对徐光启的缅怀之心从未停息，有关徐光启的大型纪念活

动时常开展。如1903年纪念徐光启逝世270周年、1933年纪念徐光启逝世300周年、1962年纪念徐光启诞辰400周年，当地政府整修徐光启墓地、在徐光启墓前开追悼大会、上海学术团体举行纪念会，并发表纪念文章。特别是1983年，纪念徐光启逝世350周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将南丹公园改名为光启公园；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汪道涵出席纪念徐光启座谈会，并作重要讲话，指出徐光启虽受所处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但他激于忧国爱民，并不埋头书斋，置身“象牙之塔”，而是力图改革，昌言经世。徐光启研究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竭尽全力为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而斗争，为改变我国科学技术的落后面貌而斗争，他这种伟大的爱国主义，发展科学的精神和态度，值得我们很好学习。

徐汇区历届政府十分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事业。1988年徐光启墓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墓地进行全面修缮，恢复墓地石碑坊、墓道等历史原貌；建造徐光启纪念馆，组织纪念徐光启逝世372周年暨徐光启学术研究会，与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主办“纪念徐光启暨《几何原本》翻译出版四百周年系列活动”，以纪念徐光启，学习其爱国思想和科技创新精神，传承历史文脉。2000年起，徐汇区人民政府为奖励在科技领域有突出贡献人员，设立“徐光启科技奖”，每年表彰一批科技创新精英人才，弘扬科技创新精神。 (撰文/丁永坤)

## 上海举行2012年“中国文化遗产日”暨广富林考古现场公众开放日活动

2012年6月7日下午，上海市2012年“中国文化遗产日”主会场活动暨松江广富林考古现场公众开放日活动在松江广富林文化交流中心展示厅举行。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上海市文物局、松江区委、区府的领导出席启动仪式。参加主会场活动的还有上海各区（县）文物管理部门的同志、关心热爱上海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社会公众、新闻媒体的记者等百余人。仪式上还举行了《文化上海 文化遗产导览图》和《文化上海 重要名人故居导览图》的首发和市、区领导为松江广富林文物保护员颁证。

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上海市文物局局长胡劲军，中共松江区委书记盛亚飞，共同启动“广富林考古现场公众开放日活动”。随后考古专家向参加活动的市民和媒体介绍广富林遗址考古的最新成果，带领大家参观考古发掘现场。

2012年广富林考古发掘是上海地区考古有史以来发掘面




积最大、参与发掘单位最多的一次考古发掘，上海博物馆、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大学6家单位参加广富林遗址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经过3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已经发现了有448个灰坑、216座水井、28条灰沟等不同类型的考古遗迹，这些遗迹分别属于新石器时代、周代、汉代、宋元、明清等时期，反映了广富林遗址源远流长的历史传承。 (撰文/褚菲)

## 《文化上海》导览图免费向公众发放

为集中展示上海的历史文化遗产,为社会公众提供较为全面的上海市文物分布信息,上海市文物局在继发放《文化上海 博物馆导览图》之后,又精心策划编印了《文化上海 文化遗产导览图》和《文化上海 重要名人故居导览图》,首批各印10万份,在2012年中国文化遗产日期间免费向社会发放。

《文化上海 文化遗产导览图》囊括了全市19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163处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并推荐有六条专题游览线路。《文化上海 重要名人故居导览图》主要介绍了全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登记不可移动文物中的名人故居。

两张导览图标注有文物点的地址、保护级别、文物简介、主要公交线路、开放信息等,方便广大市民与游客快速检索和了解全市历史文化资源及其特色,合理安排参观计划,节约出行成本,并由此激发市民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热情和自觉性。


《文化遗产导览图》和《重要名人故居导览图》于6月7日下午在上海市2012年中国文化遗产日主会场——松江广富林考古现场进行首发。6月9日在中共“一大”会址、中共“二大”会址、光启公园、上海鲁迅纪念馆、长宁区少年宫、宋庆龄陵园六处文物保护单位所在地发放,数千市民排队领取导览图。今后两张导览图还将派送至全市各主要文物景点,免费供公众取阅。  (撰文/闻广)

## 长宁、普陀两区联合举办 苏州河老印象采风巡游活动

2012年6月9日下午,市文物局联合普陀、长宁两区,举办了苏州河老印象采风巡游活动,来自普陀、长宁两区的社区居民代表和上海康博飞达服装有限公司的外来务工人员代表,免费乘坐苏州河游轮,考察苏州河两岸(普陀-长宁段)文物建筑,由文博志愿者现场进行讲解。外来务工人员代表还获赠《苏州河文化遗产图志》一书。

苏州河是上海的母亲河,它记载了上海产业文明的发展史,也是中国民族工业的重要发祥地,中国最早的纺织、面粉、火柴

三大轻工业都诞生于此。苏州河普陀段、长宁段是中心城区中河岸线最长、弯道最多、形态最优美的段落,拥有苏州河畔近现代工业文明遗存20余处,包括上海试剂总厂旧址、上海火柴厂旧址、大夏大学旧址、南林师范学校旧址、圣约翰大学旧址、中央印制厂上海厂旧址、宜昌路救火会旧址、中央造币厂旧址、上海啤酒公司旧址、福新面粉厂旧址、阜丰机器面粉厂旧址、信和纱厂旧址、丰田纱厂铁工部旧址等。

文化遗产的保护离不开广大群众的支持,市文物局与长宁、普陀两区联合举办此次活动,邀请市民代表和外来务工人员代表乘坐苏州河游船,领略两岸文物建筑风光,就是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让广大市民共享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加入到文化遗产保护的队伍中来。  (撰文/史通)

## 上海市组织第二届外国友人 考察上海历史建筑活动

2012年6月9日,是我国第七个“文化遗产日”。为满足广大公众接触和感受历史文化的需求,宣传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营造全社会关注文化遗产保护的良好氛围,上海市文物局组织“第二届外国友人考察上海历史建筑活动”。

2007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曾组织过驻沪总领事馆领事及外国友人考察上海的城市标志——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群”的外滩建筑群。通过考察交流,让驻沪领事及外国友人了解了上海的文物保护理念,为双方今后在文化遗产领

域的合作打下了基础。

时隔五年,上海市文物局重新组织外国领馆驻沪总领事及相关外国友人,再次考察上海文物建筑的保护修缮情况,听取他们对上海文物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参加本次考察的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沪领事馆总领事芮悟峰、墨西哥合众国驻沪领事馆总领事罗兰多·加西亚、土耳其共和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丹尼兹·艾柯女士,美利坚合众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副领事安德鲁·杜夫,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领事石川勇、和久征夫,德国汉堡市政府驻上海联络处首席代表安克及多个国家上海商会代表,此外由外国友人自发组织的“上海老建筑保护俱乐部”的部分成员以及上海该领域的有关专家也一同参加了此次考察。

本次考察的地点定为黄浦区外滩源地区。外滩源作为外滩的源头,拥有原英国领事馆旧址、划船俱乐部、新天安堂(联合教堂)等多处重要文物保护建筑,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考察团成员参观了久负盛名的中山东一路33号原英国领事馆、原划船俱乐部等建筑,了解了上海对历史建筑的保护和开发利用的状况,并饶有兴趣地听取了该幢建筑修缮设计师的讲解。

此外,考察团还考察了正在进行保护性改建的北京东路2号(原格林邮轮大楼)工程项目,听取了现代集团设计师对

该项目的规划介绍,并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就“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会人员充分肯定了上海在文物保护方面的成绩和努力,同时也对今后如何进一步做好我市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建议。

今后,市文物局将努力将此项活动常态化,使得有更多的外国友人可以共享上海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参与到上海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来,共同促进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

(撰文/闻广)

## 上海市管辖海域内文化遗产联合 执法工作启动

2012年6月7日上午,上海市文物局和上海市海洋局,在崇明县长兴岛的渔港码头联合举行上海市管辖海域内文化遗产联合执法专项行动启动仪式。

上海市东面海域广阔,古代就是我国重要的航运地区,也是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途径地之一。经初步调查,本市管辖海域内文化遗存比较丰富,海域内已发现古代沉船线索。近年来,在周边海域偷盗水下文物事件时有发生,这给本市海域内文化遗产安全构成了威胁。为此上海市文物局和上海市海洋局建立起本市管辖海域内文化遗产联合执法工作机制,由上海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中国海监上海市总



队具体负责联合执法工作。

启动仪式后,由海监、文物管理、渔政、海事、海警、水上城管、航政、长江公安等单位联合组成的执法队伍,前往江亚南沙、九段沙等重点海域开展首次水下文化遗产执法巡航。

(撰文/史通)

## “器涵礼 乐呈和——闵行博物馆藏 中国民族乐器特展”赴泰展演

应泰国宋卡王子大学普吉孔子学院的邀请,闵行区博物馆于2012年6月18日至24日派出4人代表团和5人演出团赴泰国宋卡王子大学普吉分校举办展览和演出活动。

闵行区博物馆精心挑选了20件近年征集复制的民族乐器精品,涵盖了打击乐器、吹管乐器、弹拨乐器、拉弦乐器四大类。展品体现了上海大同乐会的悠久历史和对民族乐器制作的改良;展示了江南丝竹文化的独特魅力。

开幕式上宋卡王子大学普吉校区校长助理Tatiyaporn博士和闵行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党委书记刘家才分别致辞。

展览持续了3天,师生们纷纷到展品前合影留念,有的还试着去触摸他们没有见到过的乐器;也有来自中国的志愿者

老师把音乐课堂搬到了展厅,现场给学生讲解中国的民族乐器和器乐文化。为展览专门制作的展出画册也被师生收藏,师生们还把自己对中国民族乐器的喜爱记录在了留言簿上。

中国民族乐器音乐会是此次展演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4位年轻艺术家为宋卡王子大学普吉分校的师生及社会知名人士做专场演出。宋卡王子大学普吉校区前任校长助理在聆听中国民族乐器演奏后抚动古筝告诉我们,“这些音乐震撼了我的心灵”。演出结束后,师生纷纷上台与艺术家合影留念。两名德国学生还用不太流利的中文与琵琶演奏家交流。

闵行博物馆为此次展演活动做了精心的策划,自开馆以来首次带着展品走出国门,既是对近几年来藏品征集工作的展示,更是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宋卡王子大学普吉分校的师生及社会知名人士对此次展演活动给予了极大的赞许,也希望有更多的机会能看到中国的民族乐器,听到中国的民族乐器演奏。

(撰文/龚丹)

# 饰棺之仪——对陕西韩城梁带

按照古代文献的记载,周代贵族在葬仪过程中,为了不使人们直接看见亲人的棺柩,需要以华美的装饰物对棺柩进行遮蔽,这就是周代贵族丧葬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饰棺之仪。历年的周代考古发掘中,在一些高等级墓葬中不断有相关的遗存被发现。

陕西省的考古工作者根据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特别是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的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记载和以往学者的探讨,对于“饰棺”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大致厘清并复原了当时使用的基本状况。

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金玉华年——陕西韩城出土周代芮国文物珍品展”中,策展人员在吸收最新研究成果的研究基础上,以芮国墓地考古资料为依据,为观众制作了周代饰棺示意模型。

“饰棺”的内容分为棺饰、窆两部分。

“棺饰”主要是指覆盖于棺柩之外的荒帷及其框架墙柳,以及接结于柳架上的池和铜鱼、贝、振容等饰件。

“荒帷”是棺饰的主要部分。是先以木竹类材料构成框架,侧框称墙,顶架称柳,即所谓“墙柳”。再加布帛于墙柳外,覆于顶面者为“荒”,缝于四周者称“帷”。荒帷就是民间俗称的棺罩,至今在陕西、山西的一些农村丧葬活动中还能见到。

“池”应是另加于荒帷之上的饰物,当高于并且大于荒帷,也是用竹木类材质做方形框架。现今见到的架顶框呈



M26 椁室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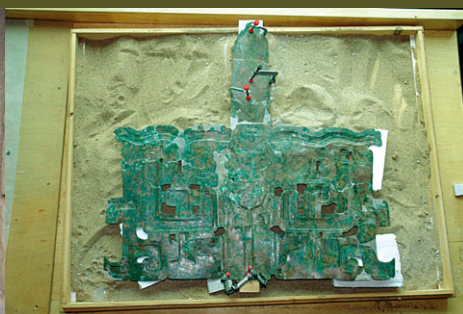
M502 荒帷痕迹



M27 荒帷痕迹



M19 铜窆及串饰出土位置



修复中的M19铜窆



M19 椁室南壁串饰出土情况



M28 棺环分布情况



M26 出土棺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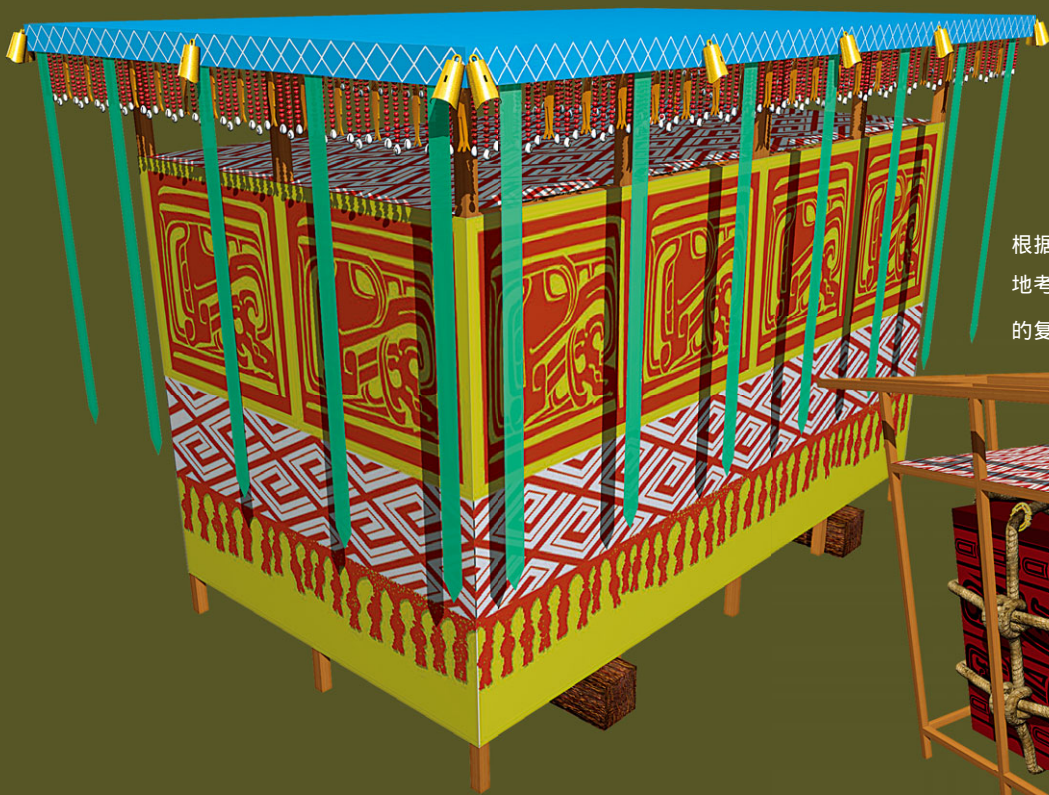
M502 棺外纹饰

# 村芮国墓地考古所见葬仪资料的复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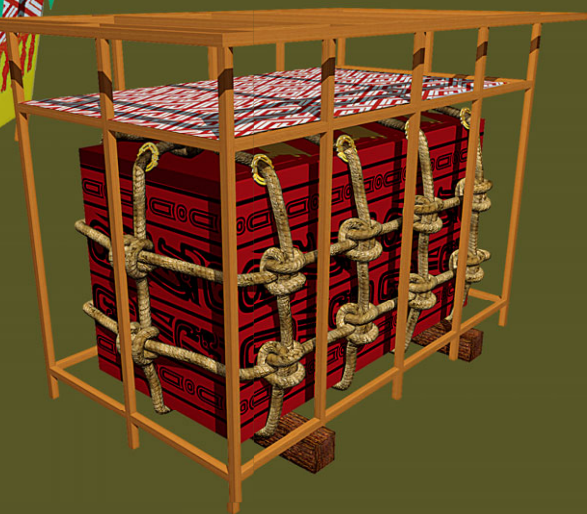
文、图/秦潼

现出“口”、“日”、“目”、“田”等形状的横向或纵向梁架结构。架上覆盖青色布,架下悬系铜鱼、珠、贝组成的串饰,在其四角及与横向串饰的衔接部位,往往还有一件或两件铜铃。振容是系垂于池架的草绿色薄纱条带,并可能画有其他色彩。

“翼”是在送葬过程中由人举持而随棺柩行进的仪仗器具,其顶端多呈三叉形。质地种类可能较多,但从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早期多为铜片制作,故得以保存而为考古所见。使用翼的目的亦是为遮蔽灵柩。使用之后作为随葬品,一般放置于外棺顶上,或者竖立、倚靠于外棺旁。



根据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考古资料对“饰棺”的复原



陕西蓝田县曾出土一唐代舍利石函,其浮雕图案可与周代的池与振容类比。浮雕中的华盖实与周代荒帷上的池类似,四周装饰的佛珠串饰、幡带等则类似于周代池架下的铜鱼、贝及振容等饰物。